

我觉得最惨的就是……

讲述人：谢启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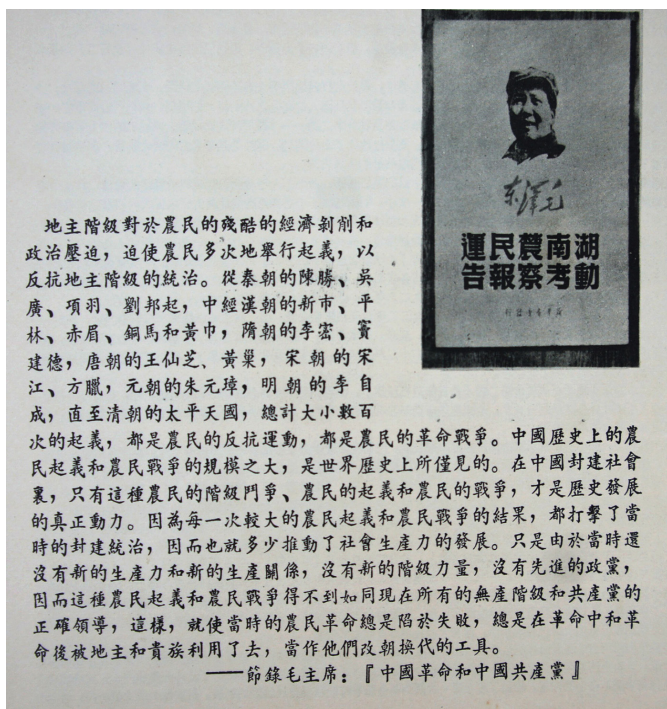
1946年生



土改时我们谢家湾划了两个地主，一个是我大伯谢时宽，另一个就是我老汉（爸爸）谢时登。大伯 1952 年被镇压了。

大伯死时我才 7 岁，他是凌晨被打的，当时我们都晓得他要被打，我爸找木匠给他做了个棺材，安排了几个人去把他弄回来。奶奶拉我去看，大伯当时大约 40 多岁，身材很魁梧，河坝的谢启明正在给他掏嘴里的沙子。

大伯这个人，对人非常好，村民有什么事需要帮忙，都去找他，我们这一沟的人，哪家没得吃的了，贫困了，他就叫他们去他家拿粮食。共产党要杀他，村民都要去保，于是就在夜里把他打了。共产党要推翻国民党，那没得法，必须要那么做（杀人）才行。



我老汉没被镇压，但受了几十年的活罪。他被打得惨，脚尖、耳光、烤火……烤火就是跪下来，把衣服脱了，前面架起柴，烤。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他终于受不住了。有一次他被打得鲜血淋漓的回来，决定不活了，要去跳井。我拦住他，我说，你这么长时间都活过来了，现在活不下去了？你死了还不是白死了，我们还有这么几弟兄，怕啥子，你活不起了我们几兄弟养

你。我们守到他，不让他寻短，他这才活下来。

那几十年我们最惨的就是一年到头辛辛苦苦挣的那点血汗钱全部被收缴。我们家有四弟兄，还有个姐姐，我们全都很勤劳，尤其是我姐姐，没日没夜的干。到年底，我们全家扣除粮食款，还有七、八十元钱。队上干部觉得，地主子女还有几十块钱的收入？不行！于是他们随便找些理由把钱收回去。比如，说我爸爸出工不走前面，走在后面，拖了时间，影响了做庄稼，因此要赔多少钱。还有，说我们砍了山上的柴，要多少多少钱，这么一算，遭了！一年的辛苦全没了！那时一个劳动日才2角多钱，我们全家一年到头才收入70多元。我们队上那个主任心是烂完了的，他甚至说，你砍了二队、三队的柴，给他们缴钱去。我们地主子女，不敢吭声，明知是冤枉，也得乖乖地送去。对方的干部莫明其妙，问，这是啥子钱？我只好说，我好久好久把你们山上的柴砍来烧了。我记得他们都忍不住抿着嘴笑——有人平白无故送钱来！



“辛辛苦苦挣的那点血汗钱全部被收缴”

我大伯家也是如此，收入被同样的理由刮走。这种事不是一年、两年，而是每年都这样。不干还不行，干了又白干，无论你干多少，干到年底，他三五下给你一算，编个理由一下子把你的血汗钱刮走。我觉得最惨的就是这点！说地主剥削、欺压，这算什么？其实，当年很多地主都是省吃俭用，辛辛苦苦多年才买了点地。我知道有一个姓傅的地主，他女人叫唐世珍（音），熬更守夜，天天一大早就起来上坡下田地劳动，省吃俭用挣了点钱，才买了点地。

我们家只有我奶奶寇向文（音）在1960年饿死了，我老汉都活到1986年。我们能活下来全靠我们一家人都很勤劳，草草树根都弄回来吃。

还有就是他们随意整人，地主子女嘛，说你哪个就是哪个，是不是事实不管，没得的事给你栽起，三天两头给你编一个。比如，问你是不是偷了什么什么东西，你说没有，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打，打得你鼻血敞起流。我的大舅也是地主，我亲眼见他被打在地上起不来。有的地主精灵（聪明），说什么立马上就承认。我老汉不，没得的事他就不承认，不承认马上就打。

那时，不管你犯没犯法，只要有人吼：“把地主拉来整！”“要得！”立马就拉来跪起，脚尖耳光地一阵乱打。我们一声都不敢吭，毛老头（毛泽东）的政策把我们教乖了，只干活，什么话都不要说。

我今年62了，想起那些年，真不晓得是哪个过来的，那个时候的人呀，硬是（忍）受得，现在的人才过不下那种日子，情愿死都不那样活。我说呀，我要是会写小说，我们那些年的遭遇，要写这么厚两本！

采访时间：2007年12月1日

地 点：四川万源县太平镇水窝子村

采访后记

谢启军老人是谢启宣的堂弟，采访他依然比较艰难，除了他的耳朵同样比较聋之外，他对以往那些不堪回首的日子还表示“不堪述说”。费了一番周折，他才断断续续说了一点片断，距他说的“可以写两本书”的内容相去甚远。

我坐在他家门口，房门大开，大巴山的冬风一阵阵刮来，山头上雨意迷蒙，四周笼罩着淡淡的凄冷。

万源，是当年红四方面军的革命根据地，70多年前那场著名的“万源保卫战”就发生在这儿。当时，仅有20万人口的万源就有2万多人为“翻身解放”参加了红军，更有无数巴山儿女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生命。

了红军，更有无数巴山儿女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生命。

70多年过去了，地主们早已被消灭干净，万源却依然是一个贫困县。在万源的几天里，我听当地的人说了一大堆万源官场的腐败、法院的黑暗、警察的专横，以及房屋被强拆后上访草民的悲惨。

从谢家湾返回县城后，我在暮色中登上了驮子山公园，赶在那“万源保卫战博物馆”关门前进去匆匆看了一眼。

出来时，山风阵阵，地暗天昏，脚下，万源县城在群山的环围下幽幽地闪着凄寒的光……



这是土改时中共的宣传。
现在还可以这样呼喊吗？

选自“中南土地改革的伟大胜利”

我们夫妇的母亲都是 自杀身亡

讲述人：卢国柄
1933年生



我父亲卢邦定是卢汉（即卢邦汉，1945年任云南省主席、省保安司令兼军事倡议院上将院长。1950年后担任过云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的弟弟。我爷爷奶奶生了8个儿子3个女儿共11人，11人中的7个都在20多岁就去世了，其中包括我父亲，他拉肚子拉死了，去世时才26岁。所以，1949年共产党打下天下时，我们卢家11个子女中只剩下老大卢汉、老三卢邦彦、老七卢邦基和卢汉的妹妹卢邦纯。

我们老家是云南昭通，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祖父去世时分了家，一人分一份产业，包括房产、地产、现金。我因父亲去世得早，也分了一份，但我当时在昆明读书，产业交给七伯父管理。

土改时我们卢家的人都没在昭通，周保中（抗联司令，云南省军政委员会副主任、省政府副主席和昆明市军管会副主任。）同卢汉有往来，他不便叫卢汉回去，于是把七伯父卢邦基找来，叫他代表大哥卢汉回去完成减租退押——他当时以为我们还没分家。他问七伯父有什么困难没有，七伯父说，困难没有，但若要把我抓去吊、打，我身体不好，受不了。周保中说：“这个你放心，你去了之后不要‘二气’（我们云南话，不要傲气的意思）就行了。你老老实实的，叫你怎样就怎样，吊打的事我会通知他们。”



卢国柄保存的卢汉的两张照片

七伯父回到昭通，农会到哪个村去开会斗地主，就把他叫去一块斗。他们喊，卢邦基，你的剥削帐是多少多少，是不是这么回事？七伯父连连点头：“是是是，我回去就把钱给你们汇来。”反正说什么都全部承认，老实接受批斗。批斗的人说：“好好好，你们看卢家表现好，你们就要象这个样子。”接着斗其他地主。七伯父果然没被吊打。

我三伯父卢邦彦是工商业兼地主，他虽然有点地，但他从来没去经营过，把他弄回去斗，他连哪块地是他的都认不得。他在前边走，边走后面的人边用竹杆打他屁股。他穿的长衫子，竹杆打在衫子上也没什么，但是他气得不得了，回来后好几天饭都不吃，他从没受过这种侮辱。后来文革时又抄他的家，又受辱，那是后话。

土改时只有我大姑妈卢邦纯死了，她挨斗，被折磨死了。

不过总的说来，因为卢汉起义，他们手下留了情，我们卢家没有吃大亏。但是，我们卢氏家族除了我们这一支，其他都遭得惨，都枪毙了。我叫姑奶、么奶的，都被杀了。她们都是非常斯文的人，彬彬有礼，从没作过恶，只不过收点租，吃口饭。

还有我妻子龙云瑞的母亲陈玉贞也是土改死的。解放前几年，别人帮她在西山睡美人脚下买了块地，准备在那儿修房子，结果还没修，有家农民就租来种了庄稼。种了没多久就解放了，租也没收到什么，大概几斗米。土改一查，那块地是她的，她胆子很小，以为算剥削帐，该多少赔了就算了。那天杀人，杀华庭寺的当家主持，他是个和尚。滇池边西山半山腰上有个寺庙叫华庭寺，山脚那些土地全是华庭寺的庙产，寺庙主持就算是大地主。那天还杀了一个姓段的乡长，都没宣判，工作队领着当地的农会，说杀就杀了。



前排左一为陈玉贞

杀人时，把陈玉贞也抓去跪在杀场上，她以为也要杀她，但杀了主持后没杀她，她回来后吓疯了，第二天跳翠湖自杀了。她死时龙云瑞才18岁，她本人还没满40岁。

卢汉当时也在昆明，但那个形势谁也没办法，他挂了个云南省军政府副主任的名，自己都不一定保得了，管这事不是给自己找麻烦？

我母亲杨琼英也是地主，她逃过了土改，但没逃过文革。文革时好象说要打仗，出身不好的，地主呀、反、坏、右呀，统

统要遣送回老家。上面已经通知了，两、三天就要走。我母亲想不通，偷偷吃安眠药自杀了。她死时才49岁，母亲只比我大16岁。

在我们老家昭通，被打死的地主多得很，我知道的有一叫李立纲的地主。李家发家大概是在清朝同治、咸丰年间。李家的祖先是一个叫李跃（音）的人，他最初帮人挑担子，从四川宜宾挑一种虫子（注：蜡虫）到昭通。这种虫子放在树上可以生一种黄白黄白的蜡，这种蜡据说用在工业上，具体我就不懂了（注：白蜡）。当时从昭通到宜宾要走12天，李跃往往返地跑，先帮人，后自己干，慢慢发了家。传到第三代李立纲时，李家已是昭通的大富豪，当时昭通有整整两条街的房产、铺面都是李家的。昭通在解放前算不错的，它是四川到云南的交通要道，抗战时特别繁华。



杨琼英

我们卢家同李家有交往，李立纲同七伯父常常往来。小时我到李家去玩，看见他家贡桌上有个玻璃箱箱，有这么厚，这么宽，里面贡着一根扁担，扁担上用红绸扎着一个十字。贡这根扁担表示祖宗是靠这根扁担发家的，后辈儿孙要记得勤劳致富，不要忘本。

土改时李立纲被枪毙了，他媳妇（妻子）被抓来斗打，把手指甲都烧掉了。李立纲的女儿曾经在我们体委打篮球，后来她嫁了一个华侨出国定居了。

在昭通还杀了龙云（滇军将领、云南省政府主席。1950年后曾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第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的三儿龙绳曾。龙绳曾又叫龙三，他解放前作过一些恶。因为龙云的原因，龙三反蒋。1949年，龙绳曾起了义，起义后担任了昭通警备区副司令。一天，解放军突然把他家包围起来，冲进去拖出龙三全家，包括保姆、丫头、煮饭的、做杂工的，全部杀了，栽诬了他一罪名——“叛变”。龙三家就在城里，四周都是解放军，他叛什么变？后来龙云回到昆明，周保中对他：“龙绳曾叛变，被我们解决了。”龙云半天没说话，最后他说：“龙绳曾不服管教，你们把他解决了我没得意见，但是他的老婆娃儿、他的家属有什么罪？”周保中一下子呆了，答复不出来，只好说：“唉呀，这是我们下边的人处理的，具体情况我们不清楚，我们回去查。”

为什么要杀龙三？后来落实政策查档案，查出什么原因？要揭开昭通阶级斗争的盖子，必须要杀两个人：一个是龙三，另一个是也起了义的国民党昭通公署专员安纯三。围剿时安纯三逃到昆明，他自首后进了监狱，后来死在狱中。

我认为，共产党土改的作法过头了。原因很简单，现在动物都要保护，人怎

么随随便便就拿来枪毙、抓来杀？从人性上说这是没得人性。如果一个人有罪，通过法律，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作为地主，把土地交了就完了嘛，不要侮辱人格，吊、打、跪、斗、杀……这些都是不妥的。现在看来，土改，包括镇反，都过头了，残酷！！

最近我看了一本书，《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看后我觉得它的内容是令人信服的。老毛这个人，现在还有人崇拜他，其实这个人最没得人性，是个残暴的、不仁不义之徒！民主人士帮着共产党说话，反对蒋介石，共产党当权后把人家打成右派，这叫不叫不仁不义呢？对老百姓不施仁政，饿死几千万；国民党旧政人员，杀的杀，关的关……我看，老毛是个历史罪人。

卢汉1974年去世，他后半生那20多年里，一声不吭。他不敢吭声。我们去看他，都住在他家里，他什么都不说。他能改变什么？

这辈子，怎么说呢？说难听一点，我们心理上有阴影；说好听一点，我们这些人都是很坚强。坚强才能克服这么多障碍，这么多困难，活到今天。这几十年的日子，紧张紧张，惊惊惶惶。不过，从某种角度上说，我们这一代人是最幸福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见多识广，什么事我们都亲身经历了！哈哈——

采访时间：2007年12月18日

地 点：云南省体育局家属宿舍

采访后记

又一次失业一年半后，我到昆明寻找工作，在这儿偶然遇到了卢家的后代，51岁的卢尧生，并得知他外婆土改自杀、婆婆文革自杀。同时，也得知他父母还健在。于是，我第二天晚上便登门拜访了两位老人。

卢尧生的母亲彬彬有礼地送上一杯茶后便退回卧室不再出来，我很失望，没能听到她的讲述和感受。幸而他父亲卢国柄老人很健谈，一一讲述了那逝去的一段历史。



年轻时的卢国柄

本篇照片由卢国柄提供

一张收条救了我爷爷

讲述人：段 X

我是云南滇西 XX 县人，我爷爷段 XX 是当地的富豪，在 XX 县有很大的产业。1936 年 4 月，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率领红军二、六军团来到 XX 县，四下征粮征物。为保一方平安，我奶奶苏 XX 代表县妇女协会给贺龙的部队送了一大批物资，有鞋子、布匹等等。为了回去对协会有个交待，奶奶要求红军打个收条。红军给了收条，据说贺龙还签了字。收条是直接开给我奶奶的，上面写着我奶奶的名字。

当时，她绝没想到这收条十多年后会救我爷爷的命。

土改时，我爷爷和他弟弟都被抓起来。爷爷的弟弟（他叫段 XX）没多久就被枪毙了。接下来就要轮到爷爷，我奶奶急得要死，不知怎么办好，危急中，突然想到那张收条。她慌忙把收条翻出来，拿着收条找到土改工作队，说当年我家就支援红军，有收条为证。工作队的人看到收条，认为我家虽是剥削阶级，但对革命有功，因此刀下留人，放了我爷爷。

……

我们家不算遭得惨的，在云南，土改的血腥多得很，不要以为少数民族地区会好一些，其实，少数民族地区土改的血腥和荒诞一点不亚于你们内地汉族地区。就说荒诞吧，我当年在工地上劳动时，认识一个“捡来的地主”。解放前这个人是一个帮人赶马的苦力，有一次在赶马途中遇到土匪，主人被打死了，他赶的马队有七匹马侥幸逃出来，他将七匹马和马上驮的茶叶赶回了家。回来没几天就解放了。土改时，因为这七匹马和茶叶，把他划为地主。在工地上劳动改造时，他唉声叹气地说，解放前我一辈子受苦受累，无意中捡回几匹马，划成地主，解放后又是一辈子受苦受累，还挨打受气……

还有，我认识一个地主的后代，他们一家极其悲惨。土改时大人被杀了，留下七个娃儿，三年饥荒到来时，除了一个姐姐在城里读书，呆在农村的六个娃儿中饿死五个。一个妹妹饿死后，亲戚埋她时在她嘴里放了一元钱——当地人迷信，

含点钱到阴间去会好一些。剩下的最后的一个男孩感到自己也要饿死，要活下去只有逃。他身无分文，于是在半夜里悄悄扒开妹妹的坟——那是“软埋”的，只有一堆黄土。他从妹妹的嘴里把那一元钱掏出来，用这一元钱作路费到城里去找他姐姐求生。他姐姐还是个学生，怎么养他？后来，由于他营养极其不良，身体受到损害，人变得有些痴呆……现在他姐姐说起这事都要哭……

不多说了，你要是能留下来采访，内容多得很。

采访时间：2007年12月29日

地点：云南省昆明市正义路

采访后记

段X先生是我十年前流浪到云南大理时结识的朋友，当年就听他讲过他的家庭和他受家庭影响吃了很多苦头的故事。十年后又在昆明见面，聊起了他的爷爷奶奶。

几天后我又去找他，基于对他的了解——段X先生敢怒敢骂，是一个有觉悟，也有见识的人——我便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想将他的家史详细整理出来，收入我采写的土改真相一书中。

出乎我意料，他一口拒绝了。他找了个不是理由的理由：“我弟弟现在是XX县的共产党官员，目前仕途正顺，我不想因为这件事影响他……”

在采访中，我很多直接对讲述人坦言我采访的目的，因为我知道，一旦说明本意，采访便会失败。

我没料到的是，对我自以为很有把握的段X也会失败。

从段X处出来，是2007年12月29日深夜，我独自走在挂有“欢庆元旦，喜迎奥运”红幅的街头，心中十分感叹：共产党统治这几十年，已经非常成功地将恐惧和明哲保身融入了国民的血液中，使之成了我们国民性的一个显著特征。当谎言、恐惧、明哲保身、唯利是图成为了我们的“民族性”时，举办一届奥运会，获得几块奥运奖牌又有什么值得夸耀和骄傲的。

我不甘心把一段真实抹去（虽然只有短短的一段文字），又不想有违讲述人的意愿，于是，我只得把有关的人名、地名隐去，也去掉段X先生的采访照片。

“解放”几年后，我就成了孤儿

讲述人：张维源

1943年生

我家这个地主成分很独特，是“抢”了个地主来当。

我是四川崇庆县（现崇州）城关镇人，祖父张绍伯是个教书先生，一辈子在崇庆中学教书。我们家很穷，既没有自己的住房，更没有田地。不过祖父的大女儿，我的大姑妈长得非常漂亮，当时是崇庆县的县花，她被崇庆县姓杨的商会会长看上了，非要娶她。商会会长比我姑妈大得多，他的儿子就同我姑妈一般大。在他的一再威逼下，姑妈答应了，但她提了三个条件：一，婚后不在家当少奶奶，而要继续读书，上大学。二，不在崇庆县住，而要住在成都她读大学的地方。三，不信天主教（因商会会长家信天主教）。

商会会长一一答应了，于是我姑妈嫁给了他。

婚后杨家给了我45亩田，并且让我父亲当了田粮管理处一个乡的仓库主任。

我家一直很穷，姑妈的婚姻才让我家的日子好过一些了。但是，这个婚姻后来给我全家带来了灭顶之灾，因为这时离1949年“解放”不远了。

姑妈婚后我们才买了自己的房子——一栋旧房子。等装修好搬进去住时已经是1949年了，你看看！

刚“解放”我祖父就被抓来关起，说他加入了民社党。1951年，我记得那是油菜花开的时节，监狱来人通知我妈妈，叫第二天去把祖父接回来。当时家里只我妈妈一个大人，父亲也已经被关起来了。祖父回来时，只剩下一口气了，那个样子惨不忍睹！

他看到油菜花，长长地吸了口气，说：“我终于呼吸到了新鲜空气。”

他没见到我弟弟张维绍，就问他到哪去了。我弟弟非常聪明，人又长得很漂亮，祖父最喜欢他。妈妈说：“我把他送到外公家去了。”

祖父叹口气说：“好，去逃条生路。”

其实，我弟弟在他出狱前三个就去世了。他拉肚子，脱水，没钱医治，走了。

祖父回家的第二天就死了，监狱里知道他不行了，不想让他死在牢里，便让我们把他接回来。

我祖父是个非常好的人，一辈子教书，人缘极好。举个例子，他母亲去世后，崇庆中学的师生自发地来送葬，队伍阻断了三条街，几乎所有的师生都来了。

我父亲张森楷还走在祖父之前。父亲因为当过仓库主任，“解放”后便被抓到“自新人员训练班”学习，在“训练班”里，他们让父亲搞伙食。父亲是个胆子很小的人，他看到今天拉几个出去杀头，明天拖几个出去枪毙，吓得不得了，成天提心吊胆，不知哪天杀到他头上，于是，他借外出搞伙食采购的机会，逐步买了共100多颗安眠药。一天，他打了杯酒，用酒将100多颗安眠药全部灌下了肚。他偏偏倒倒走回家，满面通红。父亲从不喝酒，母亲一看他那个样子，吓坏了，赶紧去找医生。医生来看了，说是吃了安眠药，于是撬开嘴，用鹅毛头伸进去搅，但为时已晚，父亲永远睡过去了，那时他才三十多岁。他死前给我母亲肖淑芸写了首诗，我还记得其中的两句：“寄语芸卿休爱怜，来日黄泉路上见。”



中共编造的地主刘文彩庄园里的“水牢”

我祖母是个家庭妇女，她目睹了儿子和丈夫的死亡，精神受到很大的刺激，外面又轰轰烈烈地在搞土改，斗地主、减租退押……



冷月英在讲述坐“水牢”，受地主“迫害”的故事（中共的宣传图片）

那天，祖母独自出门，往那45亩田土的地方走去。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安乐乡的李家巷子。我们在那儿有一间房子，祖母在里面呆了一会，然后走进旁边一家农民的屋子。她在那儿找到一把镰刀，把镰刀磨亮，用它割自己的颈喉。血溅得到处都是。但祖母没死，血流多了，她口干，于是往外面的一条小河爬去，她爬到河边，喝了几口水，死在河边了。

她身后，留下了一条长长的血痕。

接下来是我的四爸张庭楷，他是很聪明的一个人，大学毕业生，在崇庆县银行工作。他算盘打得极好，可以两只手同时打，只打一遍，绝不出分毫差错。“解放”后他被抓起来同我祖父关在一起。因为他有文化，于是叫他在监狱里给那些犯人扫盲。不料，一个妓女爱上了他，为这事他被加重惩罚，说他在监狱里还不好好改造。四爸一气之下投井自杀了。那是1952年。

还有，我妈妈的妹妹，即我的姨妈，叫肖淑玉，她的岳父是国民党的一个旅长，姓陈。“解放”后，她岳父被枪毙了，家产也全部被没收了。他的两个女儿，一个读高中，一个读初中，在放假回家的半路上听说家里已经家破人亡，两姐妹抱头痛哭，然后拥抱着双双跳进了岷江。我姨父是重庆大学毕业，正在崇庆教书，他听说两个妹妹自杀，只说了一句话：“覆巢之下无完卵。”前两年，我见到我姨妈的儿子陈出新，他在旧历七月半烧纸祭祀父亲时（我姨父已去世），也为他的两个投江的小嬢嬢烧纸祭祀。

土改时我们家只剩下了妈妈、妹妹和我三口人，为那45亩地我们成了地主，农会把我们家抄了，抄得只剩下空空的四壁，床、被褥、衣服，什么都没有，我们母子三人，蜷成一团，睡在农民搥谷子的搥斗（川西叫“拌桶”）里。妈妈每天还得出去劳动，干什么呢？把地主坟上的墓碑撬下来，用石磨把上面的字磨掉，然后运去修烈士陵园。妈妈一大早就得出门，晚上才回来，我和妹妹饿得哭。有一天，饿得实在不行，我背起妹妹去找我姨妈讨点吃的。走到卫生院时，我饿昏了，眼一黑，一头栽倒在卫生院旁的一条臭水沟里。妹妹一头一脸的污泥，只剩两只眼眸是干净的一一那张脸永远留在我记忆中。

妈妈看这不是个办法，决定把妹妹送人。送谁呢？妹妹是1949年初出生的，生下来后家里请了一个姓陈的奶妈，她是个忠厚善良的女人。妈妈找到她，她满口答应，于是妹妹去了陈奶妈家。我很舍不得妹妹，妈妈成天在外劳动，只我和妹妹相依为命，她一走就剩我一个人了。

可妹妹在陈奶妈家没呆多久。陈奶妈丈夫的弟弟是个土改民兵队长，他揭发，说陈奶妈收了个地主子女来养。没办法，只得把她又接回来。路太远，我背不动，

请了一个姓胡的邻居帮我背。妹妹回来后，我们又相依为命，一直到1955年。

那时，没生活来源，妈妈只得出去帮我三爷爷守家，挣口饭吃。晚上就是我和妹妹睡。我夜里睡着了把铺盖掀开，使妹妹受了凉，发烧，烧成肺炎。家里一贫如洗，哪里有钱看病？妹妹拖了两个多月，那天夜里，她不停地呻吟，我拿脚蹬她，慢慢没有声音了。我觉得不对劲，点起煤油灯一看，妹妹眼睛都定了！

我赶紧跑出去找一个认识的姓邓的医生。邓医生来看了看，说：“不行了，没救了。”

我一听，发疯般地扑上去，抓住邓医生，叫喊着说：“你一定要救她！”

邓医生留着长长的山羊胡子，我在狂乱中把他的胡子都揪下一绺！

可是，与我相依为命的妹妹还是走了。她叫张维英，死时才5岁。

我三爷爷听说妹妹死了，只说了一句话：“死了好！死了就解脱了。”

家里每死一个人，我们就下一扇门抬出去埋葬，家里的六扇门都是下完了的。

妹妹去世后不久，妈妈就到重庆帮我孃孃带小孩。可这时她的身体已经不行了，家里亲人一个接一个的死亡，给她造成了致命的打击，惊恐、悲痛、劳累等等损伤了她的心脏。1958年，她因心脏病猝然去世，那一年她刚刚40岁。

我们家只剩下我一个了，“解放”后几年时间，我便成了孤儿。

幸好我孃孃和姑父对我很好，大饥荒那几年，姑父自己饿得水肿，但每次送我上学，他都要请我吃碗阳春面。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碗阳春面，它比世上的什么东西都珍贵。孃孃和姑父还坚持送我读书。我成绩一向很好，但由于是地主子女，小学毕业后便停学，后来费很大的力进了初中。毕业时我俄语85分、语文93分、历史97分，但进不了高中，又停学一年，后来终于读了高中，毕业时是1963年，我已经20岁了。

毕业后我下到长寿湖，养了十年的鱼，后来进子弟校当老师，由于工作出色，又当了子弟校的校长。

今年端午节我回崇庆县，表弟把我带到人民医院的四楼上，指着远处的一片竹林说，你的老家就在那儿。

当年的住处早已被开发，成了密密麻麻的楼房，但那片竹林还在，那是因为一个“钉子户”拒不搬迁留下的。

我望着那片竹林，心情十分悲痛——那儿埋葬着我的六位亲人！要不是在医院，四周有病人，我当场就要跪下去……

可我妈妈连一块葬地都没有了。

1964年，我姑父被打成右倾分子，惊恐中，他们不敢再保存我妈妈的骨灰——一个地主分子的骨灰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灾难。无奈中，姑父在一个漆黑的夜晚，

将妈妈的骨灰盒投入了长江。

采访时间：2009年7月6日

地 点：重庆市九龙坡区西郊医院

采访后记

张维源老先生是唯一一个登门接受采访的老人。

如此，我想当然地认为他一定心无恐惧，敢说敢言。于是，我第一次当面提出可不可以将他的讲述录制下来。不料，老人不同意，他说，他最大的心理障碍就是恐惧。

他给我讲了一段往事：

1970年我在长寿湖结婚，打算用伙食团的一间屋，于是便打扫了那间屋子。不过后来我们没用那间屋。

一天，军代表突然把我抓去审问，问我在那间屋子里干了些什么，有没有现行反革命行为。他们勒令我老实回答，否则马上把我抓走，后果将非常严重。

审讯从这天下午一直到第二天下午，他们轮流逼问，不准我睡觉。

后来我才知道，在那间屋的一个窗子上，挂有一张毛主席的像。一天，有人发现毛主席的两个眼珠发光了！仔细一看，原来两个眼珠被戳了两个洞，透光了。

我看来是逃不过一场灾难了！地主子女嘛，阶级敌人，他们认定是我干的。

噢，说来算我运气好，一个叫鄢树云的渔场青年承认这事是他干的！

鄢树云因为出身不好，一直没讨上老婆。一天，他在缝补衣服时说：“长到二十五，衣服没人补……”他看到窗子上的毛主席的像，又说：“毛主席呀毛主席，你有眼无珠。”说着，他起身用缝衣针在毛像的眼珠上戳了两个洞。

鄢树云被判了五年徒刑，押到位于大凉山区的雷波县劳改。

“这几十年来，真是如履薄冰，被整怕了呀。”老人说。

但是，亲人的血泪堵在心头多年，憋得难受，老人又时时刻刻渴望倾吐。否则他也不会找上门来。于是，在恐惧和渴望都极其强烈的两股情绪的交织冲撞中，老人讲述了他一家的遭遇。

可惜的是，他不时流露出的深深恐惧和担忧让我不得提出给他照像，因此，缺失了张维源的采访照。

我家是怎么评为地主的

讲述人：李乾定
涪陵李渡区大柏树乡人
1937年生



我爷爷那一辈相当贫穷，日子苦得很，苦到什么程度，我爸（他叫李庭方）很小就不得不到涪陵去捡垃圾来维持生活。他大一点后，去跟我的一个姑爷学做面。后来又回大柏树去一个面馆帮人，帮人就是现在说的打工。再后来他到贵州去做生意，挣了点钱，回来买了15担谷的田。租子是四六开，佃户得六，他得四，此外他还有一点土，土地的收成全部归佃户。15担谷的四成只有六担多，一担是三百斤，六担不到两千斤谷，而且上公粮是收租人上，佃户不上。谷子只能打七成米，我们家是六口人：父母、我们三弟兄和一个姐姐，

这点收入根本不够维持生活，因此我爸只好去做面生意来支撑这个家。

这点土地和收入原本划不上地主，就以当时的政策，按人均土地算，我们也不高。还有，在我爸买地之前，我们一直在租别人的地种，给别人当佃农。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爸爸买那个田地很偏远，只好出租给人家种。像我家这种情况，根本不该划地主。问题出在那个乡长身上，他没有文化，我爸一字不识，他也一字不识。他说，只要你出租了土地就是地主。他还说，给你评个地主挂个名，也不收你财产，也不斗争你。其实，当了地主就要收我们的财产，我们当时收了两担包谷，他们把包谷收缴了，我爸找到村上，当时我二哥抗美援朝参了军，我们算是军人家属，村里出了个条子，我们才把包谷保下来。那时我家很穷，没什么财产，有一个石磨子很好，被一个叫沈子玉（音）的人看上了，他想搬走。我去对他说，上面有指示，军属的财产不动。这样才把石磨子保下来。

后来搞社教运动，工作组来的人了解了我家的情况后说：“你们家怎么会评成地主？你怎么不上诉？”我爸说：“我没得文化，当时他们说斗我，不分我财产，我想，当就当吧，反正是这样过日子。”

工作组的人按政策把我家划成贫农。不料，其他人反对，说：“你这个工作组哪个一来就把成分变了！”这事就没干成，我们就一直当地主。

虽然我爸没被斗打，但是，这个地主帽子可怕。我去当兵，不准；我老婆本

是妇女队长，同我结婚，马上就把她开除了，说她同“老虎”睡在一起。

采访时间：2014年2月6日

地点：重庆枣子岚垭

采访后记

春节去邹锡昌家时偶然遇到李乾定老人，窄小的客厅里，挤了好些人。大家七嘴八舌，插话不断，因此，影响了采访完整地进行。

想来，老人还有很多“料”我未能挖掘出来，是个遗憾了。



湖南省岳阳县麻塘乡农民在看张榜公布的成分。选自“中南土地改革的伟大胜利”

一无所有后的万幸

讲述人：胡友权

1938 年生



我妈妈龚肃英是长寿县大洪河龚家岩的人，生于 1907 年。她很年轻时丈夫就去世了，她出生不久的孩子也夭折了。那时她的奶水特别好，有人就介绍她到重庆来当奶妈，她就是这样到了重庆。她同东家处得很好，孩子奶大之后她仍留在那家当佣人。东家对她说，你还年轻，最好找个人家，他们当真给她找了一个，这个人就是我的父亲胡裕发。

我父亲是合川人，少年时到重庆来求生存。他只读过一年私塾，勉强认得几个字。他每天提着篮子，走街串巷叫卖花生、瓜子、香烟。那时卖香烟不是一包一包地卖，更不是一条一条地卖，而是一支一支地卖，买的人大多是些苦力。那时也没打火机，火柴又很贵，怎么办？他在提篮上插一支香，人们买一支烟，对着香点燃，吸完又去干活。他大一点后又到长江里挑水卖，就在千厮门的水巷子那儿。后来他觉得这也不是个办法，还是得学门手艺，于是他学了泥水匠。他这个人很本分，人缘关系也好，不久就开始独立接些活干。他的发展在抗战时期，那时重庆很多房子都被炸了，修建的量很大，捆绑房子他建，砖木房他也建，就这样他慢慢地发展起来，成了个小包工头。解放后给他评的成分是工商业主。

再说我妈，她比我爸小 20 多岁，结婚时我爸都快 50 了。婚后她生了我和我弟弟，不过我和弟弟都没吃到我妈的奶，为了挣钱，她仍去给人当奶妈。对了，当年吃她奶长大的那个妹妹，现在我们都还有往来。

由于她同我爸年岁悬殊，她担心我爸一旦有个三长两短她没有依靠，我乡下的舅舅对她说，你还是到乡下买点田稳当些，今后靠着田地生活有个依靠。于是我妈把她当奶妈、当佣人挣的钱和我爸积蓄的钱拿到她乡下去买了 20 多担谷的田（注：川东一般不讲亩，而讲多少担谷。一担谷为 350 斤，有的地方为 300 斤。）。那个时候已经快解放了，那是 1948 年吧，有些消息灵通的人已经在卖田地，我妈不知道，在这个时候还去买田。她买了田后共收了两年的租子

就“解放”了。这两年租子只有头一年的运到了重庆，给我爸工地上的工人吃。第二年的谷子还存在乡下。土改时妈慌了，她觉得这点田来得不容易，她想守住这份财产，于是她把我和我弟弟从城里带到乡下。她心想，我们母子三人平摊那点田就评不上地主，最多算个小土地出租。她还想去解释，那田是她当奶妈、当佣人和丈夫打工挣的钱买的。嗨，她太天真了，别人才不管那么多，不管你买田的钱是怎么来的，反正说那是剥削。他们不仅把她评成地主，还认为她是从重庆城里来的，有金银手镯，要追缴浮财。她被抓到一个堂屋去斗。怎么斗的我没看见，我才十来岁，不要我们小孩去看，我只听到从堂屋传来吼叫声。不过，我妈没挨打，那儿是她的娘家，湾里的人都沾亲带故，斗她虽然口号喊得凶，但过后他们悄悄来给她道歉，说：“我们没办法，工作组在这儿，不这么干不行。”我妈也很理解，一点没恨他们。

我印象最深的是抄家那天晚上，是半夜抄家。农村那时没什么立柜，装东西是一个大扁桶，东西先打成包袱，再一个个装进去。我们的衣服都装在里面。抄家的人来后让我们拿了一两件衣服就把扁桶贴上了封条。当时我站在一边，吓得浑身发抖。

我记得那次土改搞的时间不长，从1950年的冬天到1951年的春天就把土改搞完了。（注，四川土改分为三个阶段，胡提到的是第一个阶段。）

开春后我妈对我说，你不要管家里的事情，他们怎么斗怎么抄你都不要管，你自己该念书就念书。

我幸亏是去念书！

我到街上去读了一年半的小学，1952年就去考初中，乡下没有初中，只有长寿县城和重庆才有。当时城里人外出要派出所开一个探望证，城里人凭探望证通过关卡和住店。农村没有派出所，外出就凭村里面开个路条，上面盖一个村长的印章。其实那个章只有村里人知道，出了村外面的人谁知道他是村长。我就拿了张盖着村长印章的路条到重庆去考中学。我幸亏走得早，若到合作化时就出不来了。我要不出来就惨了，地主崽子，那个日子悲惨！

那时重庆所有学校都是自主招生，学校招不起生就垮。

在学校填出身成分，我填了“包工头”，因为我爸就是干这活的。老师说，哪有这个成分，你就填写地主



1961年春节胡友权（后左一）与父母、弟弟合影

吧，于是我就填了地主。

1954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上面有文件，学生的户口都要迁到学校。管生活的老师问我，你的户口怎么还没迁来，我说我是农村的，要学校出证明才能迁，学校给我出了证明，也没问我出身成分。这样我跳出了农门。

我妈一直在农村种地，爸爸从城里给她一点接济，但她是地主，不敢出去买东西，都是我舅舅悄悄去帮她买。我妈炒菜，不敢放油，油在锅里一响，香味传出来，不得了，别人说你一个地主还要吃香喝辣。后来，我爸爸叫她到城里来，她来了。这个时候爸爸已经不能承包工程了，只能干点泥水匠活。妈只得又去给人当佣人。当时市中区的安乐洞是个雇佣市场，我妈到那儿去求活。沙坪坝区（当时叫三区）法院的院长需要个保姆，他看我妈还可以，就雇用了她，也没问她是什么出身。干了段时间，法院院长对我妈很满意，就叫她把户口转来，那时一般是人在哪儿户口就在哪儿，法院给她出了个手续。当时只有乡上才有管户口的人，碰巧我舅舅认识他，他见了法院出的手续，也没问我妈的成分，就放行了。这样，我妈的户口顺利地转到了沙坪坝。不过，法院院长很快知道了我妈的身份，大概是他们内部相互有联系，一个地主到哪儿去了？！法院院长马上辞退了我妈，但户口没有退回去，而是转到了南岸区我爸爸那儿。这样，只有我弟弟还在农村。由于我们一家人都在城里，弟弟的事就好办了，不久，他的户口也转来了。

就这样，为那点土地，我们母子三人从城里下去，折腾几年，一无所有地又回到重庆。不过，不幸中的万幸！幸亏我们走得早，回来了，否则，我们活不出来！合作化、人民公社那些年就会饿死你。

可是，几年后我爸饿死了，那是1961年。他死前全身浮肿。

采访时间：2014年1月22

地 点：重庆南岸区回龙湾小区

采访后记

胡先生是在网上看到有关文章知道我的，他打听到我的电话后同我联系。在电话上他就谈到他的家史。本来，土改的采写工作早已完成，虽没出版，但已经编排好了。可是，一旦听说有人了解土改的情况，我仍怦然心动，又正好是寒假期间，于是，我当即前往，在胡先生独居的小屋里，听了他的讲述。

要补充的是，虽然胡先生幸运地从农村逃了出来，但由于是地主出身，1964年他在四川大学毕业后不得不远走东北边疆，他在伊春呆了几十年，晚年才回到故乡。

土改复查——从中农到地主

讲述人：张轩美

退休教师，长寿县双龙乡人

1936年生



土改时我十五岁，是个农村娃儿，在读小学。那时我很活跃，扭秧歌、演剧。打、斗地主，分五大财产这些我都看到过，印象最深的是1951年5月1号劳动节在燕儿塘开的公审大会。我们学校也组织小学生去参加，我那时上小学六年级。那是个万人大会，几个乡的人都来了，人多得很。会后就是枪毙人，我们双龙乡枪毙了70多个。被杀的人跪成一排，一个民兵打一个。由于没有这么多民兵，因此70多个人是分两批打的。关在仓房里的人听见枪声，在仓里乱蹦乱叫，但他们都被捆着。打完后我走近去看过，全是打的脑壳，脑浆打得一地都是，脑壳打成个空壳壳。那一次我记得一共打了两百来人，我们双龙乡最多，因为双龙是最大的一个乡。我上学要经过那个地坝，后来我路过时，尤其是晚上，怕得不得了。那时杀人随便得很，民兵连长、村干部，不经过审批，就可以杀人。举个例子，就在我们学校门口，一个人押着另一个人，走到操场上，一枪就把他打死了，他们两个以前还是朋友。还有，我后来在武隆县工作时，听说有一个民兵押着一个人去开公审大会，在路上他嫌麻烦，一枪就把他解押的人打死了。

在那个五一之前，经常都在枪毙人，但五一节那天规模最大，我记得名字的有我们村被枪毙的地主余晓放（音），他家有一百多担谷，算大地主，还有我们双龙乡的乡长韩树凡。

那时打死的人很多都是冤死的。比如说我在长寿中学读书时，我们那个校长黄云成（音），他是个民主人士，他的父亲曾经做了很多好事，可是，把他评成地主，就把他打死了。我现在看《炎黄春秋》，上面谈到那时错杀人，我觉得那是肯定的。

1951年我读小学时就知道，田土要解放前三年买的，出租土地好像是要占70%以上才算地主。我们家的土地是祖上传下来的，在我祖祖那一辈，有一个地主吃鸦片败了家，于是我祖祖从他手里买了八十担谷的田土，分给我爷爷那一

辈——他们是两兄弟——各四十担，我爷爷又有两个儿子，各分20担谷，因此，到解放时，我家是20担谷。川东地区不说你家有多少亩田土，而说你家有多少担谷，湖南就是说有多少挑。一担谷是350斤，这我很清楚，因为我挑谷子去卖过。说是20担谷，实际上打不了那么多，我记得一年下来只能打12担左右。我们家有十口人，我母亲生了三个，后母生了四个，加上我婆婆，整整十口人吃饭。农村的针线钱、灯油钱、读书钱等都要靠卖点谷，比如我读初中要交16元钱（后来叫16万）就是用四头骡子驮谷子去卖了换来的，记得那天把我爸卖心痛了，一担六斗谷子推的八斗米才卖了16元。正因为20担谷的田土不够一家的生活，因此我们又去租了地主10担谷的田。所以，解放前我们家既是自耕农也是佃农。要说雇人，最多就是在农忙时比如栽秧割谷时请人帮个忙，那时你帮我我帮你，我们也去帮人家呀。我家没有一分土地出租，反而租地主的地种，因此在土改划成分时，我家被划为中农，我二爸也被评的中农。

我家的不幸发生在土改后的那个复查阶段，那是1952年，当时我已经到长寿中学读书去了。这个复查把我家由中农提成了地主（我们村里另外还有一家）。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原因在于村里那个农会主任（他姓胡）同我家在解放前有些矛盾，他就借这个复查把我家划成了地主。当时村里人就说，你家算个哪门地主？所以，那时划成分就乱来。我说呀，中国人的素质——忌妒、仇恨、斗过去斗过来——

中农成分和地主成分是有本质的差别呀！一划成地主，就要被抄家，收田地、收五大财产。灾难马上就降临到我家头上。我爸叫张学忠，他有文化，字写得很好，家里还有不少藏书。他们来收缴五大财产，要房子、铺盖、家俱等。他们把我家的藏书也用车子推走了，整整推了四、五车。他们对书画没有兴趣，便把书画堆在石坝上一把火烧了。其实那些书画才有价值，里面还有郑板桥的真迹。

划为地主后，我父亲不仅被斗，还经常挨打，他受不了，被迫外逃。当时我已经在武隆县工作了，他还来找了我，他说在生产队经常挨打，活不下去。后来他逃到哪儿去就不清楚了，听人说他跑到重庆中梁山煤矿挖煤，1959年下半年还是1960年，他死于瓦斯爆炸，据说那次事故死了三百多人。

我的后妈也是被逼死的，她姓姚，人们叫她张姚氏，我的母亲在我五岁时就死了，我后母是个非常忠厚非常老实的人，她不识字，平时话都不说，可因为她是地主婆，一直挨整。那些年，对地



张轩美 1959年

富反坏右的家属他们可以随便整。打她的人是个民兵连长，叫胡绍凡（音），另外还有个姓乔的。他们把她吊起来打，她受不了刑，当天喝农药自杀。那是文革后期，大概是1976年。她的死导致她的小女儿，也是我么妹，神经受到很大刺激，她一个人在家，无父无母，精神失常了。我么妹叫张新，她现在还在，病情好些了，但说起这事就哭。



墙壁上的“五类分子监督台”，警告“五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五类“阶级敌人”），到处都有监督的眼睛。（网络图片）

我算很幸运的，读书离开了农村，虽然因为地主成分受了不少影响，但大体还算平安。

哦，对了，当年我们那个房子现在还在，我们被划成地主后，那个姓胡的农会主任让他姐姐搬进去住了。前些年我回去看，姓胡的把他们占的那部分卖了，有人叫我在旧地上重建，我说不，就让它立在那儿，作一个历史见证。

采访时间：2014年1月23日

地点：重庆南岸美堤雅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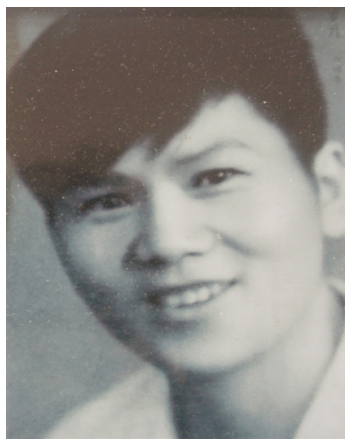
采访后记

张老先生从一个朋友那儿读到我写的《长寿湖》，很想同我见个面。两天前相见时我偶然得知他也是地主子女，于是便表示想听他聊聊。他很爽快地答应了。23日，在采访胡友权先生后的第二天，我走进了他的家。

土改时，张先生和胡先生都只有十多岁，他们所见所闻不多，另外，他们后来都读书离开了农村，没有亲眼见证农村那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不过，他们对当年发生在自己家中的那些事却是记忆深刻，毫不含糊。记录下来，仍是有价值的。

再过些年，连张先生胡先生这样的见证人都不会有了。

补记：张轩美老人于2015年去世。



张轩美 1961年

徐氏家族，人亡家破

讲述人：徐 瑗



一、孝悌大家庭

我的祖籍在湖南常德，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对我谈起他的老家。后来，我从一些书籍中逐渐了解到，湖南是富饶而充满传奇的土地。“三湘四水”、八百里洞庭，自古以来就是“长江文明”的发祥和集散之地。在这块神奇的大地上演经过“湘妃泪竹”、“柳毅传书”等美丽动人的故事。岳麓山下、湘江两岸，古往今来涌现了多少英雄豪杰。我的家族就在这片沃土上世代繁衍生息。

我的爷爷徐少楷，是清光绪年间一名秀才。祖母伍氏粗通文墨，由她主持族中的事务。我的三位伯父，在爷爷和祖母严格的正统教育下，也象那个时代的读书人一样，“仁义礼智信”成为他们的行为规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们的人生的追求。满清王朝被推翻后，他们仕途无望，家道随之中落。爷爷无奈地放弃他引以为豪的儒业，屈尊他不齿的“商贾”。

一介寒儒半道出家，自然艰难，终年的劳作难以维系一大家人的生活。每到年关就是爷爷最难过的日子，他为逃债东躲西藏。后来，随着伯父们依次成人改学经商，家庭经济才逐渐好转。

爷爷和祖母是这个大家庭的中心，具有至上的权威。他们向四个儿子儿媳灌输传统的忠孝、孝悌思想。在爷爷和祖母的教育下，三位伯父和我父亲都具有超凡脱俗的风骨。那段时期是徐氏家族最欢快的日子，整个大家庭处在亲情的温馨中，弟兄之间相互关照，妯娌之间和睦友善，她们都是旧式的贤妻良母型妇女，相互间犹如姐妹，共同操持这个大家。

大伯、大伯娘是族中的长兄、长嫂，主持大家庭的日常生活，他们为大家做出了榜样。大伯娘尤其贤惠，她上孝敬公婆，下照顾我幼小父亲和侄儿们。她待我父亲如母，我父亲是吃伯娘的奶长大的。我从父亲的自传中，看到专门对大伯

娘贤惠的描述，他从小对我们兄妹讲得最多的也是大伯娘的贤惠善良。父亲的话，植根在我心中，让我懂得了什么是贤惠，什么是奉献，什么叫感恩。大伯的女儿徐锬后来告诉我，父母们每天早晚都向祖父母问安，外出归来必先至祖父母处请安禀报，整个家庭上慈下孝、兄友弟恭。岁末年关，是徐氏家族最繁忙的时候。除夕祭祖，徐氏先祖的画像高挂在大堂之上，堂中祭案上红烛高照，陈列着三牲祭品，时辰一到，爷爷、叔爷（徐幼楷）便率族中的各房兄弟及儿孙，慎终追远祭祀先人。

逢至清明，爷爷和叔爷率各房儿孙十几口人，乘船到德山祭祖。潇潇春雨，声声杜鹃，在纸蝶纷飞中，爷爷兄弟俩和两房的儿孙们都沉浸在默默的哀思中。随后，爷爷向晚辈们一一指点哪儿是高祖的坟墓，哪儿是世祖的墓地，并告诉我们，徐氏原籍系山西太原，唐末为避黄巢战乱迁至江西南丰，明末清初，又为避战乱而迁移到湖南常德。

之后，随着时局的变迁，徐氏大家族解体了，然而徐门的许多优良传统，仍然在我们各房的后代传承。徐家的横扁木凳中刻印的“徐四教堂”至今仍保存在老家。

二、血红新社会

1949年，共产党打下了江山，彻底破灭了爷爷心中残留的“仕”梦。不过，爷爷及家族中的所有成员仍然选择了留在大陆做一个守法顺民。可是，政治和历史并不是一本简单的“三字经”、“千字文”，可以任由爷爷熟稔地指点解读。

灾难转眼降临到我家族中。

我简单介绍一下我的三个伯父。

大伯徐博文是个秉性宽仁敦厚的谦谦君子。作为族中长子，他承担了家庭的重担和责任，全身心地维护徐氏大家庭，渴求光耀徐氏门庭。为使书香延绵悠长，他毅然弃贾从文，创办报业，从事相关的文化事业。

二伯父徐仲刚儒雅平和，博学多才，且多谋善断。国内革命战争爆发后，他投笔从戎，投身到孙中山领导的北伐战争中，历经战事。当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昌之后，诸多现象预示中国的政局将有一场大风雨的降临。于是，二伯父便离开了部队，回到常德老家和大伯从事报刊出版事业，并与大伯共同承担起大家庭的经济责任。

三伯父徐叔安倜傥潇洒，精明练达。他深受数千年中国以农为本的传统思想影响，认为“土能生金”，“地”是立身之本。他极力购置田产，想以此振兴家业，不料此举日后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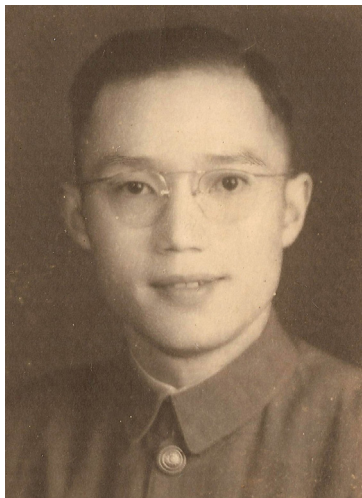
共产党在大陆打下了江山的同时，便奉行苏联的经验，对旧政权的旧职人员

进行彻底的铲除清算，以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

土地改革，清匪反霸，湘西剿匪等等，均采取了非常手段，造成了一种恐怖气氛，给人们带来极为惶恐的心理压力。这种恐怖在农村更为突出，一个乡政权，一个土改工作队，甚至一个农会都有剥夺人命的大权，可以不经任何审判就将人打死。那时的地主，富农，以及被认为的不良分子，生命如同猪狗。

我的大伯、三伯，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惨遭杀害的。

土改运动刚刚开始，三伯父就被划为地主，家中的一位佃户和地方上的一个痞子发生斗殴，那痞子被佃户失手致死。这就殃及到三伯，说他有命案，加上他曾在国民党县政府工作过，因此被判了死刑。



徐季正 1947 年

闻此噩耗全族五雷轰顶，大伯更是悲愤欲绝，他匆匆收拾行装，要去顶换三伯。他哭着说，弟弟年轻，一家老小生计全靠他，恳求放他一条生路，自己愿为他去偿命。大伯是我父亲最敬重的长兄，他为维护徐家家庭宁肯牺牲自己的生命。

大伯不仅没有救到三伯的命，反而自己送了命。

全族的人都没料到大伯会被枪毙。因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曾多次掩护中共地下党员。他作为报人，对共产党的政策有所了解。他认为共产党要追求的是一个民主、自由、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对此他很拥护，也很激动。他曾满腔热忱地投入到

当时的革命洪流中。解放后，他被新生的政权授予“开明绅士”的称号，每逢县政府开重要的会议，均邀他坐在主席台上。他将自己心爱的收音机也捐献给政府。

三伯的案子牵连到他，他们说，大伯临解放时曾穿过国民党的军装送妻子出城，他们以此定他的罪，捐献的那台收音机也被诬为收听“敌台”的罪证！

徐锬告诉我，在临解放的兵荒马乱时，大伯的新姨怀了身孕，儿女们又幼小，为保证他们的安全，大伯向曾在我家报社工作过、后又去国民党暂编师任职的杨春借了两套军装，混过当时警卫常德市的“暂编 XX 师”的关卡，将新姨母子护送出城安顿在乡下前河枫林口。

但是，他们不由分说，将大伯投入大牢。

我二伯为救他的两个兄弟，去找曾在我家《迅雷日报》与他共事的地下党员、解放后成为常德市地委宣传部长的方用，想请他出来证明我大伯是个正派好人。但那时谁敢出来仗义执言。

在牢狱中，大伯百般申辩，换来的是难以承受的酷刑。折磨中，大伯肺病复发，大口吐血，看守却不准他吐出，让他憋气咽下。在押赴刑场的途中，大伯大概还

幻想着会有“包青天”“刀下留人”的奇迹出现。在所有囚徒中，唯有他一个人悲愤高呼：“我上有高堂，下有未成年儿女啊……”“我冤枉啊，冤枉啊！我太冤枉了呀！”

听说他还向我们老屋的方向跪拜，为的是向高堂双亲辞行，谢罪。

行刑后，我小脚的姆妈跌跌撞撞奔赴刑场收殓大伯的遗体，在众多的死者中，找来找去，只能凭大伯穿的驼绒袍子的一个角，才辨认出来，因为大伯的整个头、脸连耳朵都伤肿得面目全非，无法辨认了。大伯送到乡下的新姨即将临产，她还挺着大肚子赶到刑场来看大伯！

两位伯父死后，整个家庭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一辈子讲究“忠孝仁义”的爷爷此时心如死灰，形同槁木。紧接着，居住数十年的老屋被强行“征收”，一家老少 23 人从此没有安身之地。1951 年冬天，爷爷在贫病交加中悲愤而死，死前他总是喊“追、追、追！！！”

追谁呢？追讨？还是追随他冤死的儿子？

祖母为这事哭瞎了双眼，她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去世了。

土改结束后，徐家四兄弟中只剩下二伯父和我父亲了。二伯成天担惊受怕，惊恐万状，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他和二伯娘婉姨在极其艰难贫困中，既要扶养自己的儿女，又要扶养失去父亲的子侄（孤儿寡母共 15 人）。婉姨为人宽容贤惠，同二伯在最艰难的日子中，相互帮撑，其中的艰辛，一言难尽！徐氏大家庭，沦为靠变卖祖上留下的文物字画度日。然而，独木难撑风雨飘摇的大家庭，族人只得各奔东西，自寻出路。二伯父在精神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下，不到 60 岁就去世了。

1957 年，徐家的第四个儿子，即我的父亲徐孝正，不幸又中了毛泽东的“阳谋”，作为极右被抓到大凉山劳改，一年多后，他死在那儿，年仅 43 岁。

就这样，我们徐家这个延绵百年的书香门第，在血红的“新社会”里迅速土崩瓦解了。

亲人之间音讯渺茫，生死不知。

几十年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千辛万苦寻找之后，我们徐家的后代才重新聚集。

1993 年 5 月 17 日，徐氏家门的后人四十多人齐聚湖南老家，为徐氏四兄弟举行合葬大典。

死于“土改”、死于“反右”、死于饥荒年的徐氏四兄弟终于在故乡的地底下团聚了。

那天，四兄弟遗下的妻子和儿女们，在合墓前长跪不起，悲痛欲绝。积压心中几十年的愤懑、屈辱、思念、愧悔、悲痛，如江河决堤一泻千里……

2004年11月3日，我与徐锬到重庆南岸老君洞凭吊我父亲。我们眼前出现当年被抄毁的那一张张发黄褪色的老像片——

——当年，他们或身着戎装，英俊威武；或西装革履，风流潇洒，那么富有活力，充满自信。

“仁义礼智信”；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

然而，土改的枪声响了，反右的“阳谋”来了，三年的大饥荒来了，他们朝气蓬勃的生命，连同他们的才华、理想、抱负，统统灰飞烟灭。

我们情不自禁跪到在湿漉漉的地上，双手合十，热泪滚滚……

采访后记

在采写五七年右派期间，结识了徐瑗，并了解了她父亲徐孝正的经历（收集在《长寿湖》一书中）。后来，谈到土改，她告诉我，她们徐家的亲人也有死于土改的。我于是请她将有关情况写出来。不久，徐瑗便传来了她写的文字和她堂姐徐锬写的文章。以上这篇文章，便出自她们的手笔。



徐家后代在坟前

爸爸和四爸之死

讲述人：张道高

西南师范大学医院退休医生

72岁



我是重庆白市驿的人，土改时我刚初中毕业。我父亲叫张继騫，他毕业于武汉一所法学院。在武汉读书时他认识了我母亲，当时母亲在武汉纺织专科学校读书。在武汉时，父母都支持共产党，参加了不少共产党组织的活动。

土改时，父亲在外工作，但我母亲住在白市驿乡下，他担心母亲，于是回到老家。他一回来就被抓来关起，关在一个谷仓里，关了很长时间。后来，乡里接到通知，叫把我父亲押到县上去。当时巴县县府在鱼洞，从白市驿到鱼洞要走很远的路。由于长期关押，父亲身体已经很虚弱，出门陡然暴晒，他支持不住，在路上倒下去了。他究竟死在途中哪儿，谁埋的尸，或者说埋没埋，我们一概不晓得，当时根本没人通知我们，他死后好多天我们才得知此事。

父亲去世后，母亲继续挨整，后来长年累月被当作地主分子批斗，直到她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去世。

土改时，我四爸张立夫被枪杀了。四爸毕业于上海同济医科大学，解放前他有两辆二手客车，跑白市驿到城里的客运，此外在城里还开了几家旅社，当然也有点土地。共产党来后把他评为工商业者兼地主。最初共产党需要用有文化的人，还让他当了白市驿镇的镇长。但是，一天，突然来人把他抓走，第二天开个公审会，会一完就把他枪杀了。

我四爸很喜欢我，开公审会时我想去看他，又害怕。犹豫了一阵，我还是去了。刚好遇上他被五花大绑押去枪毙，我不忍心看，用双手捂住脸，但又想看，于是从指缝里看。四爸发现了我，他边走边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最后看了我一眼……

他们把他压跪在地上，打的头。

为什么突然杀他？据说是有人反映，说他有一只手枪，搜查没找到，四爸不承认，当然也交不出来，于是就把他杀了，杀了放心些。

土改的那段日子，是我一生中最苦痛的记忆。家里被搜刮得一无所有，没有吃的，我和我哥哥（他大我一岁）天不亮就起身走十多里路到位于山洞的凉风垭去捶石子（修公路用），中午没饭吃，要饿到晚上走回家才能喝点稀粥。后来又去挑砖挑瓦，从山洞挑到林园。冬天地上结霜冻，我们没鞋，赤着脚走在结冰的地上。

不过，印象最深的还不是挨冻受饿，而是恐怖！

我们每天干完活，天都黑了，在回家的路上，要经过一块被作为刑场的空地。当时，经常在那儿枪毙地主和其他什么“分子”，一排排地杀。杀后好多尸体没人收埋。为什么没人收埋？一是一些地主家属不敢去收，二是一些人家里已经死绝，三是有些是外面抓来杀的，没人收尸。我父亲就是死在外面，没人收埋，至今我们都不知他的尸骨在哪儿。

那些尸体躺在那儿，血肉模糊，脑浆四溅，十分恐怖。野狗在尸体堆中撕咬，夜黑里一双双眼睛发出绿森森的光，非常可怕。我和我哥哥都只有十多岁，每晚路过那儿时浑身打颤，怕吃红了眼的狗，也怕死者的鬼魂。我们唯一能做的，只是双手紧紧握着扁担，把扁担举起扛在肩头，随时准备砸下去……

日子实在难过，我下决心要出去，否则活不出来。我白天干活，晚上点菜油灯看书，复习功课。后来我考上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办的卫生中级学校，学校吃饭不要钱，我总算可以吃饱饭了，一下子从地狱到了天堂。

我很珍惜这个学习和吃饭的“天堂”，十分刻苦，毕业时因为成绩优秀，留下来进入了第七军医大，也就是现在的西南医院。

在医院工作时，看到了大量自杀的人和各种各样自杀的方式。有吞针的，有割喉的……学校有一个体育教师，他爬到学生锻炼用的木架上，身子猛然后仰，让后脑着地而死。有些割颈子的人不懂方法，只把气管割开了，颈动脉没割断，一时死不了，气咕咕地往外冒。

张妻李涵芳补充：有一个地主叫刘元塘（音），他妻子被关在监狱里，她只把气管割断了，没人理她，苍蝇围着她的颈子和气管叮，几天之后她才死。

张道高：那几年，我也抢救了一些自杀的人，比如一个割喉的叫汪正管（音）的教师就是我救活的。那些情景，一言难尽！

我在七医大只干了四年就离开了。怎么离开？有一天，我和一些人突然被集中起来，限制了行动自由。这期间他们组织人搜查我们的宿舍，我被查出了一张照片，是我外公的，他穿着国民党的军装。他们要我交待我外公的情况，我说不出。外公在湖南，我只是很小时妈妈带我去湖南见过他一面，对他的情况我一点不清楚。就为这张照片，我被迫离开了七医大，调到了西南师范院校医院。

从此，我就呆在这儿了。

采访时间：2008年11月23日

地点：西南师范大学四新村

采访后记

半年前，在大邑县安仁镇采访刘文彩孙子刘小飞时，他提到土改时一个叫李育滋的人的惨死。

刘小飞热泪盈眶，泣不成声，给我留下很深印象。

半年后，我专程前往北碚西南大学，找到了李育滋的侄女李涵芳。李涵芳说：“关于我们李氏家族的遭遇我都写到《川康遗事——全军覆没》一书中了。我先生也是地主子女，他也有很多经历。”

于是，我便采访了李涵芳的丈夫张道高先生。

回家后，细细读了李涵芳送我的《川康遗事——全军覆没》一书。

虽然这些年饱览血腥与残暴，但书中的记述仍然让我心惊肉跳！

下面是书中关于李育滋被他所救助的共产党人迫害致死的片断：

1950年春节，曾受到二爸（李育滋）掩护的共产党员们一同来给二爸拜年，感谢他当年的救命之恩。谁能想到这份救命之恩后来换得的却是杀身之祸。

1950年3月，中共大邑县委在举行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中，安排了爱国民主人士代表28人，二爸应邀出席了这次会议。

正当二爸满怀热情迎接新生活的时候，1950年10月3日大邑县宣布全县开展减租、退押、清匪、反霸运动，11月4日，通知安仁、唐场作为试点，大邑县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始了。二爸应退押金是60石米，（农民租种土地时，要交一定数目的抵押金，土地改革没收了地主的土地，押金一定要退还农民）但他的钱早已交给地下党做活动经费和用作长期掩护在家的众多地下党员的生活费了，家里只剩下55石米，尚差5石米。他一再向土改工作组解释，却没有一点用。

1950年11月中旬，二爸就被工作组关押起来。不久，二婶也被抓走，十几个妇女关在一间只有十平方的小屋里，吃、喝、拉、撒全在里面，白天大家蹲坐着，房里还有一点空隙，晚上睡觉却只能互相挤压。冬天大家挤着还可以增加点暖气；到了夏天，屋里充满了汗酸味和排泄物的味道，臭气熏天。苍蝇也来趁火打劫，抢占这小小的空间，在人的脸上乱撞，在吃饭的碗里乱爬。晚上蚊子嗡嗡乱飞，肆无

忌惮地叮咬已没有几滴血可吸的女人。她们个个灰头土脸，身上蚊子咬的疙瘩和红红的痂子连成片，在皮肤上形成一层硬块，苦不堪言。生了病也没人过问，只能躺在地上呻吟。当局让她们在里面自生自灭，对她们比对猪狗都不如。

那时大邑县的副县长兼剿匪总司令就是二爸长期掩护在家里的川西游击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周鼎文，可以说他是从二爸家走出来就担任了大邑县的领导职务，其他受二爸掩护过的地下党负责人，也在附近区县担任领导工作，他们都可以证明二爸近年来的所作所为，更可以证明二爸支持地下党的钱早已不知是六十石米的多少倍。可是，看来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清楚事实真相，一年前二爸从成都赶回去救他们时他们说的话，大概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二爸一直被关押着，并为那五石米受了不少刑。

不知怀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大邑县的领导又把目光盯在我爹李光普身上。他们知道，没有任何理由到成都去抓我爹，于是略施小技，用一个“请”字，猎物就轻而易举落到手里。兄弟相见，抱头痛哭，他们俩谁也弄不懂事情怎么竟会变成这个样子。爹说：“老二，哥错了，哥是不是看错人了？”二爸说：“哥，我们再等等，一个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政党不可能说话不算数，他们至少应懂得取信于民的道理，说不定过几天我们就能被放出去。”看来二爸说对了，1951年下半年，二爸作为开明士绅被推举为川西区各界人士代表，经军代表兼县委书记李天民同意，他被从牢中放出来，到成都参加川西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但是二爸终究还是错了，大邑县领导人的行为逻辑谁也无法用常规去推断，从成都开完会回来，大邑县政府又把二爸关回牢房。

大邑县土改时整地主的方法很多：比如带“披披帽”，就是把大约两三百斤的喂猪石槽，一头放在地上，另一头盖在跪在地上的地主头上，过不了多久，戴“帽子”的人就受不住了，要么重伤残废，要么倒地吐血而亡。夏天叫地主穿上皮袄，用大粪往身上泼，烈日之下，大粪劈头盖脸泼来，又顺着脖子流到身上，皮袄捂得全身不透气，过不了多久，被泼者就昏倒了。冬天把冷水从衣领里往身上倒，冰凉的水流遍全身，冷得人全身凉透、颤抖不停，牙齿碰得咯咯地响，还是以昏倒为结束。经过这些刑罚，没人不病，最后大多数以死亡告终。其它，如用沾水的鞭子打人，吊鸭儿浮水、猴子抱树、煽耳光、几个人推来推去地拳打脚踢、抓着头发把头往墙上撞，就只是小菜一碟了。受刑者痛苦不堪，所求的只是能被直接拉出去，当头一枪结束痛苦。

爹和二爸在牢里度日如年，开始，他们还怀着希望，日夜盼望曾向他们宣讲过共产党政策的人、他们曾冒死掩护过的人，能帮他们一把，可是，谁也没有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刚刚才过了一年的、生死悠关的大事，好象谁也不记得了，好象从来没有发生过似的。董国富曾拍着胸膛响当地说过：“我就可以证明！”

现在也是时过境迁，无需兑现了。那个经常到我爹那里拿过钱的周鼎文，那个曾在二爸家里躲过、吃过、领导过地下党活动的周鼎文，国民党悬赏四千大洋捉拿而二爸却冒险掩护起来的周鼎文，当时任大邑县副县长和人民法院院长的周鼎文，却对二爸和我爹的遭遇置若罔闻、见死不救。

在关押期间二爸常被拉出去斗争，工作组叫人用细麻绳把二爸的两个大指头反捆在背后，吊在梁上毒打，只听到鞭打声不断，二爸痛苦的呻吟声不断，直到昏死过去，他们才把人放下来，两个大指头已肿得象个桃子。这样的毒打是经常的事，直到有一天，两臂被吊得脱位骨折，二爸的这种特殊“享受”才告结束。父亲看着二爸遭罪，心如刀绞，他唯一能做的只能是尽心竭力照顾残废了的弟弟。他现在什么都不再想了，只求兄弟俩能够活命就好。工作组的人看父亲无微不至地照顾二爸，觉得很满意，他们斥责父亲划不清界限，遂把两人分开关押，让他们独自去忍受身体上的痛苦、牢狱生活的寂寞和精神上的煎熬。

一年多过去了，1952年5月，安仁镇突然宣传“杀个肥猪过端阳”，开始对二爸进行更残酷斗争。

他们找来一些不明真象的人要二爸在烈日下挽起裤脚跪在碎瓦上，碎瓦戳进肉里，二爸两膝鲜血淋漓，疼痛难忍，稍微晃动一下，则被又踢又打。经常这样跪，他的两腿血肉模糊，已经站不起来了。这时，有人突然用步枪的枪条子狠狠地戳进他的左眼，二爸凄厉地一声惨叫，昏死过去。眼珠随着抽出的枪条子流了出来，鲜血从眼眶里汩汩地往外冒，沿着脸颊淌到地上，不一会儿，泥地上就积了一大滩血。昏迷中的他又被拖回牢房。



中共土改时的宣传
选自“中南土地改革的伟大胜利”

一天，二爸被押回自家院子等着挨斗，三个十岁多一点的孩子吓得挤在一起看着他们已被折磨得不成人的爹，欲哭又不敢。他那原来炯炯有神的目光已经荡然无存，现在，左眼已凹陷下去，无神的右眼里显出的只是木然。被跪坏、打坏的双腿，无法支撑身体的重量，他无力地靠着木柱坐在地上，表示要二女儿（三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14岁，我叫她四姐）为他剪指甲。孩子怯生生地走到他面前，拉起他的手。二爸全身震颤了一下，右眼里露出一丝悲切。女儿小心翼翼地剪着已陷进肉里的指甲，怕弄痛了自己的爹，她哪里知道，她的爹早已伤痕累累、体无完肤了。二爸要她来剪指甲，只因为被吊断的双手再也不能抬起来抚摸孩子，

只能借剪指甲为由，让孩子来靠近自己、挨挨自己，在两个人的双手接触之际，把他的关心、疼爱和不舍传达给孩子。

作个道别吧，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了。

很快，挨斗的时间到了，二爸表情冷漠地跪在院子里，任人痛打，打倒了，再跪好，再打倒，再跪好，直至昏迷。

三个孩子亲眼目睹至爱的爹受刑的惨状，不忍再看，他们深深地低下头，心如刀绞，暗暗地抽泣着。

大邑县早在1951年1月就成立了人民法院，周鼎文任法院院长，在他主持法院工作期间李育滋被判“反革命”罪并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二爸表情冷漠，显得出奇的平静，他再也不叫冤、不分辩、不求饶，唯有深入骨髓的绝望。

1952年5月26日，在文彩中学操场——这个二爸曾经主持召开大会欢迎解放军、庆祝大邑解放的地方，他被宣布犯“反革命”罪立即处决。

他被拉到文彩中学操场斜对面的田里，一声枪响，二爸倒在散发着清香的稻田里，倒在他热爱的家乡的土地上，年仅46岁！

二爸的尸体在示众期间又被安仁街上的打更匠、人称烂脚杆的李会廷挖去心、肝、生殖器，拿去卖给别人，据说吃了可以治病。

杀了二爸之后的下一个月，1952年6月，大邑县宣布土地改革胜利结束。

在李涵芳家采访时，遇到李育滋之女李玉华（1938年生），她告诉我：

父亲被整时，我还只有十来岁，正在文彩中学读书。中学的操场作为公审大会的会场，场面很大。学校的教导主任要我去发言，批斗我父亲。我说不出来，也不知道什么。我想按照学校的要求写批判稿，但批判不来。当时，那些丰富的阶级斗争词汇还没学到，我没有自己的语言，只好把刚学会的几句话用上去，比如“剥削压迫”、“男盗女娼”等等。

前不久，他们要给父亲平反，我看那上面写的是：“李虽有历史问题，但支助过共产党。”

我拒绝接受！

共产党对我父亲的恩将仇报我很不理解，而且使用如此残暴的手段！我这些年常常想，这段历史，我怎么向后人交待？



李玉华

地主子女，打死就打死了

讲述人：李先伟

1944年生



土改时我还小，才七岁，但还是看到了一些事。一个是抄家、烧书，我们家里的《左传》、古文观止，还有康熙字典，这么厚几摞，抱出来烧了，他们说那些是封建的旧东西。还有就是整我的叔伯嫂嫂陈荣本。陈荣本的男人叫李先明，是我的叔伯哥哥，解放后被抓到新疆去劳改，土改民兵向陈荣本逼要金银，洋钱（银元），她哪儿有嘛。拿不出来？他们就把砖烧红了，把她拉来，压她跪在砖上，她的两个膝盖烧烂完了，她动也动不得，就上吊死了。她死前还给她在劳改的男人写了一封信，她是奉节师范毕业的，有文凭，民兵看到后把信烧了。她就死在我们高坎子。她死后的四个娃娃无爹无娘，全部饿死了。

另外，我们这儿（高坎子）枪毙了好几个，有李先约的父亲李汶舟，还有李元舟。地主枪毙后，他们的娃儿饿死的多，仅我们高坎子就有几十个，比如李元舟的子女，他三弟的几个娃娃全部死完。为什么呢？土改后，小的出去讨不到吃的，大的又不准出去，五、六岁，六、七岁大多都是饿死了的。

我们家死了三个，但都是土改后死的。

我爸爸评为地主，没有杀他，只是斗打。他从不多言多语，只喜欢下象棋。他是搞大集体的时候饿死的。1959年他被叫去修柏洋坝那个黑龙池，吃不饱，那是十月间，天气冷，他披着件烂蓑衣，抱一床烂铺盖，走到李子坳那个垭口时，风一吹，他就倒了，再也没有爬起来。



李家残存的院落

我二哥李先佐，1956年忍受不了上吊死了。第三个是我妹妹李先贵。那些年，

任何人都可以随便欺压我们。一个姓许的贫下中农说我家的鸡刨了他家谷子，又说我妹妹没有把鸡赶走。我妹妹说她没有看到。这个姓许的几耳光打来，打得妹妹鼻血长流。我母亲用水给她洗，洗了把她抱到板凳上，她一靠在板凳上就死了。那是1955年，我妹妹才九岁。

问：打死了他承担责任没有？

李：那个时候承担什么责任？我们地主家庭嘛，没得那个敢吭声，说了还要挨打。我们把妹妹背出去埋了，板板都没得一块，挖个坑埋了就是。

采访时间：2016年8月11日

地点：湖北省利川市柏洋镇水井乡水井村

采访后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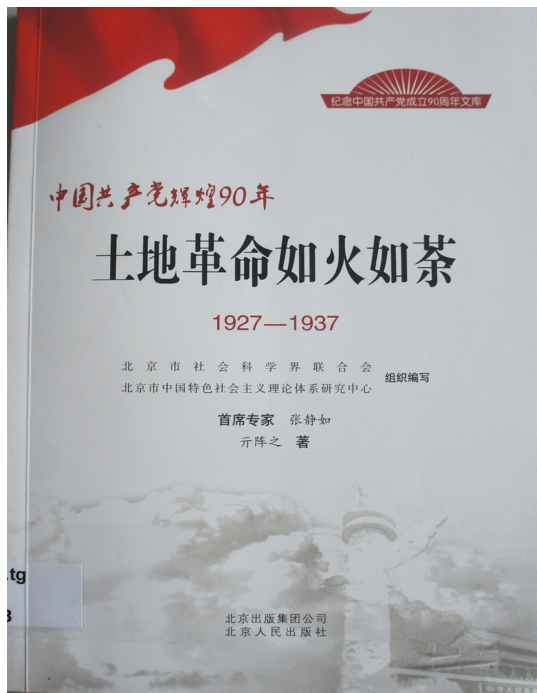
到洋沱坝拍摄外景时，我在残存的李家地主大院的一个破烂平房里，偶然遇到了72岁的李先伟，论辈数，他还是我采访的老地主李曼的三爸。

也许是年代已经久远，苦难的印痕已被岁月消磨，他在讲述那段往事时十分平静，仿佛那是一个他人的平常的故事。但是，在讲到他妹妹李先贵之死时，他脸上露出了悲愤，声音也沉重起来。

他说，地主子女嘛，打死就打死了，你要喊冤，还要挨打。云阳县彭氏庄园的地主子女彭义尧在讲到他妈妈被整死时说：“我不敢问，地主嘛，要哪个整就哪个整。”

《土地革命如火如荼》一书中写道：“地主阶级有政治上和法律上的特权，可以随意打死或者处死农民。在这种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下，农民过着极端贫困的奴隶式生活。”

我在纪录片《血红的土地》中写道：“中共宣称的这种现象的确发生了，那就是在土改和土改之后，只是对象刚好颠倒！”



我在几十年的 恐怖中成长

讲述人：谢成陶
重庆交通大学副教授
1937年生



1950年3月27日，我12岁，听说15年前路过冕宁县的红军又要回来了，我们几个小伙伴好奇地到泸沽镇郊外朝西昌方向望去。大约上午10点左右，一大批解放军荷枪实弹沿着公路两边匍匐而来。他们见到我们几个小娃，十分着急地喊：“小朋友，快躲开，马上就要打仗了！”

其实，国民党的军队早已溃不成军，昨晚已逃向喜德那边的少数民族地区，没有一点抵抗。

约十分钟，我的家乡四川省冕宁县泸沽镇便解放了。

大半年后，一场急风暴雨似的清匪反霸和土地改革运动汹涌扑来！

一、我一家的命运



红军长征时的泸沽镇（谢成陶提供）

1、父亲之死

我父亲谢文丹是国民党中央军校学土木建筑的，是个工程师，后来当了泸沽镇的镇长。我爷爷有房产和田地，分家时我伯伯分了房子，我父亲分了田地，田虽不多，但也算是个地主了。

泸沽镇是冕宁县一个比较大的镇，是西昌进入冕宁的门户，全镇有十多个乡，很多乡长都是中共地下党，所以，解放前泸沽镇是地下党的窝子。



川滇交通要道——泸沽镇（网络图片）

我父亲同地下党的关系很好，他很支持共产党。冕宁县的文史资料上都说我父亲是个民主人士。举个例子，有一次西昌国民党警备团的团长邱纯川到泸沽镇来抓地下党，到泸沽后邱纯川来到我家，告诉我父亲（他同我父亲是同学），说今晚要把他们一网打尽。当时共产党在泸沽办了学习班，有100多人，他们得到情报就来抓。我父亲借解手的机会溜出来找到卖酒的陈鼎才，他是地下党，对他说今晚后山开会的人要被抓，部队马上就要到了。陈当即跑去报信，100多人赶紧逃入山林——我们那个山林很大。邱扑了个空。

1950年解放军打来时邱纯川逃往少数民族地区，他在那儿被杀了。



谢母与谢成陶（1939年）

解放后地下党给部队介绍过我父亲，部队便把我父亲叫来当了集中仓库的主任。仓库装粮食——从有钱人那儿征集来粮食，供部队吃。他们叫我父亲负责仓库管理，等于是参加了工作。父亲在仓库干到1950年的8月。一个叫边绍云的地下党来接替了他的工作。几天后，他们就把父亲弄到学习班去学习，把他软禁起来。我去看了他两次。春节大年三十那天，父亲被抓到监牢里，他们把他棉衣扒掉，用条石把他压住，一阵暴打！

1951年4月，父亲在离城70多里的地方被枪毙了。

杀他的罪状是什么呢？一是说他把庙里的钟拿来铸成了锅卖。当时镇小学在庙里，没有桌椅，爸爸把钟铸成锅卖后给学校添置了桌椅。那个桌椅我见过，做得很漂亮。还有就是镇上有一家人失火，把整条街都烧了，好多人流离失所。爸爸把这个人抓起来送到冕宁监狱，算是过失犯罪吧，现在共产党也会这样做。后来那个人死在监牢里，这也算作我爸爸的罪行。

1989年我曾经去成都文殊院找到当年的地下党负责人王月生，我说：“王叔叔，我是冕宁泸沽镇谢文丹的大儿子。你们当年经常在我

家里开会。”他说：“哟，进来！进来坐！”

我问他，解放前你们共产党对我父亲也很好，为什么解放后要把我爸杀了？王月生说，刚解放他们地下党就走了，是部队在管理。



昔日的冕宁县街道（谢成陶提供）

2、继母之死

父亲死后，我们全家被扫地出门。我有三个弟弟两个妹妹，最大的九岁最小的一岁。小的由农会出面委托他们的奶妈带走抚养。我是最大的，自个跑出去流浪，父辈的亲戚朋友们不敢接待我，我只有讨饭吃，晚上就住在一个城隍庙里。我母亲1943年就去世了，继母叫胡从德，她生了三个娃娃，当时，她拖着一儿一女住在一个透风漏雨的烂棚子里。他们没得饭吃，又冷又饿。弟弟身上穿件毛线衣，还被儿童团扒下来拿走了。最惨的是，我继母几乎天天被抓去斗打，捆绑，打得她痛不欲生。两个娃儿在家里没吃的，饿得成天哭。一天，继母把小弟弟留在家，独自把小女儿背到她姐姐家，然后跳河自杀了，尸体都没找到。前些年我们给她立了一个衣冠冢，其实衣冠冢都说不上，因为她衣服都没留下一件。

3、继母的堂姊妹胡正馨之死

胡正馨同我继母是堂姊妹关系，就住在我们对门。胡正馨长得非常漂亮，至今我都觉得她漂亮。她是西昌礼州人，礼州在西昌市和泸沽之间。胡正馨出身平民，但嫁给了一个叫邓宇俊的地主。邓宇俊是个麻子，当过国大代表。她结婚后只有几年就解放了。土改时把她抓来关起，农会主席想占她的便宜，胡正馨给了

他一巴掌。农会主席（我记得他是个染匠）受了处分。又换人来斗她，但是，斗不起来，因为她没收过租，又没得罪过任何人，出身也贫苦，只不过是地主家的一个花瓶。斗争会上只好拿她穿的衣服来批斗。有人说：“你看，你穿一条花裤子！”胡正馨听到这话，马上把外面那条花裤子脱下来，当众往空中一抛。

这下把斗她的人惹恼了，胡正馨大难临头！

第二天开大会，胡正馨被五花大绑押出来，当众宣判死刑！

宣判话音一落，掷下一根两尺多长的竹标，上半部写着“恶霸地主胡正馨”，下半部是削得很尖的竹片。行刑的人恶作剧，把那竹标使劲从胡正馨颈子里插下去，结果竹尖插入她的肉中。在推往刑场的路上，胡正馨脸色惨白，根本走不动。于是，就在半路上，让她倒在地上，枪伸进她嘴里，一枪把她打死了。

行刑的人不是解放军，而是土改民兵干的，这个人叫杨云，是我们泸沽小学的炊事员，他的弟弟是土改工作组的组长，也是当天的审判长。

4、姑祖祖和姑姑之死

我有个亲戚，是我姑祖祖，分家时，大老婆分了房子，她分了田，也没多少。姑祖祖人长得漂亮，她家里面全部是女的，没有劳动力。姑祖祖就把那点田租出去，靠收点租过日子。姑祖祖住在县城，我10岁时曾在她家住过，知道她家的情况。

土改时我在县城读中学，经常被组织起来去参加斗争大会。我们初中生安排坐在前面——盘腿坐在地上。后面的人一阵一阵地呼口号。拖出来的人一个个五花大绑。那个绑厉害得很，双手反剪，颈子后面勒一根绳子，把人压跪在地上使劲勒，绳索收紧，血脉就不通了，不一会，人就遭不住。最初，枪毙人后那个麻绳就不要了，家属来收尸时把绳解开丢掉。后来杀人太多，绳子不够用，于是把绳子从尸体上解下来在河里洗去血迹后再拿去绑人。那天，在广场开斗争会时，我看到了姑祖祖。她被抓起来吊在一根竿竿上。她长得很白，又胖，绳子一勒，把她手臂的肉勒烂了，唉呀，肉都翻出来，好惨！那天斗争会上，斗完一个拖出去枪毙一个，就在广场后面，“砰”地一声。但是，



镇反和土改时杀人（网络图片）

那天没有杀我姑祖祖，她后来死在监牢里。她的尸体被丢出来，狗又撕又咬又吃，把她扯得稀烂。我姑祖祖有什么错嘛，她没得劳动力，只有点田土，收点租吃饭，从来没整过人害过人。她女儿，也就是我的姑姑谢云芳，长得很漂亮的，受不了这个刺激，吞鸦片自杀了。谢云芳只比我大几岁，但已经结了婚，她十多岁就结婚了。

二、我的亲眼目睹

土改时冕宁县的县委书记叫常志兰，公安局长叫郝灵选，唉呀，一提起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全县人民都害怕。他们天天杀人，好象杀起瘾了。

1951年1月起开始大规模杀人，那一年我13岁。我1950年到1953年在冕宁中学读初中，经常看到公安押着一串一串的人，一个个绳捆索绑，几十人上百人，各个乡镇都在杀。冕宁县是个四方形的城，大概有一平方公里，城墙很高，冕宁中学就在城的西南角。我们一听说杀人就咚咚咚地跑到城墙上去看。要被杀的人排成一排排的，枪就对着脑壳打，打后的模样各不相同，有的打掉半边、有的打开花、有的后面一个小洞前边一个大洞。

我认识的好多熟人都被杀了。我有个同学叫邓宇雄，他比我大三岁，16岁，他被枪毙后我看见他的罪状是：他父母开黑会时他在外面放哨。他死后我跑去看了他的尸体，他穿的是件罗汉衫。

还有我隔壁的李明善，他刚满18岁。为啥被枪毙？据说一张反共救国军的名单上有他的名字。反共救国军是解放前夕国民党想打游击而组织的队伍。没人怎么办？凑！你只要凑足了100人你就是连长，就可以发金条，发枪。所以有些人就去搞这事，弄个连长、营长当，目的就是为了钱。有人把李明善的名字写了上去。解放后查到这个名单，马上把他抓来。他说，他根本不晓得有这回事。但不管，一枪就把他毙了。我当时想，如果我大个两三岁，可能也活不成。

我还有个同学叫朱万荣，他比我大两岁，他家也是地主。那天民兵突然来学校把他抓走。第三天，他被夹在他爹妈中间被推上刑场，刑场就在城墙外的护城河边，我们在城墙上看，唉哟，好紧张，大气不敢出。只听得“砰”“砰”两枪，朱万荣的爹妈被打死了。但是没打朱万荣，原来是他被抓来陪杀场，杀了他爹妈后把他拖了回去。几天之后，他被放回来继续读书。朱万荣现在还在。前不久我们搞个冕宁的征文集，他没写这件事，我问他为啥不写，他说：“不敢写，写起来太难受。”



谢成陶（左一）小学时

我们小学校长叫余显道，他家里很穷，他长年穿件蓝布衫衫，穷得叮叮当当。解放前夕胡宗南的部队从我们那儿过，夜里慌慌张张掉了两只卡宾枪。枪被余显道捡到了。那时枪就是钱，余显道于是把枪捡来藏在菩萨的座下（我们小学就在庙里），打算卖几个钱。不料这事被人知道了，余校长被抓起来判了死刑。我亲眼看到了他的尸体，他长得高高大大，头都打得没有了。

头被打掉的还有胡正馨的老公邓字俊，枪响后只剩一个颈子桩桩。

杀的熟人中我记得的还有一个曹叔叔，他叫曹晓天，是个乡长，我也见到他的尸体——头很完整。后面一个小眼，前面一个小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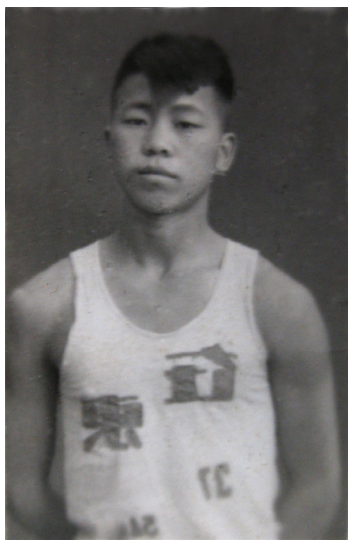
我们那条街上有一个叫户锦堂的人，他有点文化，喜欢读点古书，于是国民党的县政府把他找来当了个县参议员，相当于现在的政协委员。户锦堂靠铸铁锅卖为生，我叫他户叔叔，经常看到他拉风箱铸锅，一张脸被煤烟熏得漆黑。那些日子，杀人杀疯狂了，把户叔叔抓来就杀了。他没有一点罪行，只不过因为有点文化，被叫去当了几天参议员。他儿子现在还在，在西昌师范教书。

还有个起义军官叫邓佳（音），也被杀了，但后来给他平了反。

冕宁县还杀了一个国民党的少将军官陈蕴山。他解放前回到家乡，结果被杀。

我继母的舅舅胡岳军也是少将军官。胡宗南从西昌起飞时是他护送胡到机场。曾经有中共地下党给他作工作，说你把胡宗南抓起来就立大功了。他说：

“不，胡宗南对我很好，胡这个人不要不嫖不赌不贪。我无论如何不能做这种事。”他把军用棉被洒上汽油，将通往机场的20多里路照亮，直接送胡宗南起飞。胡宗南起飞后20多分钟，解放军就占领了机场。胡岳军脱掉军服躲了起来。后来他看到解放军的布告说“坦白从宽”，于是就到西昌公安局去自首，说：“我就是胡岳军。”对方惊叫了一声，但当天还放他回了家。



谢成陶在会理师范学校
(1955年)

两天后，他被押到雅安，在那儿关了两年，公安厅的人说，要杀你轻而易举。胡岳军回答：“军人不怕死，要杀就杀。我知道我把胡宗南放走了，罪重。”

但是，他没有被杀，而被押回家乡判了20年徒刑。他现在还在，90多岁了，我们经常通电话。

冕宁公安局长郝灵选因为杀人太多受到了西康省主席廖志高的批评，他把廖志高的老表李少炎都杀了。

在我们冕宁还有个奇观——叫花子（乞丐）抢尸体卖尸体。叫花子是穷人，共产党喜欢穷人，任叫花子去抢尸体，抢来每具尸体要30万元钱才让家属领去掩埋。共产党认为，叫花子为什么穷，就是因为被地主剥削了才穷嘛。于是我们冕宁县出

现一个奇观——尸体被一排排地吊着，叫花子坐在下面等着收“卖尸钱”。

我爸爸被枪毙后是我伯妈去收尸，叫花子不准，非要拿30万。30万是旧币，相当于现在的30元。当时30元是什么概念呢？我在学校一个月的伙食费是3元，也就是说，30元是我10个月的伙食费。我伯妈是个贫民，靠推豆花卖为生。我爸爸当镇长，十分廉洁，他并没为自己捞钱财，自己的亲哥嫂都穷得很。伯妈实在拿不出30万，不拿钱就不准收尸。我堂弟去把我爸的脑水收起来，用草纸包好放在那儿。他是4月份被枪毙的，天气已经有些热了，那几个叫花子在那儿守了几天，我伯妈还是没钱。解放军的一个团长觉得有碍卫生，他出面让伯妈免了这笔“收尸钱”。

还有，听说有个地主关起来了还在写反动诗，我当时读初中二年级了，好奇，跑去看。那首诗是这样的：“昔日田为富字脚，今日田为累字头。田在心上常思想，田在心中虑不休。当初只以田为福，谁知田落垒垒愁。”忧虑的“虑”繁体字是慮，中间有个田字，垒垒的“垒”繁体字是壘，有三个田字。

这首诗我当时就背下来，至今不忘。

那个时候自杀地主也很多，有一个叫郑胃平的地主，他老婆跳井自杀，留下几个娃儿。

三、我对地主的一点看法

地主收点租我觉得是很正常的，现在的种粮大户、卖粮大户，不是地主是什么呀？有一次我们处级干部去参观左宗申（重庆的一个民营企业家）的工厂，回来座谈时我说，按照以前的说法，左宗申雇了这么多人干活，他就是资本家了，但现在说他是功臣，解决了这么多人就业。同样的，种粮大户？他一个人种呀？还不是雇人来种，他也就是地主了。但现在他是功臣，说他上税多，对国家有贡献，还奖励他拖拉机，让他加入政协……

就我所知，以前的地主、资本家，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是勤劳、智慧、节俭、善于经营的人，他们一点一点地聚集财富，也解决就业。但为什么他们就要被关、被斗、被打、被杀。特别是，让他们的子子孙孙都不得翻身、不得昌盛。我当右派主



武汉郊惠济区马场乡农民喜滋滋搬走地主的农具
“中南土地改革的伟大胜利”中南人民艺术出版社1953年

要原因就是因为我父亲的影响。

到底是当年错了还是现在错了？

有人回答说，不同时期政策就不同。

我对此不认同！

我在农村看到，很多人又懒又笨，所以就比较穷。

我在江北农场时，有个老农民给我讲，我们农场下面一个资本家，喂900多头奶牛，轻松得很。他介绍说，那个姓陈的资本家，把周围的农民找来，问大家愿不愿意喂牛。愿意的，参加一个培训班，两头或三头领回去，公司给牛定期配料，自己再割草喂，每三个月评比一次，喂得好的，除工资外再发个红包，那些喂得不好，又在奶里加水的，就把牛收回来。管理人员只有几个人，一个兽医、一个配料、一个下乡巡视。结果公司挣了钱、四周农民富了，城里人又有奶吃。

老农说，你们共产党喂牛太累了，养80多条牛，那么多人，还喂不好。

的确也是，我们农场为了这80多头牛，专门组建一个车间，成立一个饲养班、一个挤奶班，还征一个生产队来供草。此外还建有党支部、团支部，好大一批人。就算是非常低的工资，每年都亏本。有一年我们农场亏损了50万元，我算了一下，全体职工一年就是坐着耍，只发工资也只亏30万。

四、我的右派生涯

我家几姊妹，我算运气最好，刚解放时读初中还需要硬考，很多人考不起。我一向成绩好，考上了。我们那个班上的同学大多都是地主子女，因为家里都比较重视教育。后来读书主要就讲出身了。所以，我们几姊妹只有我受了完整的教育，其他几个不是文盲，就是只读了几年小学。

我1956年上了大学——在会理师范学校毕业后进入重庆师范专科学校。我的专业是数学，那时，我成绩特别好。1957年，搞大鸣大放，共产党叫我们鸣放，我不愿意鸣放，自个到图书馆去看书。但不行，每个人必须发言，我们班30个人坐成一圈，一个一个地发言。我那时拥护共产党，没有二心，我父亲被镇压了我都没管。班长一再启发，每个人必须提意见，我挖空心思，提什么意见呢？我想起1956年初，我在会理街上看到很多农民坐在那儿，样子很悲戚，见到有吃剩的就去抓来吃。我上前询问，他们说，粮食被国家统购了，统购得太多，没有留足口粮，饿得遭不住。



文革时谢成陶回家乡与五个弟妹合影



当右派后谢成陶与另一名
学生右派黄道机合影

我觉得这个意见可以提，供共产党参考。于是我说，是不是统购多了，希望共产党注意一下这个事情。当时我是真心关心党，觉得党改好了，中国就会更富强，根本没想到这几句话会给我带来大难，因为共产党、毛主席说过：“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诚，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1957年6月30日，还差一个月我就满20岁时，反右斗争开始了。我第一个挨批斗，黑板上用彩色粉笔写着粗大的字“同右派分子谢成陶斗争到底”。我当时很气愤，认为共产党说话不算数，“言者无罪”是放屁！在斗争会上我说：“再隔20年看我是否是对人民、对祖国、对党忠心耿耿的人。”班长立即起哄说，这是右派分子认为共产党20年后要垮台，于是领呼口号：“打倒右派分子谢成陶！”

从此，人人都避开我。我当右派的罪名是“攻击党的统购政策”。当然，划我右派有一个主要原因，我父亲是地主，并且被共产党镇压。

1958年，学校通知我到重庆市67中学（原重庆大坪初级中学）报到。据说当时政策允许右派分子教数、理、化，但不能教语文、政治等。67中的校长温自强是一位刚满30岁的女性，她外表漂亮心地善良，对学校管理很在行。在她的领导下，我受到了人的待遇，得到了人的尊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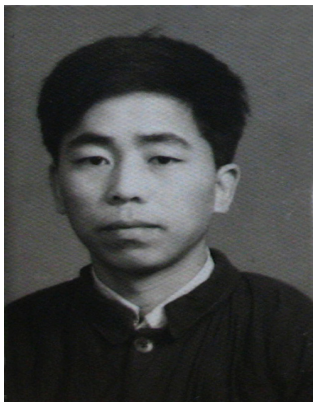
1960年5月8日，大坪派出所突然把我抓到公安局办的集改队劳动改造。温校长说我表现很好，竭力想保我，可是没用。后来得知，抓我的原因是中央有一个领导要来重庆，并且要住在大坪中学附近的潘家坪。于是，为了领导的安全，也为了执行公安部“政治上纯洁城市”的指示，凡是没有达到劳改、劳教的“五类分子”，都必须集中改造。从此，我走上了长达20年之久的劳动改造之路。

我们被押到重庆公安局办的东风农场，由公安押着我们“南征北战”——到处下苦力为他们挣钱。

1960年下半年，我被调到重庆水泥厂小南海采石场担运矿石，每天从采石场担矿石到两里外的长江边的木船上，日定额60挑，每挑100斤。当年重庆天气气温很高（40℃左



谢成陶在江北农场挑粪劳动



谢成陶 1965年

右),但这还不是主要的。要命的是吃不饱饭,又累又饿奄奄一息,除了难以完成的劳动定额,每天晚上还要学习,评查是否做到“七无、八好”,什么无逃跑、无反动言论、无虱子……表现不好动辄批斗,触及皮肉。

1960年7月1日强迫我们加班“放高产”,为党的生日献礼,这种超强度的劳动当天就折磨死了五个集改(集中改造)人员。一个叫焦东山的人上床时还与我说了话,天亮时,我发现他一身冰冷死在我的侧面。死去的人,拖到外面,等家属收尸。有的家属为了“划清界限”,不来,或者来迟了,尸体不是发臭就是被野物啃了,那种情景惨不忍睹。我特地找陈队长讲,我没有亲人,要是死了请立即用我的被单裹上,深埋在附近山中,一定埋深点,否则被野物刨开要污染环境。

那样的条件下,我仍拼命地干活,以显示对党的忠诚。

不过,有一件事情我还是动摇过,使我在好长时间都感到不安和内疚。

那是1960年10月下旬的一天,下班时天已全黑。我拖着沉重的步子,歪歪倒倒地回住宿地。脚下忽然感觉一个像鸡蛋大小的东西碰了一下便滚开了。出于好奇,我找到了它,原来是一个小红苕!估计是伙食团搬运口粮时从麻布口袋里漏出来的。我的心立刻一阵突突地跳,我生命的火花快熄灭了,有了它,或许我可以多苟延残喘一夜。但又想,若是私吞了它,是对党粮食政策的抵触,与我对党忠诚的坚定信念相矛盾。上交队部吧,小红苕的诱惑力又太大。思想斗来斗去,决定还是悄悄把它吃掉。

我选择蹲在厕所里偷吃,但它是脆的,刚咬一口,被隔板蹲位的一个人听到了,就问我在吃什么。那个年代,除了在食堂吃定量供应的东西,私人不可能拥有吃的。要是被发现,必遭追查批斗无疑。我不敢再吃了。上交吧,但这时红苕已有牙齿印,交上去反而会吃亏。晚上学习时,我心不在焉,总在想如何消灭罪证(丢掉是绝不可能的)。待熄灯就寝后,我终于想了一个好办法:用口水将它舔湿,在被单上擦去泥土,再咬成花生米大小的小块,像吞药片那样完整吞下,不发出一点声音,睡在我侧面的人也不知道。大约半小时后,罪证消灭,大功告成。可是,我内心深处好多天不能平静,觉得自己不忠诚不老实,又添新的罪行。

1960年年底,又把我调去修綦江的小罗铁路。在长约五华里的工地上,有劳改队、劳教队和集改队的各种劳改人员,公安战士荷枪实弹监督着我们。工伤和死亡的事经常发生。有一次用



谢成陶与妻子在江北农场

几十吨炸药，炸一个山头。整个山石和泥土全炸疏松了，然后叫我们把土石赶（推）下山，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工作，当天就伤亡了好几个人。有时，一瞬间一片沙石突然全面滚动，飞沙走石，造成伤亡。有一个人被飞起来的撬杠把睾丸打落了。好几次，巨大的石头像雨点似地从我头上飞过，我差一点也就没命了。那些日子，我成天笼罩在恐怖的气氛中。



“我特别喜欢读书”——谢成陶在江北农场时

1962年，集改队中的右派被单独集中到白公馆、渣滓洞。我们就住在那些牢房里，来参观红岩村的人认为我们是战犯。有人指着我说：“你看那个人，他哪像个战犯。”那时我才20多岁。

在白公馆、渣滓洞时我遇到一位良师，他叫周同泽，比我大20岁，是解放前的大学生，曾当过美军翻译。当右派后他每月只有20元钱，除了吃饭吸烟外没有剩余，所以他穿得破破烂烂象个乞丐。他发现我读书很用功便主动提出教我英语。在白公馆、渣滓洞相处的三年里，在周老师全力帮助下，我的英文得到极大的提高，十多年后我进入大学教书时，无论是评副教授的考试，还是参考或翻译国外英文教材，白公馆、渣滓洞里的英文功底起了极大的作用。可惜，这时周同

泽老师已经去世了。象他这样一位忧国忧民、品德极其高尚的人被打成右派，关押劳改，实在是我们国家的不幸。



右派“改正”后谢成陶回冕宁家乡
与五个弟妹合影

在白公馆、渣滓洞时我还交了个朋友叫刘家端，他是成都刀具厂的右派。当右派后他被开除公职，回重庆打零工。我们在白公馆住同一间牢房。他比我大两岁，1935年生的。文革时刘家端在南岸区弹子石参加了造反派。后来理麻（清理）他，说他是阶级敌人捣乱。他理直气壮地说：“中央文件都说摘帽右派可以参加造反派！”他同法官闹，把法官惹恼了，判了他死刑。枪毙那天在解放碑游街，他看到我了，他望着我，我望着他。他发不出声——嘴上勒着绳子，勒得很紧，嘴角血都勒出来了。

我看见他胸前挂着牌子，编号是38。

游街从解放碑游到菜园坝，我一路跟着走，下了菜园坝就戒严了。枪毙之后我下去看，地上画着38号的地方就是他。唉哟，好大一滩血！刘家端身体特别好，他的血最多。他遇难时大概是1973年。

1980年我去他家，他妹妹告诉我，说刘家端已经平反了，政府承认是冤杀了，赔了1400元钱。太少？他还算赔得多的。我们教研室主任王竞渝（音）的父亲是个起义人员，他被冤杀后只赔了400元。

这件事启发了我，所以我后来去找王月生，说我父亲对共产党有功，双手没得任何血债，也是冤杀，并且害得我当了右派。

采访时间：2009年12月28日

地点：重庆枇杷山公园

采访后记

2009年岁末，在参加重庆江北农场的右派聚会上，我与谢成陶先生相遇。我原本已不打算再采访右派，可谢右派无意中提到土改，这立马吸引了我。第二天，我便打去电话，希望去他家面谈，他把我约到了枇杷山公园——他们右派们要在那儿搞年终团聚。

我们找了公园餐馆的一个房间，闭门谈了两个多小时。谢成陶先生当过多年教师，口述力很强，经历也非常丰富，最让我感慨的是，他在多年的恐怖和劳改中，一直勤奋地学习，正直地做人。1979年，右派“改正”后，谢成陶先生登上了大学的讲台，因其勤奋、才华和正直，被评为重庆交通学院副教授，并兼任学院图书馆馆长。此外，他还获得“重庆市劳动模范”和“四川省职工劳动模范”的称号以及《四川省高校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一个地主的儿子，他的那些优良素质，是遗传的呢，还是在艰难中炼就的，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雕塑《翻身》——中共掀翻压在农民身上的地主，让农民翻身做国家的主人

本篇照片由谢成陶提供

古宅，强夺贱卖 书香，断弦灭音

讲述人，胡庆生
雅安天全县始阳镇兴中村村民
1945 年生



元朝末年，朱元璋造反，天下大乱，我家祖先胡泰鹏为了避难，从重庆逃到天全县来。那时很艰难，祖上好几代人，穷得很，婚都结不起，只得去给人当上门女婿。后来，家族通过读书、做官，慢慢发达起来。我曾祖父在重庆梁平县（当时叫梁山）当了管教育的官员。我的伯祖父，也是很有学问的人，他在雅安的一所学校当终身教师。到 1949 年时，我们胡家已经是一个大户人家，在始阳镇有了一个占地 5000 多平方米的胡家大院。那时我们胡家没人当官，无权无势，但很受人尊重，没人欺负我们，原因是我们胡家多年办教育，子弟众多，也就相当于有了一个保护网吧。

1950 年，共产党、解放军来到天全县，第二年就开始搞土改。当时我们是两房人，都住在大院里，我们马上被从大院里赶出来。我们那楼上，有整整一屋的书，好多都是手写本，因为我们好几代人都是读书人。我父亲也是教师，但他在我两岁时就去世了，那时他 45 岁。

一个地方，可以因一幢建筑而出名。我们那个胡家大院，就是天全县很有名的古建筑，为这房子，土改时还杀了我一个堂叔！我们一看，保命还是保房？当然是保命！我们就被扫地出门了。

那些几代人积下的整屋的书也从此消失。

大院被当局作为粮食仓库，上世纪 80 年改为住粮食局的干部。2005 年，粮食局的局长（高瑞华），把大院卖给了他的亲兄弟（高建华）。当时，外面有人出十几万都不卖，但卖给他兄弟，五万！我们那个大院，是古建筑，很有收藏价值，还有，光那块地就有十多亩。

（注，关于胡家这个大院，媒体几年前作过专访，详见后面节选一、二。）

土改时我才六、七岁，斗打地主时他们不要我去看，但我还是看到了，他们把地主反捆起来吊到屋梁上打，把地主屎都吊出来了。

我家有个亲戚叫高成武（奶名叫狗儿子），他有点文化，在地方上有些号召力，共产党就要用这种人帮他搞土改。于是他忙起来，帮共产党搞划成份、分田分地……划成份时，什么地主贫农，他也搞不大懂。我们街上有个人被划成地主，他儿子在雅安，传回信息：划成了地主很麻烦（要遭殃）。于是他找到高成武说：“你是了解我的，怎么把我划成地主？”你想不到我这个狗儿子大哥怎么说？他说：“么爸，这个成份安逸（好），我（本人）都划的地主。”

土改一忙完，共产党卸磨杀驴，立马就把他杀了。把他绑赴刑场时，他表现得还很英勇，对沿途围观的人说：“各位亲朋好友，失陪了！”他看到人群中有一个朋友，就冲他说：“我娃儿还小，请帮忙收尸。”他死后，果然是他朋友拖床席子掩埋的他。

高成武被杀是被报私仇。1949年前，有一个地下党，姓罗，装扮成叫花子（乞丐），在我们始阳活动。解放军打来时，他大叫：“老乡们，不要去抵抗，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高成武给了他一耳光，意思是你懂什么？这一耳光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死时不到30岁，留下五个娃娃，最小的刚生出来。

我们始阳土改时还同时杀了一对父子，父亲叫徐福原，作为一贯道反动头目枪杀。儿子徐和新是刘文辉24军的起义人员，也被农会押来。在绑赴刑场时，父子俩表现得很英勇，沿途群众高呼口号“打倒反革命”时，徐和新放声大骂。

先打的父亲，因为还是讲究不让白发人送黑发人。轮到儿子时，他大叫一声：“爸，我来了！”徐和新后来平了反，他的另一个儿子叫徐和志，他有两个老婆，小老婆大饥荒时饿死了，大老婆文革时投水而死。

我伯祖父的儿子叫胡祥（我叫他四爸），土改时被枪杀。他的两个内弟，一个叫黄镛（曾任荣经县县长），另一个叫黄程，是起义人员，从军到朝鲜，但也没逃脱，农会一个条子把他弄回来同他兄弟一起打死了。这两人都有不少亲属在美国，1979年三中全会后给他们平了反。

土改时，那些所谓“贫下中农”都是流氓无产者。我们镇上那个农协会主席就是我们当地地方上好吃懒做的家伙，她五短身材，挎一把盒子枪，吊在屁股下面，带子很长，她不会收，枪在屁股下一甩一甩的，又滑稽又难看。土改时她威风得很，说谁是地主谁就是地主，说把谁抓出去打了（枪毙）就把谁抓去打了。

我们始阳有两大庙子，一是城隍庙，二是大碑石，城隍庙是清朝雍正改土归流后建的，大碑石建于南宋，有上千年的历史。这位贫协主席带人把这两座古庙全砸了。

说是因果报应也罢，说我们农村人讲迷信也罢，这个贫协主席后来一家人都

遭了报应。大饥荒时，她男人偷杀生产队的牛，被公安抓进监狱，饿死在牢房里。接下来这个贫协主席也饿死了。她1955年生的那个儿子，因他妈做的坏事太多，受到周围人的白眼和谴责，他为了赎罪，到处去塑菩萨。但他压力太大，神经错乱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投河而死。

1949年后我们一直挨整，地富反坏是阶级斗争的活靶子，随时随地被抓出来斗打。生产没搞好，怪“四类分子”，抓来斗；要促进生产，先斗地富分子；队长的猪吃农药死了，认定是地主富农投毒（后来真相大白，但把地主冤枉整了就整了。）……我母亲胡钟氏是1917年出生的，她是黄花闺女填房来到胡家。1947年我爸去世，1949年“解放”后她就开始挨整。在她50岁那年，1967年，文革阶级斗争非常残酷，她终于经受不住了，投河自尽。她是在中秋节前投河的，中秋是一家人团圆的日子，但我们与母亲已经阴阳相隔。

我妈是一个典型的克己待人的女人，自己不吃不穿都要照顾别人。

在大饥荒时，我们胡家饿死五个，一个堂弟（胡文生）、一个堂妹（胡瑞芬）、一个祖母、两个叔叔（胡子鸿、胡子鹤）。

我们始阳镇上有个贫下中农，文革时说的一句话，我觉得很有哲理。他说：“毛泽东发一把刀给你，再发一把刀给我，让人们互相砍杀（阶级斗争），这样人们就不找他要饭吃。”

我小学毕业就不准我读书了，我永远记得把我赶出校门时说的那句话：“教育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这样，我13岁就被赶去出工劳动，不去就不准吃饭——那时是吃公社食堂。不准吃饭，这个好可怕！所以，我很小就当上了人民公社社员，从此当了一辈子农民。

我这辈子没受到什么教育，但是，遗传基因起作用，我一辈子都爱书，更喜欢读书。文革时我没有参加造反派，如果参加了，我首先要做的就是偷书，其它什么都不要。我也特别喜欢结交读书人。

（注，关于胡庆生酷爱买书、读书，媒体作过专访，详见后面节选三。）

那些年，我不敢结婚也结不起婚，哪个愿意嫁给一个地主子女？我是在改革开放后才结的婚，那时我都四十多岁了。我有一个女儿，她大学毕业后当了一个教师，算是把土改后我们胡家中断的书香续上了。



胡夫人（结婚时）。

采访时间：2015年7月22日

地点：雅安天全县始阳镇

采访后记

几年前，在大邑县刘文彩庄园采访时，偶遇胡庆生，但一面之交，没有深谈。后来，他在网上看到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作的关于川东土改的演讲，便来电一再邀请我去始阳一聚。但我很“势利”，直到得知他是地主子女后才专程前往。

本来，这本土改采访录早已排完版，已有不少案例，但不知何故，只要一听说有人经历了和了解那段历史，我便有些身不由己，无力抗拒。

然而，胡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他对那段历史的讲述，而是他对书的酷爱和他那间书房。

走进胡先生的家，已经见多识广的我还是有些不适应，低矮、阴暗、狭窄、破旧；屋后的猪圈，梁上的蛛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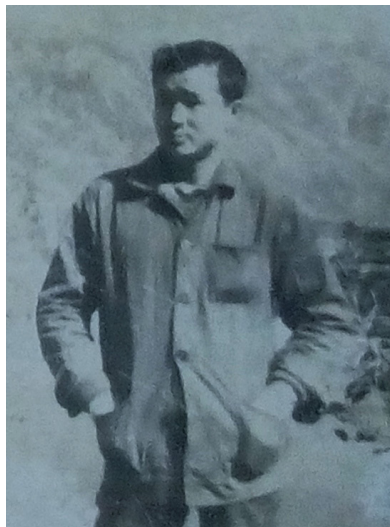
然而，在几间屋的中央，有一个整洁儒雅的书房！里面，灯明玻净，电脑屏光闪闪，书画暗香幽幽，还有几件乐器，胡先生竟捧起吹出一串悠长乐音！

仿佛荒寒沙漠中陡然出现一泓清波连连的绿洲，让人竟一时困惑这种反差。

当胡先生从电脑上调出《雅安日报》对他的专访《农民“书痴”，藏书三千》一文时，我长叹一声：被宰杀的岂止是肉体生命；被抢夺的哪只是金银财物。

庆幸的是，遗传基因还没被剿灭。只读过几年小学，当了一辈子农民的胡庆生，在祖辈传下的、暴政抢不去的基因驱使下，一辈子嗜书如命，一辈子苦读不已！

胡家的那个著名大院，就在胡庆生破旧平房的对面，现在这大院已经又属于私人财产。我很想进去看看，但院门紧闭，主人不在，我只得爬上院外的一幢楼房，探望了大院的一角。



胡庆生 1979年

下面是《雅安日报》刊登的关于大院和胡庆生藏书的报道（节选）

节选一

边城旧事，家族兴衰七百年

明太祖洪武六年 1373 年，胡泰鹏便带着幼子西入天全避乱，从他开始，胡家的香火便开始在天全境内播撒。

第九代传人胡国统本是一名医生。他凭着精湛医术积攒了些财富，迁徙到始阳买房屋置地。

到十九世纪初，胡氏分支已经广布天全，其族众兴旺，财力殷实，成为当地最兴盛的家族之一。

1807 年，胡氏集全族之力，于始阳老街上兴建大宅院，以聚合家族旺盛人气。

这就是今天的胡氏旧居。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作为胡氏家族的祖屋，这里一直很热闹。

.....

进了大宅门，桢楠树生长在堆放茶叶库存的前院。沿着宽阔主道往里走，就到了雕花照壁。当年，这里是胡家的“生活区”。

在一百多年前的遥远秋天，黄透了的银杏摇曳在花园，后院里花草染金。

高大堂屋里，供奉着家族先辈。香火缭绕间，成年男丁聚集在胡老爷身边，听一家之主分配经营任务，也发表自己的意见。

每天上午，大宅院里都会响起琅琅书声。

今年 69 岁的胡林生觉得，家族旧居里埋藏着他的童年记忆。他是胡庆生的三哥，



胡家老宅一角

同为胡家第十七代传人。他说，他小时候就在四合院里念《三字经》，背《唐诗三百首》。那时候的四合院很气派，他长到十几岁才搞清楚院子到底有多大。

二十世纪初，庞大的胡氏家族家道不振。商业破产之后，私有土地也纷纷变卖。到民国时期，凭借“耕读传家”家训，通晓诗书文章的胡家人开始“靠文化吃饭”，在没落宅院里办起了学堂。

胡庆生说，当时学堂就设在四合院的堂屋里，老师全部是胡氏后人，始阳场上有钱人家的子弟都来这里上学。靠着崇文家风，胡氏家族继续在老宅院里生活着。

上世纪四十年代，刘文辉发起“铲烟”的禁毒运动，国民党第二十四军的一个营奉命来到天全“铲烟”。这支部队进入始阳后，没有营房驻扎，便跑到胡家旧居里歇脚。

胡庆生说，那么多兵都能够住进去，可以想像四合院规模有多大。

解放后，胡氏旧居收归国有，成为“天全县粮食局始阳供粮仓库”。直到前几年，被一位当地人买下，成为私有财产。

节选自《雅安日报》2008年11月30日

节选二

胡氏旧居里湮没的百年传奇

巷道深处，竟有雕梁画栋，屋宇恢弘。尽管已两易主人，一个庞大家族的显赫昨天，却依然埋藏其间。

一条长达三十多米的巷道，安静地匍匐在天全县始阳镇的老街边。巷道尽头，一座规模宏大的古老宅院赫然入眼。

这是一座布局严谨的明清式四合院。半个多世纪来虽几经易主，损坏和改建也时断时续，但庭院的严谨布局尚在，规格犹存。其间尚有回廊交错，曲径蜿蜒，残存的房柱石墩上雕龙绣凤，精美不输当年。徜徉其间，仍能感受到宅院当年的恢弘阔绰。

进门处南墙上，一块巨大的雕花照壁颇为惹眼。雕花上尽为神话人物和吉祥花鸟，虽饱经岁月磨砺，却仍旧清晰。照壁上共有雕花二十一朵，围绕着中央一块硕大的吉祥雕花“合团欢抱”，隐隐透出胡家人当年的显赫。

胡氏后人胡林生说，整个宅院占地约五千平方米。现在部分院落已经拆除改建，规模已不如前。

胡氏旧居现在的主人姓高，听他的岳母讲，他准备以后将这座古四合院复原。

天全县文管所所长杨寒认为，规模如此宏大的民用四合院，在始阳当属独有，在天全亦为罕见。“对于明清时期南方四合院的研究而言，这座结构相对完好的四合院，具有‘样板房’意义。”

在等级森严的古代中国，各种建筑都带上了深深的等级烙印，即“规制”或“规格”。

四合院中轴线上，厅堂和回廊环绕而成的天井称为“进”。“进”的多少，既体现了四合院的规模大小，也是其所有者身份和财富的象征。

作为一所民居，它竟然有七个天井。建筑中轴线横穿过其中五个，另有两个小天井对称分布于厢房和堂屋之间，呈“七星抱月”之势，形成了一座“五进”四合院。正所谓“七进王府九进宫”，在古代，“五进”的规制已经是接近皇亲贵戚住宅的“顶级设计”。著名的老北京四合院“文煜宅”，就是一座“五进”的高规格住宅。

能够修建“五进”四合院的胡氏家族，当年究竟是什么身份？

胡庆生是家族第十七代传人。他的家和胡氏旧居仅隔一条老街。老人说，这座宅院大约于1807年开始兴建，工程断断续续地持续了五十多年，直到十九世纪中期才告完成。

“我们胡家先祖曾是高土司麾下亲信，打过张献忠。后来做起了边茶生意，成为地方富贾。”胡庆生说。

而关于这个古老家族的疑问，都在胡庆生小小的书房里烟消云散。在这位花甲老农的书房，翻阅百年前的手书，轻薄的发黄书页之间，厚重的家族史诗跃然眼前。

节选自《雅安日报》2008年11月30日



从墙外望胡家大院

节选三：

农民“书痴”藏书三千

一个普通农民，因为好读书，30年里藏书超过3000册，花在购买书上的钱超过了15万元。

好读书，翻烂字典

胡家曾经在始阳开过茶号，也是当地有名的大族，“耕读传家”是家族的传统。胡庆生很小的时候便被大哥教育着读书，进了自家办的私塾。后来，胡庆生的大哥被打成右派。文革，他无书可读，那是他人生中最枯燥灰色的一段岁月。

“当年手头只有一本新华字典，硬是翻来覆去地看，把字典都翻烂完。”胡庆生从书柜中拿出一本书页已经破旧散落的字典。

为买书，没钱过年

上世纪80年代初期，胡庆生在石棉县打工，刚发了伙食费，他便立即去买了心仪已久的《隋唐演义》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正值年关，买了书，伙食费所剩无几，只得买一根卤猪蹄过年。“为了买书，我宁愿饿着肚子！”他说。

1982年，胡庆生到外地打工，领了50元工钱，他转身就去买了一本厚厚的《辞海》。三十年下来，胡庆生花在书上的钱超过了15万元，“每一分钱都是血汗钱，这让我的书变得更有价值。”他说。

悟人生，往事并不如烟

胡庆生买的第一本书是叶评注聊斋志异选曳，这本书的封面已经遗失，但他觉得“这本书给我开辟了一个新的世界。”

藏书三千，深深打动胡庆生的，是一本《往事并不如烟》。每次看这本书，他都会流泪。“一读这本书我就想起自己的童年，想起我的大哥。”

读《杨乃武与小白菜》，胡庆生说自己从中知道了什么是人性，看到了一个社会的悲剧。读史书，让他知道，不管在什么时代，都不能说假话，哪怕只能选择沉默。

找回失落的书香传统

俗话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对此，胡庆生觉得俗不可耐。他认为，人更应该在书中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

藏书几十年，胡庆生的真正想法是，将“耕读传家”的传统传承下去。

胡家先祖在天全曾任文官，世代藏书。至清末，胡家收藏的书籍堆满了一层楼，其中不乏明清时期的孤本、珍本。而这些书籍已全部遗失了。



谭松与胡庆生合影于胡的书房

胡庆生一直想恢复祖先的传统，藏书被他认为是最好的办法。“胡家先祖一直有藏书的传统，我就想到通过藏书来发扬祖先的传统。”

对于他现在的收藏，胡庆生觉得有一些无法弥补的遗憾。“有些书一辈子就见过一次，可惜当时没钱买。”

胡庆生说，他将穷尽一生之力来收藏书籍，在有生之年达到5000册。

胡庆生想把藏书传给女儿，他女儿是个教师，对父亲的想法很认同。“书由女儿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同时要求他们拿出一些钱来增添新书，经过几代的积累，就能达到一

定的规模。”胡庆生说。

节选自《雅安日报》2008年11月30日

胡庆生曾花了大量时间，一个个落实当地在大饥荒时饿死的乡亲，下面是他列出的名单：

原天全县始阳人民公社劳动管区第六食堂 “三年大饥荒”死亡人员名单

按：随着岁月流逝，“三年大饥荒”（官方称“三年自然灾害”，百姓称“粮食关”）离我们越来越远。幸存者们或作古，或高龄，又因种种原因而少有著述，因此社会对该事件的记忆愈来愈淡漠。然而，作为该事件的亲历者和幸存者，我有责任把我所经历的苦难如实地记录下来并告诉后人。

现将我所在的天全县始阳人民公社劳动管区第六食堂（或称劳动管区第六连）即现在始阳镇兴中村5、6、7三个村民组死亡人员名单开列于后（凭笔者记忆和不完整的采访）：

廖山氏（廖有云之母，时年不足50，1960年春上山割草饿死在山上）

廖水华（廖有云之胞兄）及其女儿（佚其名，死时年仅3岁）

王山氏（王永吉之母）

邱兴杨（邱玉春之父）

王国英（邱玉春之嫂）

梦 梦（音，王国英之女）

田宋氏（田素珍、田素林之伯母，人称“扁三娘”）

张文荣之叔祖母

高成武之母（佚其姓氏，高启智、高启仁之祖母，此老妪一生笃行善事，虔诚拜佛）

黄张氏（张孝云之姑母，人称其“闷三姑娘”）

刘品亨夫妇（刘嘉珍之父，妻高仕英乃续弦，刘嘉珍之继母）

胡开文及其侄（佚其名，胡开武之子，因耳背，人称“聋子”）

胡开贵（号曼生，胡开学之胞弟，胡“老砍”之父）

杨淑羣（胡开学之续弦，民国时期芦山县县长杨方书之胞妹）

李树芳（李凤荣、李凤梧之父）

李树芬（李树芳之胞兄，李凤华之父）

李小牛（李树芬之幼子，死年未及7岁）

打更匠老李（外地人，1949年前徙入始阳，清道夫兼打更，时寄居高天德家）

官溪头阿伯（佚其姓名，时人以此呼之）

古妙六（人称候阿娘，有一养子，名王正全，后在本乡荡村安家）

高国珍（李进怀之发妻，李长春之生母）

汪 云（汪天文之父）

- 爱娃儿（汪云之幼子，死时未及5岁）
- 陈秉洁（高文辉之妻，高美燕、高小燕之母）
- 韩召惠（又名韩沛棠，曾任民国区分部书记一度被劳改）
- 韩召惠家帮工（胡姓，佚其名，人称胡阿伯）
- 张淑娴（韩忠鑫之妻，韩沛全之母）
- 赵韩氏（无后裔，当时居于高文贵家）
- 高文荣夫妻（高文贵之胞兄，人称“老牵份”）
- 赵炳先夫妻（妻陶氏，赵登荣、赵登华之父母）
- 高联方夫妻（其妻候氏，高崇儒、高崇光之父母）
- 高美珍（高崇儒、高崇光之胞姐，小名“珍兰”）
- 黄河（黄平之子，小名“水清”，死年未逾8岁）
- 高学海（高登云、高凌云之父）
- * 高氏（佚其夫家姓氏，高学海之胞妹，死时年近耄耋）
- 高学华（高显云、高祥云之父，“闷屁”之祖父）
- 高高氏（高学深之妻，高青云、高孝云之母）
- 刘文斗夫妻（妻贾氏，刘殿华、刘殿富、刘殿贵之生父母）
- 刘家五姑娘（刘文斗之胞姐、牵镇新村5组段启惠之外祖母）
- 徐和志之岳母（佚其姓氏，夫家胡姓，胡开甲之母）
- 高学清（无后裔，其妻亢氏后为生产队五保户）
- 杨宗德（小名孟春，杨银匠之子，60年管区安排上山背煤炭，饿死途中）
- 胡肇元（胡之润之父）
- 芦兴顺（云阳县人，政权更迭前来始阳，居于心街子口摆小摊维生。）
- 卢成基（黄宣仁之父）
- 吕高氏（吕祥顺之妻，吕文皋之生母）
- 黄张氏（黄学荣之祖母）
- 魏怀兴（人称“魏锡匠”，魏洪云之父）
- 彭怀安（彭兴顺之子，彭冬全之父，时年30余岁）
- 罗山氏（罗祥雷、罗祥雪之母）
- 罗李氏（罗祥明之妻，罗八达之母）
- 程绍珍（罗祥伦之妻，罗文清、罗文远之生母）
- 李*氏（佚其姓氏，李春方之母）
- 胡光前夫妇（妻高文香，育有二女）
- 刘殿武（刘洪生之父）
- 杨银春（杨王氏之夫，无后裔）
- 高秀英（高国启之妾，有二女，长女素华嫁安乐乡毛坪山，次女由其姑妈带至陕西）
- 廖聋子（佚其名，耳背，人称“聋子”，曾卖“钵钵鸡”）
- 胡罗氏（笔者堂叔母，胡贵元之母）
- 廖廷莲（廖有梁、廖季能之胞姐）

李光荣（李明全、李明贵之父）

汪树萱（裁缝，汪天福之父）

张占魁（张正清之父）

全香（李明珍之女，全福之胞姐，时年未满15岁）

宋玉莲（高庆忠之养母，人称“宋家二姑娘”）

孙全兴（人称“孙染匠”，可能是邛崃一带人，政权更迭前来始阳）

曹兰英（笔者族兄胡明礼之续弦，胡光祺之继母）

胡孝忠（笔者族兄，其亲属大部于政权更迭前相继定居香港，致60年代初，不时有营养品诸如炼乳之类通过邮政寄回，然多被当局没收，并冠以“投机倒把”罪名将其收押，1962年初病死于天全县公安局看守所）

段谢氏（段崇皋之妻，段启文、段启武之母，段克昌、段美昌之祖母）

胡清芬（笔者堂姐，死时24岁。其舅父黄璞民国时期曾任荣经县长）

史张氏（史国光之妻，史全珍、史全清之生母）

高瑞轩（曾任始阳联合诊所医生，高永全之父）

杨明英（杨忠仁、杨忠义、杨忠康之父）

解婕春（无后裔，人称“李阿娘”，当时居于杨明英家）

上列共计死亡82人

后记：当时，笔者所在食堂总人口512人，死亡率达到16%，“三年大饥荒”中，雅安地区的“重灾区”并非天全，而是荣经和芦山。始阳也不是天全的“重灾区”，天全的“重灾区”依次为永盛、大寨、永兴……

（注：关于荣经县在大饥荒时的死亡惨烈已有《大劫难》一书披露，作者：童梓平、阿宁）



始阳镇

地主，枪杀； 工商业者，绑票！

讲述人：叶中仁
雅安市退休职工



我 1941 年 2 月出生，今年 74 岁了，土改时我还小，但那 10 岁时的印象现在都很深。

那是在雅安的一个斗争地主大会。

雅安有个地主叫毕光奎。以前刘文辉在雅安搞了一个西康省干部训练团，那儿有一个很大的坝子，批斗毕光奎就在那个坝子。我去看热闹。会场上有一个老太太，用鞋底板打他的脸。

斗争会完后，毕光奎被押到城边的飞机坝，那儿曾是个机场，抗战时还停过飞机。我跟着跑去看，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打死人。打的脑壳，我感到很恐惧，口袋里的花生米都感到厌恶，抓出来丢了。毕光奎被打死后，衣服都被人扒光——那时穷，死人的衣服都有人要。其实，毕光奎是个很善的人，他死时才 40 多岁。

我家不是地主，我堂妹的婆家是地主，她婆家在雅安芦山县，是当地的一个旺族，也是一个书香世家。这个书香世家里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儿，叫唐和玉，



焚烧地主田契（网络图片）

是我堂妹夫的姐姐。她被抓来捆绑吊打，吊“鸭儿凫水”。她被打得没法，跳到粪坑里自杀了。为什么跳粪坑？大概是她没有选择，连走到河边投江的自由都没有了，只得跳粪坑。唐和玉不是地主，仅仅是地主的子女。

我岳父是个知识分子，自小在外读书，但他家里是地主。他的哥哥、嫂嫂受尽折磨。不过我岳父的二嫂承受力很强，无论怎么打她，把她压按在粪水里，她都挺过来了。

我们家是个书香世家，1949年前（我从来不说“解放前”、“解放后”），家里开店卖书、卖文具、后来又卖百货，属于工商业者。

1953年，搞“三反”、“五反”运动，说我们家偷税漏税，先把我伯父（他同我父亲共同经营）抓来捆绑吊打。那些日子，天天传来信，叫我们赶快交钱，赔！赔！赔！赔完了才放人。

要赔多少呢？我们进入“新社会”后才经营了两三年，就算每年都偷税漏税，应该赔多少？

后来才明白，是要我们倾家荡产！

我父亲三弟兄，把家里所有能卖钱的东西——贵重到狐皮长袍，便宜到一支水笔——全部摆摊卖，卖了马上交钱。他们说：“还不够！”我们最后只得把房子卖了。据说还不够，但是看到我们已经一贫如洗，他们才“宽大”处理，放了人。

从此我们这个家族破败四散，父亲三弟兄、爷爷奶奶，各奔东西。

后来我爸爸的弟弟饿死了，留下三个女儿。我爷爷也饿死了，他去世时我站在他床边，亲眼看到他断气。我父亲一家子女多，吃了上顿没下顿，全靠外婆家救济，我们才活下来。只是，1957年，父亲又当了右派。1977年，我又被冤打成现行反革命，判刑20年，与文革时重庆“八一五”造反派的头头周家渝关在一起，在南充四川省第一监狱。

不过我没坐满，6年零三个月后平反释放。

采访时间：2015年7月23日

地 点：雅安天全县始阳镇

采访后记

在天全县采访胡庆生先生时，他约了他的几个朋友从雅安赶来相聚，叶先生是其中之一。交谈中，感到叶先生胸中淤积了太多的悲愤，轻轻一触碰，便是悲情泪光的闪烁。当提到身旁陈尚健女士一家8口人之死时，他竟热泪滚滚。

可惜，由于下午匆匆离去，对叶先生的采访浅尝辄止。

我们徐家的兴衰沧桑

讲述人：蒋可煌

1949年生



你来采访这段历史，我非常高兴，中国这一百年的历史，是最苦难的历史！

一，我的家族

我的老家在江苏宜兴，曾是个显赫的名门。

我奶奶叫徐玉梅，她父亲叫徐致靖，是清朝翰林院的进士，在礼部任职，是正二品的礼部右侍郎。我们都知道“戊戌六君子”，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等六人在北京菜市口被杀，史称“戊戌六君子”。其实，当年本是七君子，而不是六君子。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后，徐致靖、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七个人一起被捕。这七个人中，徐致靖排第一，他不仅官位最高，还保荐了很多维新党人，慈禧太后最恨他。因此，慈禧太后要处斩的不是六个人，而是七个人，这个第七位“君子”就是我太祖爷（曾祖父）徐致靖。后来为什么说是六君子，就是因为我太祖爷没有被问斩。慈禧太后要杀我太祖爷，除了他支持新政，上过许多变法改制的奏折外，主要原因是



徐致靖

他上《密保人才折》，向光绪帝保荐了康有为、谭嗣同、张元济、黄遵宪、梁启超等人。慈禧太后要杀的人中，他排在第一个。

太祖爷为什么没被杀呢？这得说到他的父亲徐伟侯。徐伟侯与李鸿章是密友，他们在1847年同时考取进士，私交很深。太祖爷下了大牢后，他的儿子徐仁铸（他也是进士）去求李鸿章，李鸿章又去找王爷荣禄帮忙。荣禄去求慈禧太后，荣禄看到判罪名单，第一名就是徐致靖，判的是“斩立决”，下面是谭嗣同等六人。荣禄说这个人不能斩，他是

翰林院的一个书生，他的学生遍天下，如果杀了他，朝野会有震动。他没有政治抱负，平时也不参与政治，当时皇上想要维新变法，他只是把这些年轻人推荐给皇上。西太后看在一个王爷、一个中堂的份上，把“斩立决”改为“斩监候”（相当于现在的死缓），这样我太祖爷就把命保住了。他在狱中蹲了两年后，八国联军打入北京，慈禧太后西逃，刑部大牢无人看管，家人把徐致靖接出来。后来慈禧回到北京，下诏赦免了太祖爷。他出狱后归隐杭州姚园寺巷，自称“仅叟”，意思是自己是唯一一个戊戌变法里活下来的人，直到1917年病逝。对了，关于我太祖爷的事，网上有大量的报道，比如《“戊戌第七君子”徐致靖何以能刀下留生》、《大难不死的戊戌第七君子》等等，你可以上网查看。

二，我的父母

下面我再讲讲我的父母。

我父亲蒋思豫1914年出生，1936年复旦大学毕业，学的是新闻专业。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在武汉第三战区驻京办事处工作，1938年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任宣传干事，当时，上呈的行文都是由他誊写。

他还身兼《中国青年》编辑和《中央日报》、《扫荡报》记者。作为战地记者他亲历并报道了台儿庄战役和武汉保卫战。台儿庄战役打响一周后，他同《大公报》记者范长江、《新华日报》记者陆怡前往台儿庄前线采访。好几个记者都在战场上伤亡了。在武汉保卫战时，他多次钻进战场的散兵坑里采写新闻，向外界介绍战况。现在台儿庄大战纪念馆给我父亲塑了一个雕像。



蒋可煌在台儿庄大战纪念馆父亲的雕像前



蒋思豫抗战时为张灵甫（前左二）等将领拍的照

1949年大陆沦陷前（我从来不说“解放”），我父亲担任贵州省党部的主任秘书，属于二把手，还担任过中统西南区的代理主任，这时他已经是少将军衔。抗战期间，父亲一直跟着蒋公（蒋介石）在重庆，他与蒋公同姓同宗。他很年轻时官位就很高了，他的毛笔字写得

非常好。

1949年时他没去台湾，因为当时我妈妈正怀着我，挺着一个大肚子。同时，他考虑到奶奶在江苏守着那个徐家大院，我的外公外婆在宁波，他们都不愿走。更主要的是，他认为他为共产党做了很多好事。比如，他在当中统代理主任时，接到梁漱溟，邵力之的亲笔函，希望他救关押在贵州的息峰监狱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一个是西南联大的党委书记肖尚华（音），另一个是贵州省的地下党省委书记刘建秋。父亲救了这两个人，所以后来他没有被拉回贵州枪毙。



时隔77年，作为当年的亲历者和见证者，蒋思豫向台儿庄大战中牺牲的英烈们敬献花圈。

但是，1950年4月27号，他在上海被抓捕了，关押在提蓝桥监狱，副市长潘汉年和公安局长杨帆亲自审问他。父亲幸亏是在上海被抓，也幸亏他救过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当时杨帆说，如果我不把他抓起来，其他地方抓他，他十个脑袋都保不住。

父亲没被枪毙，但被关押了整整26年（先关在东北抚顺，后关在安徽），直到1975年特赦国民党县团级人员他才回到家乡。

同我太祖爷一样，我父亲的情况网上有大量的报道。

我母亲徐敏蕾是满清正黄旗的后代，她的爷爷是满族镇守武汉的大将军的后代。妈妈两岁时在武汉被送给了汉人，她是在1964年找到自己的两个哥哥后才了解到自己的身世。可惜，她的两个哥哥在文革时都死于非命，所以母亲以前的身世就不太清楚了。



1941年4月8日，蒋思豫与徐敏蕾在衡阳乐园大酒店结为伉俪，宋美龄作婚姻介绍人与证婚人。

我妈妈长得很漂亮，身材也非常好，比那些上海的电影演员还漂亮，号称绝色的民国美女。当时上海中国照相馆里四十八寸的彩色大照片，都是挂的我妈妈的像。

1941年，妈妈正在重庆的一所学校里上学。有一次，蒋介石和宋美龄到学校视察，宋美龄见到了这个美丽的小姑娘，觉得她很可爱，就与她聊了起来。当了解到她与蒋介石是同乡后，宋美龄就认她做了干

女儿。在重庆时宋美龄最喜欢她，宋美龄到昆明去时，带了三个女孩子，其中就有我妈妈。

宋美龄还是我父母的婚姻介绍人与证婚人。

父亲被抓捕关押时，我母亲才 25 岁，她四处奔波，找人营救。她找到上海市的主要领导，还找了很多著名的民主人士，如上海的七君子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人。当时也有很多人帮她，一是因为她长得漂亮，二是看她的确可怜。他们悄悄给她包里塞点钱，接济我们的



徐敏蕾

生活。但这不是长久之计，他们于是介绍她去工作。最初去的是上海市人民政府交际处，他们一看，不仅人长得漂亮，字也写得非常漂亮。可是，当得知她丈

夫去年被关押，交际处就不干了，叫她离婚。母亲说，潘汉年亲口给她讲，父亲最多三年就会放出来。她要等他。

她不知道，父亲要被关押 26 年。

她后来到虹口区第四中心小学当了老师，独自一人抚养我们三弟兄。

文革到来时她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罪名是抗战时在宋美龄的航空委员会里工作过。她被抓出来斗打，说她是化妆成美女的毒蛇，混进了教育队伍。她被开除出教师队伍，关进了大牢。改革开放之后她才获得平反。



文革批斗徐敏蕾现场

文革时我也被抓来挂牌子批斗，原因是他们要我改名字。他们说：“可煌？你还想你们蒋家辉煌？”

三，我的奶奶

奶奶的父亲徐致靖在宜兴老家有三百亩地和一个大院——徐家大院。戊戌变法后，她父亲和她的两个哥哥徐仁铸和徐仁镜都流亡外地，没有再回乡，所以徐家的地和大院都是奶奶来管理。当时，一个妇人来管家是很少见的。

我没有在徐家大院生活过，我听我父亲和哥哥讲，当年大院非常豪华，特别是很有文化气息。父亲告诉我，他小时在家里看到，中堂的座椅上，有一张虎皮，中堂红木椅后面挂的是北宋著名书画家米芾的字。你说现在米芾的字价值多少？上次在香港他的一幅字拍出了一千多万。还有徐悲鸿，他也是徐家的后代，我奶奶的小堂弟。抗战胜利后奶奶庆大寿时，他亲自画了一幅画《猫蝴蝶图》送给奶奶。

父亲说，家里还有很多明清时的画，都非常名贵。这几十幅字画如能留下来，现在我在美国别说一栋房子，就是一栋高楼大厦都能买下来。

可是，共产党来了，土改工作队立马把我奶奶赶出徐家大院，土地全部没收。那时她还不知道我父亲已经被关押了，后来她知道后天天哭，哭得眼睛都看不清东西了。

她被赶到徐家大院后面一间柴屋里，柴屋下面堆放柴，上面是个小阁楼，她住在阁楼上，每天爬上爬下。

徐家的所有财产全部被收缴，奶奶要求土改工作队留一张床和梳妆台给她，她说那是她陪嫁来的。工作队答应了，我们徐家的全部家产在土改中就剩下这两件东西。

你看到过我奶奶的照片，多么慈祥的一个老太太。农会强迫她天天去扫地，奶奶70多岁了，一双小脚。她出去走路不能走在路中间，要低着头在路边的屋檐下走。我哥哥一直跟着我奶奶，他天天目睹这一幕。



奶奶没被枪杀是她在当地做了大量善事，日本人打来时，逃难的人她都收进大院，把所有的钱财都施给穷人，她在当地威望很高。

土改把徐家财产全部没收了，没吃的，我哥哥提个篮子，轮流到两个姑妈家要点饭。奶奶长期饿饭，在1956年去世了。

奶奶是徐致靖的千金闺女，又有文化，就是这个结局！这段历史讲起来非常伤心。

四，我的感叹

1949年前，徐家大院经历了时代的动荡和战火的侵袭，但都毫发无损。太



年轻时的蒋可煌

祖父遭遇牢狱之灾，朝廷都没有抄我们徐家。日本人打到宜兴时，驻城军司令部在大院贴上告示，明示这是前朝徐侍郎的家，所有军人不准入内。所以，在战火中徐家大院和里面的财产全保存了下来。民国时期徐家没有男人，一个孤老女人当家，家财都安然无损。

可是，中共的土改一来，抢的抢，分的分，毁的毁，徐家大院灰飞烟灭！那张黄花梨床和红木梳妆台在奶奶死后也不知去向。十年前我去老家寻找祖坟，什么都没

有了！我去找统战部的领导人，问是否给我太祖爷建个纪念馆，他是这么有名的历史人物。可没人理我。那位领导说，要建，就像你父亲那样，自己发动亲友集资建。

历史就这样抹去了，文化就这样破坏了，如果徐家大院房子还在，那些字画、古董、家具还保留，一代代传下去该多好。我现在常常想，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国家，把自己的文化掐断了，祖宗也不要了。

还有，1950年父亲被抓时，抄了我们在上海的家，家里的东西也全部被抄走，包括所有的字画。很多字画是很珍贵的，比如蒋介石、林森、于佑任的题字。

父亲出狱后，回到妈妈的祖籍宁波镇海，他闭门隐居，专心致志研习书画。父亲受家庭熏陶自幼酷爱书画，曾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弟子。在他百岁时，举行了一次书法展，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吴伯雄，副主席蒋孝严为书法展题词；抗日名将张灵甫之子张道宇与其母王玉玲女士、抗日名将张自忠之孙张纪祖、武昌首义邓玉麟将军之孙邓中哲等从台湾、美国等地前来祝贺。邓中哲在开幕式上讲话称：“他是中国百年历史的见证人，他的人生轨迹也是苦难中国百年的缩影。”

2016年我爸爸去世，终年102岁。他是在大陆的最后一个国民党将军。

他去世前告诉我，你还是到美国去吧，那边是自由的空气、自由的政治状态，中国的变化太大了，说不准什么时候又来一场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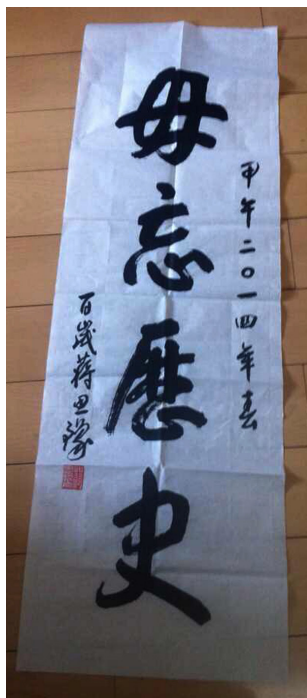
我2016年离开中国当然同父亲去世有关，他在世我不会走，我很孝顺他，觉得他这辈子太不幸。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共的做法越来越糟，现在又在搞独裁，



晚年的蒋思豫与徐敏蕾

这样下去，中国的老百姓又要遭殃，而我这个嘴又爱讲，在政协和民主党派里一天到晚批评他们。2016年我出来后又回去，原因是放不下母亲，可回去一看，形势不对，又出来，反复好几次。母亲叫我不回去了，说共产党早晚要找我算帐，因为我反共言论这么多。我也害怕，中共早晚要收拾我。2016年12月我才最后下决心出来。

我妈妈已经是九十多岁的人了，她说，明年就是父亲去世三周年，她守父亲三年，



然后来美国。

她说，她死也死在美国。

我很感叹，我们在这个年龄还不得不背井离乡！

采访时间：2018年5月31日

地点：美国洛杉矶

采访后记

蒋先生是我在国外采访的第一个人。

5月27日，我们在拉斯维加斯的一次会上相遇，他提到土改，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当即同他约定，回到洛杉矶后去拜望他。

几天后，我们在他窄小的房间里相见。面对摄像镜头，蒋先生侃侃而谈，在美国自由的天地里，再没有在中国大陆的那种恐惧。

蒋先生本人没有经历过土改，可是，家族的命运、父兄的讲述，都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让他感叹万千而又痛心不已。

我同他的遭遇相同，都是因为害怕被中共抓捕而被迫流亡海外。我到达他住处时，他告诉我，他几乎通宵未眠，因为他贤惠的妻子被美国使馆拒签了，不知今后是否还能来美与他团聚。

看见他万分沮丧一脸疲惫，我不知如何安慰他。他马上到70岁了，同我一样，现在都还没有获得留在美国的许可。

故土难归，亲人分离，异域他乡苦苦求一张“居住证”的万般无奈，独居斗室里品尝的千种孤愁……

戊戌变法过去120年了，依然是追杀恐怖的天空；辛亥革命结束100多年了，仍旧是称帝复辟的闹剧！

这是我们个人的不幸，还是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不幸？



蒋可煌与张灵甫夫人王玉玲



一个敢怒敢骂的 地主后代的讲述

讲述人：胡祖暖
1940年生



一，“解放前”我胡家的家史

我祖先是来自江西移民来的。听长辈说，在清朝前，这里只有极少数的苗民，到处一片荒凉。清政府实行移民政策，把这里居住的苗民赶走，从江西省移民数万来秀山，我祖父的祖父两兄弟就是这样来到秀山的。

他们来后一无所有，靠挑脚（下苦力）为生，后来炸油粑粑卖，然后又改行磨豆腐，由于豆腐做得好，生意红火起来，慢慢就有了些积蓄。他们又用这份积蓄做烤烟生意，当时秀山是生产烤烟的产地。

以前民间有种说法：“家不分不发”。我祖父的父亲，就是太祖父，秉承这句古训，对他三个儿子说：“祖宗千辛万苦才创下这份家业，现在分给你们，你们要好好珍惜，各自为业，为老祖宗争光。”这样，我祖父就带着他分得的一份财产移居到现在的官桥小教场居住。

我祖父精明强干，经过多年的打拼，胡家在我祖父那一辈达到了鼎盛。祖父有五个儿子三个女儿，我父亲胡传宗是最小的。那时我祖父非常注重教育，他看到国家衰弱，认为只有科学救国才是唯一的道路，因此，他培养几个儿子发奋读书。我大伯父胡光爵考上了北京大学，毕业后分到中央财政部工作；二伯父好像是武汉大学，他婚后生了三个女儿就去世了；三伯父胡光伦考上南京大学，毕业后回到秀山担任了财政局长；四伯父胡光楣读的天津大学，毕业后回乡当了乡长。祖父的五个儿子中，只有他最小的儿子，也就是我的父亲，没有离开秀山。祖父把他留在身边，读的私塾。

民国初年，五兄弟都相继结婚生子，每家都是儿女成群，三伯父多达14个子女。父辈们都秉承祖父的训示，送儿女们去读书，所以我们胡家的几十个堂兄堂姐中有不少大学生，最低的都是初中文化。我因为遇到土改，只读了小学。到

1949年时，我们这几家的人丁发展到42个。其中男的20人，女的22人。

我父亲头脑很灵，他觉得我家在那个偏僻山乡不会有大的发展，要发展必须兼营商业，因此，他就搬到了我们现在这个地方石耶镇。石耶当时虽然没有公路，但有条梅江河，经流酉水、沅江、洞庭入长江。秀山当时也没有公路，农村出产的桐籽、茶籽的销售和加工很困难，而石耶正是这些物资的集散地。父亲看到这一点，着手创建了一个集收购、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商号“瑞发恒”。他建厂房，修码头，安装榨油机（木制土榨），搞桐油加工。桐油加工就是从桐油中提炼一种叫锈油的高纯度油，用来油漆船舶和机器。油用船从门前的梅江河运出去，一直运到上海。我父亲发了财，担任了地方上的乡长，还兼任石耶区的民团团长。



梅江河

在1949年前，我们胡家在秀山是一个旺族。

大伯在南京政府当了个副科长，他干了一段时间，很想回乡搞实业，那时也提倡乡村经济，于是他就回到秀山官桥。当时在国民政府干事，走人时是没有什么退休金的，更没有什么子女接班，这种作法就是为了减少国家的负担。我大伯回到乡里，并没什么钱，但是他有知识有文化，他和我三伯这种人，就是当时农村的精英分子。大伯带回了不少种子，比如西红柿、西瓜等等，交给农民种。还有，那时秀山的盐很贵，要从外地运，有“斗米斤盐”的说法，就是一百斤米才能换一斤盐。我大伯从酉阳的龚滩运盐回来，全部按成本卖，不赚一分钱，就是想减轻农民的负担。

当时的人都喜欢购置田地，为什么呢，金银财宝可能被强盗偷，被土匪抢（我们这儿是四川、贵州和湖南的交界处，土匪多。）。但是，田地抢不走，所以人们都愿意保留田土，可以靠出租田土收益。当时一般是按四六分成，也有三七分成和五五分成的，一般由租户和佃户协商。我家与佃户是两种，一种是按四六，佃户六成，我们四成，有些很贫穷的就是三七开。1948年我曾经跟我哥哥去收过租，谷子一打了当场就分，假如是10挑的话，我们就得4挑。佃户要把这4挑谷挑到我家。交租时家家都备有凉水和甜酒，佃户挑一挑来就喝一碗甜酒。所以，打谷子之前要做几大坛甜酒。记得那天中午我是在佃户家吃的饭，当时地主和佃户的关系是相当融洽和谐的。

二，土改来了！人，杀了；财产，分了。

土改来了，那就是暴风骤雨呀！

他们首先挑动地主和农民的矛盾。第一步是宣传，开群众大会。当时我 11 岁多，记得听他们说：我们代表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共产党来实行土地改革。为什么时候要实行土地改革？因为我们是解放穷人的，是为了让穷人不再受地主的剥削和压迫，是把穷人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的政府。几千年你们为什么穷，为什么受剥削，你们想过没有？就是你们受三座大山的压迫，你们的劳动果实被地主全部剥削走了。你们穷了，他们富裕了，这是一种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是一种吃人的社会。我们今天就是要帮助你们站起来，就是要斗争地主，要揭露地主的罪恶，要把他们的财产全部夺过来，因为这些东西原本就是你们的，是被他们剥削走了。以前，由于国民党是支持地主打压穷人的，所以你们不敢出声，今天不同了，我们是来扶持你们解救你们、让你们翻身作主人的，所以你们要起来，同地主阶级作无情的斗争。只有把他们打倒了，你们才能翻身。

怎么打倒呢？先开会诉苦，比如说，你们农民要种地，要出种子，可收成只得一半，地主不劳而活，坐享其成，这合理吗？这就叫剥削。我们要打倒地主，当枪毙的枪毙，当劳改的劳改，把他们的土地和财产全部夺回来，因为这原本就是你们自己的东西……

通过一系列的煽动挑拨，把农民的仇恨激发起来。

仇恨煽动起来了，好，把地主拉出来，批斗！

土改干部坐在台子上，呼口号：“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封建势力！”下面群众也跟着喊。然后划成分，哪些是地主，哪些是富农，当时只要家里有五挑田就是地主。这个标准是相当低的，我们石耶有好几家，那算个什么地主嘛。有一家五口人才一二十挑田，他们只能算是自耕农，维持生活都困难。比如孙兴雄家，六口人，二、三十挑田，家里很穷，平时还要做面去卖才能维持生活，也把他家划成地主。

为什么要这样划？原因是划的地主越多，他们分的土地和财产就越多，农民的积极性就越高，共党也就越得人心。我们这个村，共划了二十多家地主，其实够地主标准的只有我们胡家、吴家和鲁家等，充其量有十家，结果划了二十多家，这还不包括富农，你说可笑不可笑，又可怕不可怕？

紧接着就是杀人，土改运动和镇反运动是同时进行的，杀地主和杀反革命也是同时进行。那些天，三天两头开会，公审，一公审就拉出去枪毙。我们石耶的镇志上写得清清楚楚，我们石耶一个乡就枪毙了 36 人。

我先说我家被枪毙的亲人吧。

我爸爸和我四伯的儿子胡署东是同一天枪毙的，那是1950年冬月初一，地点在石耶大桥下的河边。胡署东以前是老师，他同他妻子陈翠云都在石耶小学教书，他是校长，因为他有文化，就叫他来当了乡长。他当乡长没几年就被杀了。



胡祖暖父亲胡传宗和堂兄胡署东遇难的河坝

我大伯、三伯、四伯同一天拉出去枪毙，就在我们余庆村鸭子河坝。四伯父



最惨，他的两个儿子也被枪毙，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胡署东，另一个叫胡蒙源，曾是国民党的一个少将师长。抗战结束后，他到四川宜宾当了县长，刚解放他就被枪毙了。他是1909年出生的，我有他的一张照片，是他在刘湘办的干部训练班照的。

我的祖父1947年死后埋在官桥，他们三弟兄被枪毙后抬回去已经没有地方可埋了，因为土地已经分了，只有埋在我祖父的旁边。当时一块板板、一床席子都没有，因为财产也全部被分完了。他们三弟兄埋在同一个坑里。三中全会后，我去给他们立了碑，现在我每次去给爷爷上坟时，也给三个伯父挂青。我想，如果我爷爷地下有知，知道他的三个儿子睡在一起陪伴他，而且个个都是血淋淋的尸体，不知他会如何感想。

我再讲讲我看到的一些杀人场面。

土改时我虽然只有十多岁，但胆子很大，只要听说杀人，只要是在方圆30里之内，我都要跑去看，所以我目睹了一些惊心动魄的杀人场面。比如杀杨卓之，我亲自到现场观看，目睹了难忘的一幕。



埋在同一个坑里的三兄弟(胡祖暖多年后立)

1952年的3月2号，秀山枪毙了一个叫杨卓之的名人。杨卓之是秀山民团的团长，共产党来后，他进山当土匪，后来被抓住了。他当然是被杀的对象。不过，当年对秀山人民，他应当说是有功之臣，如果没有他，秀山人吃盐会很困难。当年盐要从自贡经长江进乌江，到酉阳的龚滩上岸。从龚滩到秀山有一百五十公里左右，一路上土匪多，但杨卓之在酉阳、秀山、甚至贵州的松桃一带名声很大，只要说是杨卓之押送的盐，土匪就不敢动。

公审大会是在秀山飞机坝中山纪念堂开的，会完后把他押到现在粮食局那个

地方枪毙了。在杨卓之的脚还在一抽一抽时，上去了三个人。一个手提一把菜刀，另一个拿了一个小锅和一个菜板。他们把杨卓之翻过来，撕开衣服，用刀剖开他胸膛，一把将他的心脏拉出来。他们三人就在离尸体十多米的地方，把心子在菜板上切成片，放在锅里爆炒，然后拿出瓶酒，边喝边把杨卓之的心子吃了。另外几个人，称了几斤米做的白泡粑，用泡粑沾杨卓之的血吃。

当时我还小，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想，他们是不是特别恨他呢？因为我曾听老百姓恨一个人时说：“我要喝你的血，挖你的心。”后来我长大了，才明白他们并不是恨他，而为了壮胆——练胆量！就是说，吃了被枪毙人的心子，尤其是像杨卓之这种人的心子，走到哪里都不怕。

三，堂嫂一家“绝门”

到1952年底，土地分完了，财产也分了，土改结束了。但是，阶级斗争仍然极其残酷，对地主子女的打压也非常可怕，造成了很多人间悲剧，老一辈基本消灭，下一辈深受其害。从土改到三中全会，我们胡家42口人只剩下12个，有的枪毙了，有的劳改死了，有的整死了，有的打死了，有的饿死了，有的自杀了。

我四伯家有个姐姐叫胡祖云，高中毕业，当地的民兵看上了她，一天晚上，四五个民兵闯进她家，想要强暴她。我堂姐长得高大，她大声叫喊，惊动了其他人，民兵们没能得手。他们丢下一句话：“跑得脱初一跑不脱十五。”我堂姐见事不对，赶快嫁了人，她嫁给了现在野人洞一家姓彭的贫下中农。

民兵转而把目标盯在陈翠云身上。陈翠云是我堂嫂，是个知识女性，秀山三大才女之一，解放前担任石耶小学的校长，她丈夫就是我四伯的儿子、与我爸爸同一天被枪毙的胡署东，也是该校的前任校长。胡署东去当乡长后，陈翠云就接任了石耶小学的校长。在她任校长那几年，石耶小学被县里评为模范小学。土改时，她丈夫、公公被枪毙，婆婆被吊打后神智不清，她本人也被从学校赶回家。

堂嫂长得一表人材，很丰满，当时30岁。民兵中有一个叫“来宝癞子”的人，是个痞子，他四十多岁了还是个单身汉，家里一贫如洗。他跑来想强暴我堂嫂，堂嫂坚决不干。他说：“你要是和老子（我）结了婚，你才会平安，你这两个娃娃才保得住，否则老子把其他民兵叫来，把你一家人都搞死。”在这个痞子多次的威胁下，堂嫂为了两个娃娃，被迫答应了。那几年，堂嫂都是以泪洗面。几年后大饥荒到来，来宝癞子饿死，堂嫂的小儿子也饿死了。多年后，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去看她，她和大儿子胡辽洋住在一间摇摇欲倒的烂房子里，真是家徒四壁。胡辽洋以前非常聪明的呀，但几十年后已经变得傻乎乎的了，连泡茶都不会。我担任了华联公司的经理后，把他招来干打包的工作，每天五元工钱我给他十元。

他这个样子，也没法结婚。一天，他在门外路旁看到一个婴孩，他把她抱回去，堂嫂打开看，里面有十块钱，两包奶粉，几件衣服。堂嫂也许是知道儿子成不了家，决定收养这个弃婴。

堂嫂 2003 年去世，她那个傻儿子有什么办法，是我去给她办的安葬。

堂嫂去世时，养女长到 12 岁了，堂嫂一死，胡辽洋就没办法了，是我去救济的。后来胡辽洋死在养老院，也是我去安葬的。那个养女也来给他送葬，当时她已经大了，在秀山卖服装。对了，她的亲生父母就在堂嫂家对面，当年抛弃她是因为计划生育，他家已经生了好几个娃娃了，见又生个女儿，又要罚款，因此就把她抛弃了。现在，他们见胡家的人死光了，就出来认女，主要目的是想要胡家那几亩地和那间房子，房子虽然破烂但那块地基还不小。

这样，我堂嫂一家不仅人死绝了，身后连一片瓦都不存。

四，专门用地痞流氓

共产党来到秀山后，很快建立起了农会，共产党对当地情况不熟习，需要当地的人来建立基层组织，用哪些人呢？据我所知，我们石耶农会那些人，大都是些好吃懒做的地痞流氓。为什么新政权需要这种人？因为这种人无产无业素质又差，干起坏事来无所顾忌。

比如有一个外号叫“癞蛤蟆”的田维忠，当了农会会长后飞扬跋扈，无恶不作。他多次强奸地主子女鲁世法的妻子，连月经期间都不放过。

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闯进我家来，不准我们卖米豆腐。当时，我家财产全部被没收后，我妈妈和姐姐只得做米豆腐晚上去卖，我在一旁帮着洗碗。田维忠冲着我们一阵臭骂：“谁让你们卖的？你们还想剥削我们穷人吗？告诉你，今天是我们穷人的天下，要你们死你们就得死！从今天起，不准再卖了，否则搞死你们！你们死了比一个蚂蚁还不如！”骂完他走了。他边走还边唱：“解放军的天，是明朗的天……”他把“解放区”唱成了“解放军”，而且他下面不会唱了，只是“嘿呀，嘿呀呼嘿”地哼。

他也没好报，在“粮食关”（大饥荒）时，他母亲、老婆、两个儿女都饿死。他自己也饿得受不了。一天晚上，他用菜刀将一头集体耕牛的舌头割来吃了。第二天，余庆大队大队长发现了，把他绑在食堂前面的柱子上。我从河里捞鱼回来，他看见我鱼筐里的鱼，有气无力地说：“你送我几条鱼吃嘛。”我一下子想起他得意洋洋唱“解放军的天”的情景，便没有理他。走了几步之后，我又返回，问他：“老村长，你怎么被绑在这儿？”他说了割牛舌头的事。我心想，真是恶有恶报。他盯着我筐里的鱼，哀求说：“我以前做了对不起你们的事，很后悔，你

大仁大义，不要记我小人的过，求你送我几条鱼……”他那个惨样和那种哀求的声音让我心软了。我说这鱼是生的，怎么吃？他说就生吃。于是我把小鱼送到他嘴里，他一条接一条地把鱼生吃下去。

另一个素质极低的人姓黎，是我们乡里的特派员，那时还没有派出所，特派员就是由公安局派一个人到乡上行使公安工作的人。这个人五短身材，又黑又矮又瘦，而且还一脸的麻子，因此人们背地里叫他黎麻子。他一开口说话就是“日妈”，比如他在逮捕周明山的大会上说：“日妈周明山抗粮就是破坏统购统销，日妈破坏统购统销就是反革命，日妈反革命就要抓起来枪毙，日妈你们不好好听我讲……”

这个人不仅残暴，而且是个色鬼，他看到哪家的女人长得漂亮就要去追。共产党就用素质如此低劣的人当干部。

他见我家六姐长得漂亮，就来提亲，那是土改结束后。我妈说，她还小，还在读中学，一口拒绝了他。他又去找我姐姐，结果又被我姐姐骂了。他怀恨在心，1954年，他借统购统销和禁烟运动，派民兵来把我妈抓去，一顿暴打后，罚我妈站八天八夜，屎尿都拉在身上。后来民兵说太臭了，才通知我们拿衣服去换，我妈已经奄奄一息，浑身肿胀，两个多月才恢复过来。

刚才我提到逮捕周明山，我说是什么回事。周明山是我们村的人，他老婆死了，留下一对儿女，另外，他上有一个六、七十岁的妈。1954年搞统购统销，乡上叫大家卖余粮。那一年虫灾，粮食减产，哪里有什么余粮。统购任务完不成，乡里就派民兵来一家一户地搜。搜到他家时，从柜子里搜出了那三百多斤谷子，周明山说：“我只打了这点谷子，自己吃都不够。”民兵不由分说，强行把谷子挑走了。

第二天，周明山把他母亲背到区上，对区长和黎麻子说：“我家没吃的了，只得出去讨饭，但我母亲年龄大了，走不动，我只得背来交给你们，你们吃饭时给她一口饭吃就行了。”说完他把他母亲放下就走了。

区上派民兵把他妈抬回去，同时就把周明山抓了。黎麻子说：“周明山，日妈你还敢闹粮，绑起来！”

周明山被抓到县里，一个月后，突然通知我们到梅江镇去开会。梅江镇离我们这儿十五公里，我们心想怎么通知到那儿去开会呢？南桥乡、令木乡、石耶乡的都去。

审判台设在河坝，人山人海，到十点钟时，公安和民兵就荷枪实弹把会场围了。审判长宣布，把破坏统购统销的反革命分子押上来。说完押了两个人上来。那时我就在那个台前，我一看，哟！其中一个不就是我的邻居周明山吗！为什么要公审他？公审就意味着要被枪毙呀。我那时才14岁，还想不明白。

审判长宣读周明山的罪行是：破坏统购统销政策，属于现行反革命，宣判死刑，立即执行。周明山马上就被拖到河坝。我跟着跑去看。

周明山跪在地上，一枪把他头打烂了。他的尸体没人收，他母亲和两个孙孙，几十里路，怎么去收嘛。



周明山遇难地

周明山死后他母亲天天哭，没多久也死了。周的女儿11岁，儿子7岁，只得出去讨饭。他们两姐弟睡在牛圈里面，只有一点谷草，我听见他们的哭声，好凄惨！后来好像是岑溪那边的一户人家来把姐姐接走了。弟弟一个人一直住在牛棚，十七八岁了都还住在里面。

五，关押地主家属的“集中营”

这个毛泽东呀，他地主不放过，连家属子女都不放过，一个个非要整绝。

土改时，把我们父辈枪毙或关押后，又把我们地主家属，大多是妇女儿童，集中关押在一个叫田家院的地方，为什么要关我们呢？说是要保证土改顺利进行，防止地主阶级破坏，必须对我们严加管制。我们一共有七户地主家属被关在田家院吴龙文的院子里。地主吴龙文已经被枪毙了，他有十几间房子。

那个院子四周都是围墙，前面只有一个八字龙门进出，后面小门旁边住有一户姓孙的贫农，农会就安排他监视我们。

监管我们的是个女人，一个土改的积极分子，她当了个妇女组长。这个人心肠很硬，“阶级觉悟”很高，一见到我们这种出身不好的人，她就板着面孔，一脸凶相。我背地里叫她“母夜叉”。

“母夜叉”掌管八字龙门的钥匙，我们外出必须向她请假。

“集中营”每天开门两个小时，早上七点到九点。这两个小时放我们出去打水、捡柴、摘菜、挖野菜。那时我们什么吃的都没有，全靠这两个小时找吃的。我们七家人，每天主要就靠吃青菜和野菜度日。我讲讲在“集中营”里发生的几件事。

（一），吴文若一家的不幸

我有个表哥叫吴文若，黄埔军校毕业后分到一个部队当见习连长，抗战爆发后，他在武汉保卫战中身负重伤，伤愈后回到石耶。土改时，他家划为地主成分，

加上他又曾是国民党军官，因此他在1950年10月被判刑20年，送到四川阿坝劳改。

他被抓走后，他家有六口人被关到“集中营”：他母亲、妻子和四个孩子。她妻子叫杨淑华，她高度近视，无法去挖野菜，只能叫她13岁的大女儿吴蒲柳去挖。他家六口人，每天吃青菜、野菜至少要一背筐。吴蒲柳开始每天还能摘半背筐菜，后来她身体越来越差，目光呆滞，面色菜黄，走几步就要停下来休息。

那个冬天，好容易出了太阳，“集中营”的人都出来晒太阳。太阳一晒，身上的虱子满身窜，大家便相互捉虱子。这时，蒲柳站起来说要去解大便，她刚走了几步，就蹲下去拉了一地稀粪。她妈赶快去扶她，可她身子直往下坠，她嘴里发出很微弱的声音：“妈，饿，饿得很……”不一会她就断气了。

杨淑华大哭，说：“我不该生下你呀，你投错了胎……”

大家叫我去向“母夜叉”报告。因大门锁着，我去找后门的老孙。老孙这人还有良心，听说后很同情，与我一起去找她。“母夜叉”听说后把双眼一瞪，张口就骂：“死一个人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你们这些地主死光了都没关系！”老孙说：“人死了总得抬出去埋，不能放在那儿烂呀。”“母夜叉”这才说：“就叫那些地主去埋，你要好好监督他们，防止他们搞破坏。”老孙又说：“到哪儿去拆几块板板，钉个匣子？”“母夜叉”说：“她还要匣子？就这样拖出去埋！”

在返回的路上，老孙忍不住说：“太过分了！”

回到“集中营”，老孙叫表嫂找床烂席子把女儿裹了，由“集中营”里凡是还能走的人帮忙抬出去。大家都没力气抬到山坡上，于是就在河边挖了个沙坑，把蒲柳草草埋葬了。

蒲柳死后不久，表嫂的婆婆和儿子也饿死了，他们一家六口只活出来三个。

（二），陈淑清一家的遭遇

吴肇修是我的堂姐夫，我们关在集中营时他和他儿子吴光瑶都被抓走关押。他家关在“集中营”里有六口人：我堂姐、她的婆婆和她的媳妇陈淑清。

在进“集中营”之前，堂姐就已经遍体鳞伤，她遭受了吊打“半边猪”、跪玻璃渣、跪铁梁角刺等刑罚，在“集中营”里她已经行动困难。她的婆婆年已八十，堂姐的媳妇陈淑清下面有三个小孩，老大吴世和六岁，大女儿吴世林四岁，小女儿吴世奇两岁。这六口之家的全部生活担子都压在陈淑清身上。

陈淑清是秀山美萃乡陈家大院的人，出身名门闺秀，17岁时在秀山女子中学毕业。毕业后她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了家，到22岁时，她已经为吴家生了一子二女。可惜，她的丈夫是个纨绔子弟，常在外面拈花惹草，陈淑清按中国

传统的逆来顺受的妇道忍受了，从没有大吵大闹。

在集中营里，她的负担太重了，上面是两个老人，下面是三个小孩，油盐柴米全无，她岳父（我们叫公爹）吴肇修当时又关在牢里，还要给他送饭，由她大儿世和每天给他送一碗青菜去。

一天，世和送饭时，吴肇修对他说：“你回去给你妈说，就是青菜嘛也多送一点，我饿得很呐。”世和回来说了后，陈淑青哭起来，她实在没办法了。我妈安慰她，说现在大家都一样，熬过这段日子就好了。

但是，陈淑清觉得她熬不过去了。

那天早上我从她门前过，突然听她房间里传来“嘿咻”、“嘿咻”的声音，就像杀猪杀了后喉咙里冒血泡子的声音。我跑上去一看，她倒在地上，身旁是把菜刀，脖子上一道伤口直往外冒血泡。我赶快叫我妈，我妈跑来把她抱到床上。没有药，大家束手无策。我突然想起，前段时间我在山上砍柴时，摘了几枝叫“毛蜡烛”的草药。我赶快拿来敷在她的伤口上，不一会血就止住了。我妈劝她说：“你上有老，下有小，你一死了他们怎么办，你要为他们着想呀。你要想开点，这种日子又不是你一个人这么过的。”

陈淑清躺着养伤的日子，这一家人就更惨了。我妈出了个主意，叫她的两个大孩子吴世和与吴世林借外出挖野菜的机会到街上餐馆里去要饭。

这果然是个好办法，他两兄妹第一天出去就很有收获。街上有店老板以前受过吴肇修的帮助，见他的孙子来讨饭，不仅悄悄给了米饭，还给了点肉。

那天这两兄妹笑得好开心，半年了，都没见他们笑过。我妈帮他们把饭和肉煮在一起。世和很懂事，叫我妈同他们一起吃。记得陈淑清接过儿子给她的饭后老是不吃，眼睛呆呆地盯在碗上，眼泪流下来。大家劝她，她还是不吃。吴世和说：“你不吃我们就不去讨饭了，大家一块饿死。”我妈妈也劝她，她最后才吃了半碗。

我当时小，不太明白，现在想起，一定是她内心难受，让自己的儿女出去讨饭。

陈淑清伤好后，又开始出去摘野菜，两个小孩继续讨饭，日子好一些了，关在牢房里的吴肇修也吃上了他孙子讨来的饭菜。

但是，吴肇修没能活出来。

这儿我讲讲吴肇修这个人。

吴家就在我家的隔壁，吴肇修是个很善良的人，我们秀山二中就是他出资修建的，那是是在抗战时。他认为日本敢打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的国家落后，要改变这种现状，就要大办教育，



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他招的老师都是从沦陷区里来的优秀教师。所以，那些年学校培养了很多优秀人才。他是一个为国家为民族着想的民主人士。

1949年9月7日，解放军打来，国民党县中队要烧石耶梅江河上的大桥，他出面阻止，说，烧了桥也拦不住解放军，只能给老百姓出行带来不便，那个桥是他保下的。

解放后，吴肇修最初作为民主人士，但后来还是把他抓了，把我家作为监牢，关了几十个人。

那天来通知，说吴肇修因剥削人民压迫人民，被人民政府枪毙了，叫陈淑清去收她公爹的尸。

去收尸的全是几个女人，有我母亲、我姐姐和他们的伯娘。几个女人用席子把他裹起，抬到现在水泥厂桥头那个叫乱葬岗的地方。乱葬岗是以前留下来的，凡是没得田土的人，包括过路的呀、叫花子呀都葬在这儿。吴家的土地都被没收了，只有埋葬在这儿。



石耶街上残存的标语

没两天，我出去时，看到一条狗拖了一条人腿，街上的人说，那就是吴肇修的腿。我当时很感叹：吴肇修呀，你生前做了那么多好事，怎么落得这个下场？

关了我们大约一年后，农会把我们放了。陈淑清一家被赶到全门沟的一个瓦窑去住。那个瓦窑四面透风，下雨天地上到处积水。不到一个月，我堂姐和她婆婆相继去世。埋了她们之后，陈淑清变得失魂落魄，走路分不清方向，像是痴呆了一样。

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让她彻底崩溃了。

那天，世和因为饥饿，偷了瓦匠沟当六地里的几个红苕。第二天沟当六找上门来，陈淑清连连赔不是，表示孩儿不懂事，一定赔偿。沟当六抓起世和就是几耳光，骂道：“狗日的地主崽，还想压迫我们贫农？！”

关键是他走时恶狠狠地丢下了一句话：“老子去叫农会的人来打死你们！”

这句话把陈淑清吓惨了，农会在土改中的暴行陈淑清太清楚，她觉得大祸要临头。

当天，她对世和和世林说：“妈饿得很，我们到街上去讨点吃的。”

她同两兄妹走出全门沟到了公路边，她对两兄妹说：“妈走不动了，就在这儿等你们。如果你们回来万一没看见妈，就自己回去煮饭。记着要让世奇吃饱，不要饿着她。你们两个要团结，要勤快，不要吵架……”

她目送儿女走了后，就转身朝岩门坎的河边走去，她在那儿投河自尽了，当时她还不到30岁。

又是我妈妈她们几个女人去埋的，打捞她尸体时我也在场。女人下不了河，是用竹杆把她捞上来的。

那时枪毙人多，乱葬岗已经没有地方了。埋她公爹的那个坑是空的，尸体不见了，于是她们就把她埋在她公爹的坑里。

陈淑清死后，她的三个孩子靠讨饭为生。一个七岁多的孩子要承担抚养两个妹妹的担子，这个奇观世界上可能难找。他们的衣服从来没洗过，一身长满虱子。没多久，三岁的妹妹吴世奇就病了。世和把她送到街上万寿宫我二伯家的偏房住下。那天我路过，看见她躺在几块木板上呻吟，身子骨瘦如柴，小被子上密密麻麻到处是虱子。

不几天，她就死了。

她死了是谁去埋？是她七岁多的哥哥！他把一根绳子套在他妹妹的脖子上，拖着妹妹往前移。拖到猪行坝那个地方时，正好遇到我，我帮他世奇拖到河坝，用手扒了个沙坑埋了他妹妹。

当时这一幕有人看见，但没人敢帮忙，因为要同地主阶级划清界限。

世和两兄妹不久被他们妈妈娘屋的人接走了。几年后大饥荒到来，也是地主家庭的陈家首当其冲，吴世和饿死，妹妹吴世林逃往贵州玉屏县，嫁给了一个农民，当时她才十三岁。你来我这儿的前三天，她来看我，谈起往事她痛哭流涕。

他们的父亲吴光瑶活出来了，他坐了十年牢，出狱后留在劳改队就业，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回来。那时我也回来了。

对了，吴家家破人亡，但他们的房子却保存下来，原因是他们的大院做了区政府的办公地，就是你前天去看到的那个地方。



现作为文物保护的吴家大院

（三），“母夜叉”的结局

我还说说集中营里那个“母夜叉”。

她正在得意洋洋收拾我们时，发生了一件事。一天早上，她的公爹路过我们“集中营”旁一口水井时，用手捧了几口水喝。有人看见了，说他在放毒，向

农会汇报后，农会又向区里汇报。区里土改工作团的王团长指示，把他抓起来。当天农会就把她公爹抓了，三天后他被拉到河坝枪毙了。母夜叉和她丈夫去收尸的时候，呼天抢地。

其实这完全是冤案，他哪里放什么毒？我们天天都喝那井里的水。但那时正是镇压反革命的火热时期，只要有人举报，不是事实也是事实。

这一下“母夜叉”成了反属（反革命家属），组长也被撤了。她的威风一下子消失，路上遇见人，头埋得低低的，说话声音也像要断气。这还没完，到“粮食关”（大饥荒）时，她老公和儿子都饿死，她只身逃到贵州江口县桃英区，嫁给了一个大她20多岁的老光棍。那个老光棍是个酒鬼，三天两头暴打她。后来我到江口路过那个寨子，在那儿住了一晚。我见到了她，才40多岁的人，头发已经花白，背也有些驼了。我问她还认识我不，她说不认识。我说我就是“集中营”里的那个胡祖暖。她说：“不记得了。”我说：“你不记得我记得！”

六，一个积善之家的“灭门”

我亲眼目睹这一家全部死绝，他们本是一个积善之家。

在石耶街旁梅江河边，有一家地主，主人叫鲁伯林。我家同鲁家是同一个村，离得很近。鲁家在当地做了不少善事，比如说，他家每年都要打十多二十口棺材，免费提供给那些贫寒人家，年年如此。

以前有种说法，“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但是，鲁家做那么多善事，是什么结果呢？

前面我说了，我从小胆子大，只要听说杀人，都要跑去看。那次在石耶粮站下面枪毙三个人，一个叫杨兴伯，一个叫杨欣然，一个叫鲁世义，这三个人都是地主。那一天我就站在审判台的前面，三个地主看得很清楚，他们被五花大绑，工作队的人鼓动一些人上台批斗揭发，呼的口号是“打倒地主阶级！”“打倒恶霸地主！”“劳动人民翻身作主！”

其中鲁世义最年轻，只有20多岁，他就是鲁伯林的大儿子。他被捆得受不了，大汗淋漓。他喊：“审判长，要杀要剐快一点！”

刑场在319国道旁边，打鲁世义时，枪没响，鲁世义还扭过头，喊：“水子子，水子子。”就是说是哑火。行刑的人



当年枪杀鲁世义的地方

重新换子弹，“砰”地一枪把他头打烂了，头骨和脑水洒了一地。

他的弟媳叫刘桂华，她丈夫鲁世法参军到秀山，在文工团里。刘桂华才20岁，她来收尸，穿的旗袍。她把鲁世法的头皮和脑水一点点收集起来，包在一张白帕子里，放到鲁世法的颈子边。我听她哭诉说：“哥哥呀，我们鲁家到底是做了哪些冤孽事嘛，遭到这种报应？”

没两天，就在鲁家对面的鸭子河坝枪毙人，这一天枪毙14个，我大伯、三伯、四伯就是这一天被枪毙的。我记得的有吴肇修、吴龙文、鲁庆全。另一个就是鲁世法的父亲鲁伯林。

那天仍然是把头打烂，又是刘桂华来收的尸。她把公公的头皮脑水收集起来，仍然哭诉说：“鲁家到底是什么回事嘛，人们都说你们净做好事……”

接下来把鲁伯林的老婆抓去逼要金银，她已经是个快六十岁的人了，吊打，尤其是跪“铁梁角”刺。农会会长田维忠和周发友（音）把她婆婆衣服裤子脱了，强迫她在“铁梁角”刺上滚。更恶劣的是，他们还把她提起来像打夯那样往刺上扔，她婆婆痛得呼天喊地。（胡讲述至此时抽泣）



还有一个叫“矮子黄”的女人，是地主孙老六的老婆，孙老六被枪毙后，农会的人把他老婆抓去，脱光衣服后扔在一堆铁梁角刺上，还拿脚去踩她。她没死，后来她在东北的女儿来把她接走了，从此她再没回来。



（注：“铁梁角”是当地一种有生一寸左右长硬刺的植物）

这儿又说到那个农会会长田维忠，他溜到刘桂华家里，想强奸她。刘桂华不从，田维忠用枪抵着她的头说：“老子今天来日你，是看得起你！你他妈的还不干？你不干老子一枪把你毙了！”刘桂华没办法，被田维忠强奸了。

第二年，刘桂华的丈夫鲁世法被部队清洗回乡，原因很简单，地主子女。他回来后还是管制劳动，每次开会都要把他弄来批斗。我在《难忘的岁月》里记了他的一件事，有一次薅红苕，他挖断了几根，说他是有意破坏，抓去就是一阵斗打，唉呀，那个日子！

到了大饥荒时，有一天，在食堂吃饭（我们在同一个食堂），他们一家饿得床都起不了，他支一根棍子，来食堂想打点吃的，其实那个饭就是几片红苕加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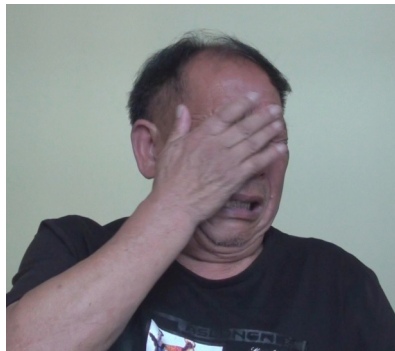
干了喂牛的红苕叶。大队长杨通明（音）骂他：“你这几天为什么不出工？打饭你就来了！”他说：“队长，我这几天是病了，路都走不动。你松我一下，我妈、儿子都躺在床上，你松我一口气。”杨通明说：

“你还想讨吃？你狗日的四类分子！滚！”

当时我在场，我看到他支着棍子，很艰难的一步一步地往回走。

（胡讲述至止，失声痛哭）

接下来的几天，我没有再看到他。那天我从他家门口过，他门是关着的，我推了一下，从门缝里望进去，看见他母亲、妻子和娃儿躺在床上，他是躺在一个柜子上。



胡祖暖失声痛哭

我去找队长杨通明，他听说后说：“饿死几个人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何况是几个地主！”他把我骂一通，我当时怒火一下子冲起来，恨不冲上去几刀把他杀了！但是我忍了，我也有母亲和妹妹。

去埋他们一家时，我也去了，就埋在河坝边。我看见鲁世法的耳朵，还有他母亲的嘴唇，都被老鼠咬了，这一家死绝了。

我们用河沙掩埋的。不久涨大水，全部冲走。

地主鲁柏林全家灭门

- 1, 鲁柏林（土改时枪杀于石耶余庆村鸭子河坝）
- 2, 鲁世义（鲁柏林大儿，土改时枪杀于石耶粮库下面公路旁）
- 3, 鲁柏林之妻（1960年饿死）
- 4, 鲁世法（鲁柏林二儿，1960年饿死）
- 5, 刘桂华（鲁柏林二儿媳，1960年饿死）
- 6, 鲁世法之子（1960年与祖母、父母饿死于家中）



当年杀人的刑场，鸭子河畔



被灭门的鲁家残屋

七，鲁家大院的故事



这个四合院位于秀山县石耶镇，以前是地主鲁晋权的住宅，它经历六十多年的风雨，居然幸存了下来，虽然大院的一些厢房和粮仓已经消失，但与绝大多数尸骨不存的地主大院相比，它算是长命的。胡祖暖老人当年经常进出这个大院，他专门带我到此，讲了下面两个故事。

（一），斗打 11 岁的地主子女

鲁家大院的主人叫鲁晋权，他同我是老表，他岁数比我大，但与我同辈份，鲁家也是从江西来的，解放前，我们两家经常走动。

1951年，鲁晋权被枪毙，家里财产全部被没收，他老婆上了吊，留下四个儿女。鲁泽黄是老大，11岁，他下面还有三个妹妹。父母死了，财产被没收，几个娃娃没有吃的，饿得受不了。他一个伯娘就说：“泽黄，现在你们只有救一个算一个了，两个小的让她们饿死算了，保两个大的。”果然，后来两个小的饿死了，就饿死在这个房子里。



接着，农会把泽黄和他大妹妹赶出大院，赶到山上一个叫滚猪岩的茅草棚去住。有一次我上山打柴，无意中看到他们兄妹，我说：“你们怎么住到这儿？”泽黄说，住这儿倒没关系，害怕是每天晚上农会要叫他到鲁家大院去接受批斗，还要挨打。他虽然比我小一辈，但与我同年，土改时都是11岁。这样一直斗打他一个多月。

这时，又是他家的那个伯娘对他说：“你赶快带你妹妹出去逃荒，否则你两个都要死在这儿。”泽黄于是带着妹妹往贵州逃，逃到松桃县大路乡时，兄妹两被一个老汉收养。他隐瞒了自己的成分，那家人一直不知道他是地主子女，对他和妹妹还不错。他和妹妹后来都在那儿结婚生子，从此一辈子留在那儿了。2010

年他回来参加族里一位晚辈的婚礼，我们又见了面，他说起当年的往事，仍然非常痛苦。

（二），张洪富一家的遭遇

张洪富住在离我家两里路外一个叫蔡家沟的村子里，抗战时他参军打过日本鬼子，在部队上当了排长。抗战结束后他回到家乡，娶了鲁氏的女儿鲁泽英。

张洪富家不是地主，也不是富农，土改本来整不到他头上。但是，由于他曾经是国民党军队的排长，就给他划了一个兵痞成分，抓起来判了几年徒刑。在他被抓的当天，他妻子和儿子张宝也被抓来，关进了这个鲁家大院的粮仓。

农会把鲁泽英母子关在这个仓房里，锁上门就走了。这一走他们就把这事忘记了。半个月后，有人从这儿路过，闻到一股很浓的臭气，开始以为是死老鼠，后来觉得不对，打开仓门一看，鲁泽英和她儿子张宝已经饿死，身上已经生蛆了，母子俩还抱着。当时鲁泽英还不到30岁，儿子才几岁。



他们就饿死在这个大院的粮仓里

八，土改之后的不幸

土改结束，地富和其家属们的苦难并没有结束，我自己的遭遇就不说了，那已经写在我的两本书中，我讲两个别人的故事。

（一），一棵杉木和一棵梨树

为下面这件事我走访了好几个人，都是这样说的。

石耶公社宝塔大队有个姓邱的贫农社员，家很穷，吃盐都困难，因此，他有时便去砍集体的林木来卖。那天，他又砍了一棵杉树，树直径大约有5寸，当时市场价可卖2元。第二天他去卖时，走到现在石耶检查站那个地方被公社干部查到了，说他盗窃集体财产。问他是什么成分，他说是贫农。公社干部听说是贫农，就只把杉木没收了，没有抓人。但是，好像不整点什么又说不过去，于是问他树是哪个砍的，他说是他自己砍的。又问他，有没有人看见，他说有个人看见，叫张鹏程。干部又问张鹏程是什么成分，邱社员说他是富农。

富农！这下就有戏了。

这个公社干部，他姓王，一心想抓点阶级斗争。他当天就到宝塔队去开会。他先召集队长和积极分子开了个小会，然后开大会。他说：“你们中有地富分子，支持贫下中农破坏集体经济，是谁？”队长按事先的安排说：“是张鹏程！”王干部说：“把他抓出来！”

张鹏程被抓来批斗，他觉得很冤枉，说：“我只看到有个人扛一根棒棒，我不晓得他是干啥。”但不由他分说，王干部认定他这个四类分子在背后使坏，破坏集体经济。

会场上有个积极分子揭发说：“张鹏程还把队里的一棵梨树苗挖来栽在他屋前的院坝上。”

张鹏程说那是他在山上挖的一棵树苗。王干部说，山也是集体的，挖树苗就是盗窃集体经济。王干部认为不仅要算政治账还要算经济账，于是他问：“树大概要几年挂果？”

下面回答：“三年就可以挂果了。”

“树的寿命有好多年？”

“大约五十年。”

“一年收得到多少果子？”

“平均两百斤。”

“现在梨子多少钱一斤？”

“一般两角钱一斤。”

“五十年那就是两千元钱。”

于是，王干部要张鹏程照此退赔。张鹏程说，他没钱，他去把树苗挖出来栽回去。

“那不行，你挖都挖了，就像杀人，人杀了还得回去？”

这时有一个人说，他猪圈里还有一头猪，有两百多斤。张鹏程一听大惊，哀求说，那条猪他喂了一年多，油盐钱都要靠它。

但是，他的猪还是被强行拖走了。

（二），死，也要吃顿饱饭

吴肇修的二哥叫吴正夫，他被抓去劳改，幸亏抓走了，晚一个月就会被枪毙。但是他还是没能活出来，大饥荒时，劳改人员大量饿死，他也饿死了。

吴正夫有几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叫吴永禄。吴永禄是个非常有才学的人，1949年时刚刚高中毕业。抗美援朝时他想参军，因为是地主子女，没要他，他

只好回乡种田。

大饥荒时，他的几个妹妹都外逃了，只有他留在家里。一个大雪天，他饿得受不了，出去在地里偷几个萝卜，结果被发现，民兵冲着他一阵暴打，把他打昏死过去。民兵以为他死了，就走了。

过了一阵，他醒过来，从雪地里爬回了家。他觉得这个日子没法再过下去，便想自杀。他老想起当时人们说的一句话：要死也要吃顿饱饭，不要做饿死鬼。这个话我当年也经常听到人说。

他家徒四壁，只有一床旧棉絮还值点钱，他就把这床棉絮抱到石耶街上，向一个姓杨的人换了一只鸭子。他回来把鸭炖了，吃得一干二净，连汤都喝完。

他用的什么绳子上吊？用的批斗他时捆他的那根绳子！民兵要他把那根绳子保存好，开斗争会时带上好捆他。



胡祖暖在吴家大院讲述

据说他死前还写了一首诗，但是我没有看到。我去他那儿玩时看到他经常写诗，都是古体诗，他很有才华，多年来，这个人的音容笑貌经常出现在我脑海里。

九，一家贫下中农的“灭门”

土改时我们村有一个叫白老全的人，他当了多年的民兵队长，因此我们一直叫他白队长。我书上写了他一家人的命运，有一两万字。

解放前，他们一家住在石耶一个叫猪行坝的地方，就是卖猪的地方。他父亲去世得早，母亲带着他们四弟兄。这四弟兄相当懒，全靠大哥“卖兵”过日子。“卖兵”就是有钱人家不愿意自己的儿子去当兵，出钱让他去。他每次收几十个大洋，去了之后，一般走到湖南，最多走到吉首，就找个机会溜回来，下次又这样干。这个钱来得容易，他这样干了十几年，但这点钱一家人过日子还是很难，几兄弟吃了就睡，懒得不成样，四兄弟都是光棍，住在茅草房里。

共产党来了，就需要这种穷人作土改积极分子和民兵。分胜利果实时他家分的是一等：田土是一块旱涝保收的田，房子是吴家大院的好房，而且很宽敞。白老全一家高兴得直喊：“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

最让他们兴奋的，是分的那一块良田，他们甚至晚上都要走到田坎上去看。他们一改懒惰，开始认真耕种这块田。1953年，丰收了，他们除了自己吃以外，还卖了余粮，并且有了钱给每个人做了一套衣服。白老全的妈兴奋得很，唯一的不足是四个儿子都没有媳妇。她四处托人做媒，结果很不顺。原因是他们一家的

懒惰是出了名的，而且几兄弟一个个长得一副猪相。因此，好事没干成。

第二年，1954年，他们的收成就差了，为啥？原因是分到良田的那股兴奋劲过了，根深蒂固的懒劲又上来了，比如，田里生草了也不去除。这一年他们不仅没什么余粮卖，自己吃都困难。后来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分来的土地又归公，他们的生活又困难了。

1958年，他家的小兄弟白老高到一个矿山去干活，他受不了苦，跑出来，结果被抓住作为流窜犯送去劳教，第二年就死在了劳改队。接下来是59年、60年大饥荒，白家真正的苦日子到来了。全家没饭吃，大儿、二儿先后饿死，他们妈饿得站不起，她说：“解放前住的茅草房，但日子还过得去，春节还有地主像吴肇修、胡家给我们送吃的，有肉、有米、有面条、有粑粑，现在连菜叶子都吃不上了，还不如旧社会。”

她是贫农，说这种话也没把她怎样，何况她很快也饿死了。

这样，他家只剩下老三白老全一个人，他为什么能活下来呢？因为他当民兵队长。当时送犯人到秀山都是他负责解押，他背一把大砍刀，人们怕他。公共食堂打饭时他因此要占些便宜，这样他才死里逃生。

但是，由于他的懒惰远近闻名，家里又一贫如洗（以前分的房子又被政府收回去作了区委的办公地），所以他也一直没能讨上媳妇。到文革时，他才找了一个残疾人——她的腿残得很利害。

第二年，他老婆生小孩，那天晚上，他懒得想自己操劳，去找队长帮他解决。队长说：“你老婆生娃儿关我卵事！”

他说了一番话，很精彩。他说：“咦，不关你的事？我是贫下中农，贫下中农就是要依靠党、依靠政府，你当队长的怎么不管？你晓得不：没有贫农就没有革命，若否定他们就是否定革命。这个话是毛主席说的。你不管，你就是否定毛主席！”

队长没办法，只好向公社反映，公社打电话，县里还来了一辆吉普车，把他老婆接到县里生了个儿子。

他后来很得意，说：“石耶有哪个生娃儿到县里去过了嘛？有哪个坐过吉普车？”三中全会后他又分了地，十年前他死了，今年他儿子又死了，都是村上埋的。

采访时间：2017年7月9日、10日、11日

地点：秀山县石耶温泉山庄

采访后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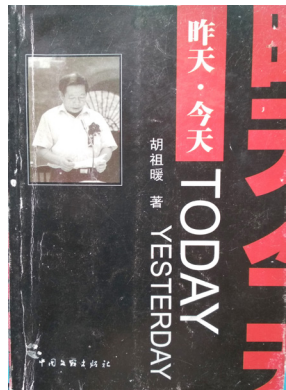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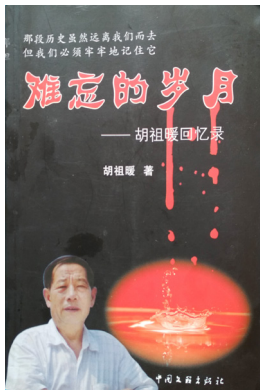
胡祖暖老人从朋友那儿看到关于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讲土改的报道，费了很大周折得到了我的电话。他非常热情地邀请我去他开发的温泉山庄，表示想同我好聊聊，他说他是地主子女，快80岁了，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事很多。

在这些年的采访中，极少有人愿意主动谈土改的事，地主子女更是心有余悸，胡祖暖是少有的几个例外之一。

为了让我了解他，他先寄来两本他写的书《难忘的岁月》和《昨天，今天》。这两本书我一口气读完，读得我长吁短叹，甚至潸然泪下。

这些年，我听到的悲苦和残暴够多了，对那个年代的荒唐和血腥更是了解深刻。但是，胡祖暖书中所记录的那一幕幕惊心动魄和回肠荡气仍然让我掩卷长叹。

作为地主子女，胡祖暖只读完了小学，但他却写出这般作品。我想，这除了他那九曲回肠的经历外，主要是他胡家注重教育的良好遗传基因使然。



我当即决定一放暑假就前去秀山，虽然土改的采访录我早已完成并已编排成书。

没想到，在订了火车票后的第三天，7月3日，我就接到学校解聘我的通知。我想，这主要是因为我在6月加入了因土改小说《软埋》引起的论战，在论战中披露了中共土改血腥暴力，进一步引起了当局和学校恼怒的原因。

由于我这一年多做的“违禁品”不少，解聘更引起了我的不安。第二天我便匆匆逃离，换了一个地方上火车。到秀山后，为了不让老人担心，我隐瞒了我已经被开除的事。

胡祖暖老人这一辈子虽然九死一生，牢狱之灾长达十九年，但仍然铁骨铮铮，敢怒敢骂，对共党极权毫无惧色。我心中大喜，便含蓄地对他说，我上月写文章惹了些事，现在可能不安全。说完我便观察他，如果他面露难色，我就提早离开。

没料到他大包大揽地说：“放心住在我这儿，你就是一个逃犯我都不怕！”

那一刻，我的感动难以言喻！

在看过了无数惊恐的面孔、经历了无数胆怯的回避、体会了无数明哲保身的精明，心里已充满了悲哀和绝望之后，我终于看到了一股浩然之气——一种独裁专制永远无法彻底摧毁的民族男儿正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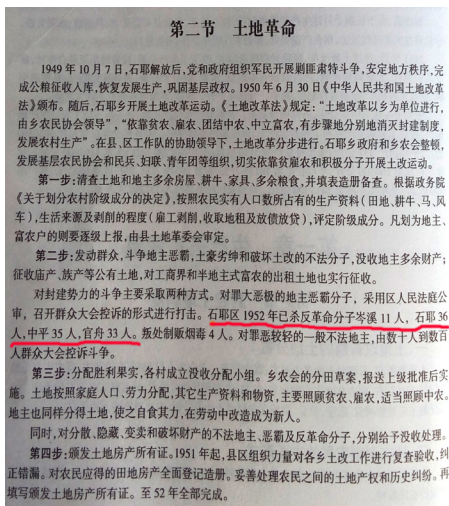
从那一刻起，我不再叫他“胡老师”，而称改为“胡大哥”。

注：2017年9月，我再次前往石耶，同胡祖暖老人一一走访了他当年流亡和劳改的地方，随后在美国制作成四集纪录片《难忘的岁月》

土改时石耶乡被杀人员名单

据秀山县石耶镇志记载，石耶镇土改时共枪毙36人。杨通思（土改时石耶乡余庆村农会干事）和胡祖暖共同回忆了这36人中32的名字：

- 1, 吴肇修（地主）；
- 2, 吴龙文（地主）；
- 胡传宗（地主）；
- 4, 胡光爵（地主）；
- 5, 胡光伦（地主）；
- 6, 胡光楣（地主）；
- 7, 胡署东（地主）；
- 8, 鲁晋权（地主）；
- 9, 鲁映辉（地主）；
- 10, 鲁柏林（地主）；
- 11, 鲁世义（地主子女，学生）；
- 12, 敖海门（地主）；
- 13, 敖朗然（地主）；
- 14, 敖传禄（旧军官）
- 15, 孙志禄（地主）；
- 16, 张裕龙（反革命）；
- 17, 陈进国（旧军官）；
- 18, 田家乐（保长）；
- 19, 王仲清（说他投毒）；
- 20, 田岩保（说他投毒）；
- 21, 杨友琴（地主）；
- 22, 杨欣然（地主）；
- 23, 杨继川（地主）；
- 24, 杨登云（保长）；
- 25, 杨举柏（旧军官）；
- 26, 刘武祥（地主）；
- 27, 刘启良（地主）；
- 28, 杨云（保长）；
- 29, 黄存孝（旧军官）；
- 30, 陈国芝（说他投毒）；
- 31, 辛跃廷（说他投毒）；
- 32, 吴可达（地主之子，说他为国民党收税）；
- 33, 吴可达之父吴XX（地主）；
- 34, XXX；
- 35, XXX；
- 36, XXX



石耶镇志第86页记载的杀人数



石耶镇

也把我家关进“集中营”

讲述人：鲁泽庆
1936年生



那天我赶到中寨是因为妈叫我去最后看一眼舅舅，结果那天没有杀我舅，因为他只是吃鸦片，后来把他放了。

除了那天我看到杀的那 13 个人外，其他我晓得被杀了的有陈国之、鲁泽乡和杨习候。陈国之本是农会的人，土改时他很得意，又六亲不认，结果别人整他，说他在河里投毒，是反革命。他不承认，被整得惨，后来把他抓来枪毙了。鲁泽乡（音）是个保长，他被吓倒了，往湖南跑，才跑到中寨坳，就被哨卡拦住，他没有路条，问他是哪儿的，旁边有认识的人说，是我们那儿的逃犯。就这一句话，就把他捆绑起来往秀山送。送到秀山，马上就地枪决。杨习候是我大嫂的公公，他是中平乡的大地主，他是在杀了那 13 个人之后才杀的。

土改时农会把我们鲁氏家族全部评成地主。我伯伯家有个女儿嫁到外地，她好多年没过来了，那天她来了，对我说：“你去打听一下，看我到底是什么成分，如果是破产地主，我就好作打算，我硬是没得法了。他们一开会就要我砍柴给他们送去，我一个女人，没得法，只有自杀了。”

我去找农会文书杨素珍，问她我们到底是什么成分。她对我说，农会已经把我们那一族人全部划成了地主，他们拿上去批，还有几家没有批，其中就有我家、我伯伯家和鲁泽君家。

后来，鲁氏家族里就只有我们这几家没划成地主。上面把我家改为“小土地出租”。但是，我家的财产全部被没收了，收缴得一干二净！一丁点都不留！我们家养了十几箱蜜蜂，农会的人用烟熏走蜜蜂，然后把蜂蜜拿走了。

我们没挨斗，房子也没被收缴，但是，仍然把我们同地主一样看待，比如，后来国家招工就不要我去。那些日子，晚上农会经常来敲门，砰砰砰！“开门开门！”农会的人闯进来，四处搜查，说是要搜坏人，哪儿有什么坏人？！我

吓得发抖，根本睡不着觉。

还有，土改期间，男人大多被抓走了，判刑的判刑，枪毙的枪毙，地主家属们就被集中关押在一起。我家没评成地主，但也被关进去，那里面地主娃娃很多。

“集中营”每天早上7点开门放人出去打水和摘菜，上午9点就关门。以前河对岸有很多大树，他们砍来烧了，我父亲在那儿挖荒，种了些菜，那个菜长得很好，有人这么高，关押期间我们就吃那个青菜，也没得油盐。

关押的那大半年时间，很悲惨，没吃的，真的是“昼无筐鸡之米，夜无鼠耗之粮”，每家树皮草根都吃。我们关在一起的有个三岁的女孩，是地主鲁符文的女儿，鲁符文被抓去劳改了。那天，她趴在门坎边，连“饿”字都说不清楚了。她叫：“妈呀，我罗（饿）得很呀。”说着她往右边一倒，就在门坎边，她爬起来，要倒要倒的。“妈呀，我罗（饿）得很呀。”又往左边一倒。倒下后她叫了几声就死了。

在关押期间我家靠吃青菜没饿死，但是，几年后，1959年，我父母（鲁佩久和杨胜英）双双饿死了。

在“集中营”，还有件事我也忘不了。

有天早上，我妈叫我和哥哥出去摘菜，我们在挖地时被鲁世刚看到了。鲁世刚是我们鲁氏家族的人，比我长一辈，我叫他叔叔。那时他是儿童团长，成天扛个棒棒，上面系条红布，雄哟，志气昂扬的哟。他说我两弟兄是去埋金银，我们说：“你去看嘛，有没有？”鲁世刚不由分说，在地上划个圈圈，强迫我们立正站在圈子里，不准越线。我们顶着太阳，在圈圈里面站了一整天。晚上他又把我们关在庙子里，我们两兄弟在地上睡了一夜，第二天才放出来，现在80岁以上的人都知道这件事。

鲁世刚他也遭了报应——也划成了地主。怎么回事呢？他有个舅娘，划成地主后所有财产全部被收缴，全家还被赶出门。她来求鲁世刚，希望送她几个碗，一点衣服和铺盖。鲁世刚当时正在炸油粑粑，他不仅不给，还指着她脸骂，叫她滚。他舅娘走到桥上，坐在那儿哭。

哭没用，她要报复。

鲁世刚家的二妈（他父亲的小老婆）有40挑田隐藏在她的村里，她把这事揭发了。于是那边来个条子，说他家是漏划地主，这一下，鲁世刚也就成了地主。一当地主，他立马被扫地出门，全家被赶到桂阴沟那个深山老林里去住了。

采访时间：2017年7月6日

地 点：秀山县石耶镇青龙村半边街

采访后记

石耶镇当年有一个著名的半边街，街沿河而建，一条秀美的小河从街边流过。当年，这儿的人们开作坊、做买卖、销桐油，搞运输，生意红红火火。

有钱了，自然就要买田地，于是，这条街上的地主最多。

土改来了，半边街上的众多地主们首当其冲，抓的抓、关的关、杀的杀。一条红火的商业街在“关、管、杀”的“红火”和“分胜利果实”的狂热中暗淡下去了。

一位叫鲁世连的老人带着我沿街走去，他边走边讲：这儿原来是个热闹的码头、那儿以前是一个繁华的大院……河对岸以前有一排排参天的大树，风景很美……



街沿河而建



鲁世连边走边讲

最后，他把我带到鲁泽庆的家。“他知道一些土改的事。”他说。

半边街现在已经很冷清，当年的地主们早已被扫地出门，他们的宅院没被毁的也破败不堪。81岁的鲁泽庆老人是少有的还住在这儿的鲁家人。他之所以还能与半边街共命运，是因为他家没划成地主，“小土地出租”这个成分等级让他家保住了房子，使他没像他的一族人那样流落他乡。



半边街残存的地主大院风火墙

从儿童团大队长 到地主子女

讲述人：鲁世刚
1932年生



土改时，我家最初的成分是贫农，田土都分了，“果实”也分了好几次。

我那时是儿童团大队长，陈文映（音）是儿童团长，他已经过世了。那时，土改团的袁同志和陈同志最喜欢我，因为我工作积极。我们村儿童团有几十个人，唱歌跳舞，骑“高脚马”（土家、苗寨的民间体育活动），跳舞主要是扭秧歌，我们还到梅江去跳过。另外就是站岗放哨、查路条。那时走路任何人都要有路条才放行，没路条的不准走。路条由农会开。有一个村长，没路条，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他说：“我是村长，没路条怎么样？”我们硬是把他抓来关了一天，儿童团也有权哟，虽然我们没有刀枪，只有一根棍棒。

我们也要参加斗地主，开会都是在黄家大屋。我们鲁家的地主多，被斗的都是我们鲁氏家族的人，我不能不去，我是儿童团领导呀。斗争会上，我们要呼口号：“打倒地主！”不过，我从没有吊过人打过人，我只看到吊起打哟，那打得惨，那些武装队的人，抓到什么就用什么打，棒棒呀，扁担呀，那打得惨。

杀人我们儿童团也要去，在台下呼口号，如：“打倒反革命！”“执行枪决！”有一次杀人我记得很清楚，那天太阳很大，区长何习禄（音）坐在台上，（地主）鲁世义在台上挣扎，何习禄把手一招，就把鲁世义拖去枪毙了。接着把杨吉云（音）抓来批斗，他好像是个甲长。几个老妈子上台，说他强奸了她女儿哟、还强奸了她媳妇哟。只说了几句话，何习禄又把手一招，杨吉云就被拖去打了。打了后还用刺刀杀了他好多刀，我走拢去看了的。

可是没多久，我家居然被补划为地主！为什么呢？我们有一家姓黄的亲戚（远房舅娘），揭发说我家在他们那个村里还有黑田（隐瞒的田），我们隐藏不报。这一下就把我家评成了地主！我根本不晓得我家在那儿有田。我只晓得我家五口人，共21挑半田。

这样我们就当了地主，也被吊、被跪、被打。还有，这顶地主帽子，让我们

三兄弟都讨不到老婆，所以，我们三兄弟都是单身汉。

采访时间：2017年7月7日

地点：秀山石耶镇青龙村

采访后记

在石耶当年著名的半边街采访时，偶然听说了鲁世刚是土改时的儿童团长（后来落实是大队长），还听说他当年“大义灭亲”，毫不留情地关、管他们鲁家的地主和其子女。

我当即赶到青龙村。

鲁世刚是孤寡老人，长期独自居住在一间破烂漏雨的木板房里。我到来之前，村上刚出钱给他把破烂维修了一下，使它看上去不再像“万恶的旧社会”。



刚维修了的木板房

土改时鲁世刚已经19岁，又当了儿童团大队长（本来可以当民兵了，不知为何入儿童团），他应当是亲身经历和亲眼目睹了不少土改真相。还有，土改工作队的人喜欢他“工作积极”应当是有“积极”的内容的。可惜，他说他记忆不好，记不得了。但是，他对他家只有21挑半田却记得很清楚，甚至这21挑半分别位于哪个地方，每个地方是多少他都记得一清二楚。

整个采访期间鲁世刚都愁眉不展，看得出，这辈子他过得苦闷压抑兼穷愁潦倒。他好几次自言自语地说：“居然把我家评为地主！”“居然把我家评为地主！”

显然，这是他一辈子耿耿于怀的心结。

想来也是，土改如此积极批斗地主，甚至不惜大义灭亲，但主子居然翻脸不认人，“大义灭情”地把他家评成了地主。而这一顶地主帽子，让他们鲁家三兄弟全部成了孤寡老人（其中大哥已经去世，弟弟在养老院），使得他家的香火无以为继了。



愁眉不展的鲁世刚

可能，鲁世刚这一辈子最辉煌、最幸福、最激情燃烧、最被人喜欢的日子，就是土改时当儿童团大队长的那一段“工作积极”的岁月。

只是，他那一段“大义灭亲”的激情燃烧，让他鲁家的亲友们恨怨至今。

三哥的“狠毒” 害了我一生

讲述人：鲁世纯
1943年生



我父亲在1948年就死了，他娶过三个老婆，土改时大妈、二妈也死了，我二妈姓刘，是吴家沟的人。我是小妈生的。

1949年时我家已经破产了，原因是我父亲吃鸦片败了家，因此，土改时我家被评为贫农，还分了胜利果实。

复查时我家突然被评为地主是因为一件事。

我二舅娘家被评为地主后，所有东西都没收完了，她到我家来，想我们帮她一把。我三哥（鲁世刚）当时是土改儿童团大队长。她来时，我们正在炸油粑粑。三哥冲着她一阵骂：“你这个地主婆！我家是贫农，你不要来害我们，赶快滚！”

二舅娘什么都没要到反而还挨一顿骂，我三哥太狠毒了。二舅娘只得走了。

当年我二妈嫁给我父亲时有几十挑私房田，作为陪嫁。田在她娘家那边，每年请人种，谷子卖了后把钱交给我二妈，那就是她的私房钱。二妈死后我们根本就不清楚那个田是怎么回事。

二舅娘挨了我三哥的骂后，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她就揭发，说我家还有几十挑田隐藏不报，这几十挑田就是我二妈当年的那个私房田。于是，那边农会打了个条子来，这一下就把我家划成地主。

一划为地主，我们马上就被赶到山沟一个茅草棚去住。

完了！成了地主，这一辈子就完了！我小学时成绩很好，当时第一名在榜上是坐飞机，第二名是坐火车。我每学期都是坐飞机。我读三册班时因为成绩好，准备把我提到五册班，跳两班，这时我家从贫农变为地主，我们被赶到那个山沟的茅草棚去，再也读不了书了。

书读不成，后来婚也结不成。

我们生产队有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小名叫玉唐（音），她爱上我，我们悄悄好了，她还怀了我的娃娃。她家人发现后，不仅坚决不准我们好，而且还要整我。

我是地主子女，她家是贫农。我害怕，赶快逃走了。

我在外面流亡了十多年，在贵州做砖瓦。毛泽东死后华国锋上台，抓纲治国，全国大戒严，我被抓了押送回来。我是这样才回到家乡的。

问：你逃走后玉唐姑娘怎样了？

鲁：她家里的人打她，逼她嫁人。她跑到河边投江，但是被捞了上来。她坐在河坝，坚决不回家，后来他们把我母亲叫去，是我母亲才把她劝回去的。当然后来她还是嫁人了，嫁到岑溪。嫁过去没几天，她怀上的那个娃娃就生下来了，是个儿子。但是，他是地主子女的骨血，不能让他成活，他们把他掐死了。

问：你后来没有再找对象了吗？

鲁：我曾经遇到一个叫潘学英的姑娘，我们相好了，她到我家（青龙村）来看我，住了几天。结果一个叫刘光强（音）的人跑到我家来，对她说：“你赶快走，不能呆在他家，他是地主！”这一下她不敢再来了。

问：三中全会后地主摘帽，这时你可以找老婆了呀。

鲁：我年龄比较大了，年轻的不愿找我，年龄大的我又不愿意。更主要的是我一贫如洗，连一间像样的房子都没有，心也冷了，算了，这辈子就单身了。

对了，玉唐她现在还在，我在街上还遇到过她，她看到我，很不好意思。

唉，没得办法，苦呀！

采访时间：2017年9月28日

地点：秀山县石耶镇养老院

采访后记

第二次到秀山石耶后，为了解更多的关于鲁世洋妻子的事，我到石耶养老院找到鲁世洋的堂兄鲁世纯。到后才发现，他就是上次我采访的那位土改积极分子、儿童团大队长鲁世刚的弟弟。他，和他一家人的命运，因他三哥鲁世刚土改时的大义灭亲而彻底改变。最显著的，就是他们几兄弟这辈子都没能讨上老婆，一辈子孤身。

我没问他是否恨他三哥，但他在讲述他三哥当年骂他二舅娘时，用了“狠毒”一词。

我想，这可能也不完全是他三哥的错，因为，土改本身就是狠毒，就需要狠毒，要培养狠毒，个体一旦投入其中，就必须狠毒。

杀千分之三

讲述人：刘济平
秀山交溪乡人，1946年生



我出生在交溪一个很偏僻的土家山寨。交溪四面都是山，有一条小河从寨子中间流过，小河北边属于贵州，南边属于四川，那是一个极其封闭的山寨。

土改时我家划成地主，当时我才6岁，很多事都是听家人讲的。

我祖父是清朝最后一届科举考试的秀才，叫刘炳乾。他爱好书法和诗词，可惜都没流传下来，我只知道在清溪上面那个小河桥上题有他的一幅对子：“跨河可达黔三元，策马随歌蜀道难。”祖父一边教书，一边行医。他为什么还行医呢？因为他目睹他母亲病死。那个年代的人很讲孝。他说，我读那么多书但对妈妈的病一无所知，所以他又学医。祖父在1936年去世了，他的儿子刘克雄，也就是我父亲，曾跟着祖父读书，但他的功底不及我祖父，因此只能在贫穷落后的乡下教书。

土改时据说我家里有93挑田。我听说，这份家业是我祖父的祖父挣下的。当年他一边挑盐，一边开荒，一点一滴挣下了这份家产。

大约在1948年，我在秀山读书的大哥刘少雄得到消息，说共产党来了后要分田分地，他叫我爹把田卖了。我爹说：“你乱说！这个田要是买来的，可以卖，但它是祖上一点点开荒开来的，我要是守不住业那是不忠不孝。”还有，我爹觉得，今后我们两兄弟分家，要分田产，田卖了怎么办？我大哥说，他今后出去教书，不要田产。但我爹还是舍不得卖。

土改一来，惊天动地，父亲吓坏了。在我们那个偏僻山乡，家里有93挑田，而且还请得有长工，那是天经地义的地主了。

好像当时讲剥削有三种：地租剥削、雇工剥削、债利剥削。家里放没放债我不晓得，但我们雇了一个长工，他是个单身汉，家里有很多事都由他打点。父亲虽然是地主，但他一生主要是教书，也没得任何血债。可是，他看到土改那个阵式，看到好多他知道的地主都被杀了，他知道自己活不出来，为了保一个全尸，他上吊自杀了，那年他49岁。

我对爹的印象已经不深了，但他死前对我说的话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年我6岁，还不时吃我妈的奶——吃着玩。那天他对我说：“你不要再吃你妈的奶了，从现在起，已经没有我了。”我当时觉得很奇怪，你不是在同我说话吗？怎么没有你了呢？

当天，他就上了吊。

爹死后我妈被抓到村上去逼要金银。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一个人们叫他“龙同志”的人把我抱起，当时我觉得莫大的安慰，龙同志不仅不打我，还抱我。他抱着我问：“你看到你爹曾经背了一个背篋出去了是不是？”我说：“是。”“从后面出去的是不是？”“是。”他又问：“你三姐抗了把锄头出去是不是？”我说：“是。”他又问：“他们是不是挖了坑把背篋里的东西埋在里面了？”我说：“是。”我其实什么都不晓得，他诱导我，我都说“是”。

于是，第二天就去挖，问我，是不是这地方？我说“是”，挖不出来，又问是不是这个地方，我又说“是”，还是没挖出金银。这样，我妈被吊起来打，他们说：“你娃娃都说你把金银埋藏起来了。”同时，他们还把我三姐捆起吊打，打得一脸乌黑，还用火马草来抽打她身子，当时我三姐才十五岁。

那时，各个村互相交流打人的手法，你学我的经验，我又学你的刑罚，用各种花样来折磨地主。

注：刘济平没有详谈如何折磨他的母亲，他说，那些手段胡祖暖的书中有记录。我在胡祖暖的《昨天，今天》一书中查到了刘母在被逼金银时所遭受的刑罚：

- 一，“猴儿抱柱”——即本书中提到的“吃哑酒”；
- 二，“破头尖”——用一寸长的竹签从手指甲处打进去；
- 三，“苏秦背剑”；
- 四，“钓美人鱼”——将刘母的长发扭成一股绳，用绳索打结后悬吊梁上；
- 五，用火马草塞进刘母的下身，然后揉搓；
- 六，“坐木桶”——冬天里将刘母抬入木桶中用冷水浸泡。

（该书 80—81 页）

刘济平的母亲邹吉云没被折磨死，她于1960年大饥荒时饿死，终年50多岁。

刘：接下来我们被赶到一个茅草棚去住，我开始外出讨饭。我在外面讨饭，常常很晚都没回家，我才六岁，走不动了，又饿，就在外面睡了。有时我三姐来找我，找到后把我背回去。记得有一天晚上，月亮很明亮，我坐在一个石板上，

看着月亮从云里钻进钻出，不知不觉睡着了。我醒来时发现妈妈正抱着我，她怎么找到我的也不知道。我只记得她的眼泪滴在我身上，很烫。

那些年我们受的屈辱实在是一言难尽！比如有一次生产队一个民兵排长来我家挑粪，我说，由于漏水，粪坑里大多都是水，没多少粪了。他不听，挑起就走。结果当天晚上就把我叫去，说我在粪坑里掺水要罚款。他们不由我分辩，罚我6元钱。6元钱，那是我一年干到头的所有收入！

那些年，我们这种人的婚姻是很困难的，为了传宗接代，我找了个富农的女儿，她讲起她妈被吊头发，把头皮都撕掉了，共同的遭遇让我们走到了一起。

对了，我是地主子女中极少数读了初中的人。原因是，秀山在三年大饥荒年中所有的学校停办，初中不招生，1963年情况好转后才招生。全县招三个班共150人，由于当时生源不足，我也凭成绩考上了，据说，那150人中共有18个像我这种所谓出身不好的子弟。

初中毕业后我去考师范，一问出身，就不要我了。但后来我一步步走出了农村，最后还成了公务员。

我退休后被请去写县志、公安志、法院志等等，秀山的好多部门志都是我写的。写部门志就要查资料，我在公安局就看到一些绝密资料。还有一些枪毙现场的照片，比如枪毙杨卓之他们的照片我都看到的。公安局好几间屋的档案我全部翻看完，我



秀山县城（图片来自刘济平作品《走进秀山土家》）

是最有幸看到公安档案的人。公安局长曾开玩笑地说：“你今后要是出国，会受到重点‘保护’。”他的意思是我看到了太多的绝密资料，会因此受到监控。

想来也是，比如我看到一份绝密资料，是一份中央文件：必须要杀千分之三，要彻底摧毁国民党的社会基础。当时公安局的人说，这一条你就不要写了。还有，我看到一张表，上面列有枪毙多少人，自杀多少人。由于我父亲是自杀，所以我就关注自杀的名单，记得共有三百多人，但是上面没有看到我父亲的名字。枪毙了多少我就记不得了。

问：你接触到这么珍贵的资料，你都没把它记录下来？

刘：土改研究是禁区，我连说都不敢说。所以，这些年我一直搞民俗研究。

采访时间：2017年7月8日

地点：秀山县石耶镇

采访后记

刘先生是有觉悟、有认识也有很强表述力的文化人，作为地主后代，这样的人并不多。

我到秀山后，他专程来接我，并陪同我两天。他早在网上看到了关于我的介绍，知道我在作土改调查并为此受到监控，我认为，他仍然敢同我接触应当是心无恐惧了。

可惜，当面对摄像镜头时，他显得有些吞吞吐吐，甚至言不由衷。

我能理解，多年的恐惧是很难一下消除的。

这很正常，他能走到这一步，已经很不错了。

补记

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和土改运动同时进行，杀人也是同时进行。

毛泽东嫌杀人太少，一再指示各地要大杀几批，他还给一些地方下达具体的杀人指标。2月间，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杀人的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

如果当时全国人口按五亿五千万计算，千分之一就是五十五万人。

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在一份报告中说，共逮捕了262万人，其中杀了71万2千人，是全国人口的千分之1.31。

按照这个说法，中共“镇反”杀人的数量已经突破了定的指标。

刘济平在县公安局看到的文件是杀千分之三，我看到的一份资料是杀了超过千分之三。该资料是“贾启允及温江地委给川西区党委的报告”。贾启允当时是四川省温江地委书记，他在报告中写道：“（我区）擅自超出原规定杀人数字，全区十二个县，除彭县、灌县、崇庆、华阳四县外，其余八县杀人均达总人口千分之三，有的多至千分之四。”

这个数字还不包括自杀的，被折磨死的。

镇反和土改时究竟杀了多少人，眼下还看不到官方说法。民间学者们一般认为是两百多万。土改研究学者、《乡村社会的毁灭》一书的作者谢幼田认为，“杀人数目至少是五百余万人。”（详见该书“杀人比赛”一节，明镜出版，2010年）

我两个父亲， 同一天遇难

讲述人：吴家坤
1941年生



我是秀山溶溪乡人，我妈妈叫马玉珍，她年轻时长得很漂亮，人又能干。她16岁时被一个叫吴成汉的人用抢婚的方式抢去当了小老婆。但是，没多久，她还没有生育时，吴成汉就被土匪杀了。接下来，我妈又被一个叫吴甫仁的地主看上了，吴甫仁家是溶溪乡的首富，有几百挑田。吴甫仁就是我的生父。可是，吴甫仁的母亲坚决不同意他娶我妈作小老婆，我生父要讲孝，因此，他一直没有娶我妈，只划了几十挑田给我们母子作生活。

后来我妈妈嫁给了一个也是姓吴的人，也就是我的后父，叫吴承旦。这个人是个社会上的“滚笼子”（混混），还玩过枪。他一无所有，房子也卖了，所以后来划成分，他被划成贫农，我因此成了贫农的子女。

土改时我爸爸（后父）是农会的积极分子。那一天农会长、副农会长、村长，还有我爸爸等在街上开会，他们说，二村（紧邻的一个村）的农会干部把“胜利果实”（地主的财物）私分了，他们要去告。我爸爸是个“闹麻雀”，说话一向高吼高闹，他们觉得自己正大光明，也不怕，结果他们的话被人听见并告诉了二村的农会。二村的农会先下手为强，抢先去向区长江德田（音）汇报（江德田是南下的干部），他们诬告说我父亲他们在开反革命会。当时各地正在大杀地主、反革命。上面不分青红皂白，军管会的人马上把他们抓去秀山，几天之后就押回溶溪枪杀了。其中只有副农会长没被杀，他被判了管制。

记得那是1951年的4月份，天气都有点热了。当时我12岁，正在溶溪小学读四年级。公审大会的会场就设在我们学校礼堂前的坝子里，那天一共枪毙12个，我知道的有农会长易竹生（音）、村长王松茂、我爸爸，还有地主何勋臣。他们把我叫回家，怕我在现场哭闹。前些日子，我们有个姓龚的同学，他比我大两岁，枪毙他家人时，他一路哭闹到审判台上。

我回到家，同妈妈在灶台前伤伤心心地哭。下午才听到枪声，我是家里最大的，下面还有两个妹妹。我妈是小脚，我们找了两个人，用一架梯子把父亲的尸体抬回来，在河边把他埋了。

对了，那天还枪毙了我的生父吴甫仁，他是大地主，肯定跑不脱。所以，我的两个父亲同一天遇难。我生父的尸体是吴家去收埋的。



湖南省长沙县谭公乡农会没收地主房屋
选自“中南土地改革的伟大胜利”

父亲死后，我们三子妹就全靠我妈抚养。我妈这辈子命很苦，三个男人，三个男人都死于非命。但我妈很能干，她背个背篋出去做小生意，卖草鞋、落花生、瓜子，还酿甜酒卖。我们一家的全部担子都在妈身上。那时一听说妈病了，我就吓得哭，悄悄地哭，妈妈如果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几姊妹怎么办？

我没得到过父爱，生父我几乎没有任何印象，后父只有短短的几年，但是，我却成了反革命家属子女，同时，又把我认为是大地主吴甫仁的儿子，所以我身兼两重身份——反属子女和地主子女。我从小读书很行，但小学一毕业就不准我读书了。饥荒年时我妹妹吴晓容饿死，我跑到贵州当了个乡村教师活了下来。

改革开放后，我们当年被杀的几家人写了申诉书，要求平反。那一批被杀的12个人中，何地主的大儿子在台湾，他来秀山要求给他父亲平反，当时正同台湾搞统战，因此公安局接待了他。一查资料，公安局里根本没有那次杀人的档案记载。当年随随便便就杀了。公安局把我们找去，对我们说，这事起不得头（即不能着手平反），秀山错杀的人太多了。现在能做的只是不再把你们当反革命家属看待，你们也可以入党、子女可以读书，也可以工作。

几十年了，我们就得这么一个结果。

采访时间：2017年7月7日

地点：重庆秀山县石耶镇

打倒封建势力要凭良心！

讲述人：吴兴强

1937年生



我家是镇街上的人，妈妈做布生意，叔叔是个银匠，在镇上有个铺子，生意很好，因为对面是贵州少数民族（苗族），他们经常要打银饰。家里富裕了，有了钱，给我大哥找媳妇就想高攀，结果对方瞧不起我们，说：“嫁到他家？他家有什么？只是个银匠，田土都没有。”

那个年代人们觉得钱财放在口袋里看不见，看得见、实在的是田地。我家于是打算买田。那已经是1947年了，离“解放”（1949年）只有一年多。当时，正好大地主王志纯家破产，整个秀山就是王家田土多，他一下子就卖几百挑田（一挑田约产3-4百斤谷子）。我家一口气就买下了一百多挑田。买了田就要请人耕种，所以后来土改我家就算是“剥削”。

不过，在土改初期，我家评的是富裕中农，减租退押时只把我妈的布皮收走了，其他财产都没动。

土改时我读小学五年级，我参加了儿童团，当了个分队长。那时各个村都要组织儿童团。我们这儿是个古城，有三道城门，每个城门我们都派几个人去守，查路条，地主出门，走一步都要请假，还要“早请示，晚汇报”。地主的财产全部收缴光，最多给他留条烂棉絮。

解放军在我们这儿住了一个营，教我们唱歌、抓坏人。我们去抓来就交给他们。那时每天晚上都有会。斗地主整得最凶的还不是王志纯家，而是田坝子的王老焕（音）家，王老焕的老爸被抓来吊起打，滚“铁梁角”（一种长有一寸长硬刺的植物）。开会斗地主时也叫我们儿童团去打地主，农会的大人们说：“去去去，去打！”我们就用条子抽打地主，当时还觉得很好玩，现在想起来真是不像话。

枪毙人我们这儿多得很，杀得凶，可能杀了上百人，地主、土匪、投机倒把的、对社会不满的，都杀。自杀的也多，地主天天被斗打，遭不住了，就自杀。

卖给我们田地的王志纯、王志武两弟兄也都被枪毙了，是同一天，这是我亲眼目睹的。把王志纯押出来时，他吓瘫了，是拖出去的。他兄弟王志武却很硬气，把他押赴刑场时，他还边走边大喊：“打倒封建势力要凭良心！”

他这样叫喊是有原因的。他们王家在当地做了不少好事，如果说是扶贫，他家就扶了不少贫。我们这下面以前有个大会馆，那一年天干，收成不好，不少人无法生活。王家马上开仓送米，来一个人，就舀一碗或者半碗米。闻讯来的人太多，王家支撑不起，改为煮稀饭救济。还有，我们有一个邻居很穷，妈死了没钱埋，也是王家地主出钱帮他家安葬的。人家做了不少好事，所以他临死前大叫：“打倒封建势力要凭良心！”

土改复查时我家倒霉了。刚才说了，我家本来评的是富裕中农，但是，有人眼红我们那一百多挑田，为了把田拿走，就借复查把我家划成了地主——小地主。不划成地主田就拿不走，一划地主，马上就可以分我们的田了。



紧邻贵州的秀山雅江镇

土改时净用些啥都不懂的穷人，让他们当乡长、村长、队长，狗屁不通！这样国家怎么搞得好？我家只是个手艺人，做点生意，非常善良，从不害人整人，净做好事。可是，这个政权见一个好人就要把他搞死。对“右派”不就是这样吗？

我家划成地主后，我马上被儿童团开除了。后来的岁月，一开斗争会我们就跑不脱，同地主们站成一排，标明是坏人、是坏家伙。还有，戴了地主帽子，我小学毕业就不准升学了，参军也不行，说我们有阶级仇恨，那硬是六亲不认，我操他娘的！

采访时间：2017年7月9日

地点：秀山县雅江镇

土改后， 杨家唯一幸存者的遭遇

讲述人：胡祖暖
杨桂芬的表亲



采访前，杨桂芬因恐惧而“临阵脱逃”，不得不由她表叔胡祖暖代为讲述。

一，暴风骤雨，家破人亡

杨桂芬是我的表亲，土改后我们分离了几十年，前些年我们重逢，她向我讲了和她一家的经历，从头到尾她都在哭。

杨桂芬是地主杨欣然的二女儿，土改（1951年）时7岁，她姐姐杨梅秋10岁，下面还有个妹妹杨艳芬2岁。杨欣然同他的两个兄弟杨友琴、杨举柏在土改时都被枪毙了。

杨欣然被枪毙后的第三天，他父亲跳河自杀，母亲不久上了吊。

那些农会的干部民兵们便冲着杨欣然的妻子洪老四下手。

杨家的老屋在我们余庆村对面的西达（音）村，土改之前，杨家已经搬到石耶街上来住。西达村斗打地主比我们村还要残酷，追逼金银用了各种刑罚。桂芬记得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民兵把她妈妈抓去，吊在梁上打“半边猪”，把她打得昏死过去。第二天晚上斗打两个地主老婆，除她妈外，还有地主黄祝山的老婆。民兵们将两个女人脱得只剩下一条短裤衩，然后把她们压跪在地上的碎碗渣与铁梁角刺上，压下去提起来又压……第三天下大雪，两个女人又被抓去受刑，这次的刑罚是“背火背篋”。他们在一只铁桶里装上烧红的木炭，把黄祝山的老婆衣服脱光，然后把铁桶套在她身上，那个肉烧得滋滋着响。接下来就是洪老四……

那些农会的人折磨她们上了瘾，用了“背火背篋”刑后意犹未尽，有人提出“冰火两重天”的“玩法”——“堆雪人”。于是，他们把洪老四推到外面雪地

上，用铲子把雪往她身上堆，用积雪把她全身包裹。“雪人”堆完后，农会会长命令她不准动，然后离去。

洪老四很快失去知觉。

有个人救了洪老四，这个人叫杨秀见，是个村里一个忠厚的农民，他等人走后，悄悄来把她从雪堆里扒出，把她背回家，嘱咐桂芬她们烧点火，让她暖起来。

洪老四醒来后，决定不再活下去，她对两个大的女儿说：“妈妈要走了。”她吩咐她们一定要照顾好才两岁的妹妹。

当天夜里，她就跳粪坑自杀了。

二，姐妹分离，乞讨为生

洪老四自杀后不几天，小妹妹艳芬就饿死了。家里已经一贫如洗，两姐妹只有出去讨饭。她们商量，一个就在石耶街上讨，另一个走远点，到外地去。姐姐梅秋把近的让给妹妹，自己走了，从此两姐妹天各一方。

桂芬家原本就在石耶街上，以前大家关系都很好，可是，土改把人情、乡情全部冲毁，人们的心肠变硬了。当然也有人同情她，但不敢公然救助，只能悄悄送她点吃的。山村的农民要好一些，大都要施舍一碗饭或者几个红苕。所以，桂芬也不时到外面去乞讨。

晚上她就睡在石耶那个旧桥下面的河滩上，只有一些谷草。冬天，她手脚长满冻疮，而且大面积溃烂，她早上起来，从大桥下面到街上只能爬着走。记得有一天妈叫我去街上去买盐时我看到了她，她手里拿着一只破碗，在地上翻滚，一身都是泥灰，头发又脏又乱，脸上全是污垢，不像个人样了。我回家对妈说起这事，妈脸色一下子就变了，连连摇头、叹气。



石耶镇旧桥遗址，当年桂芬栖身处

不过她终于等来了好运气。

石耶街上有一对靠缝纫为生的老人，男的姓栗。一天傍晚，栗师娘到桥下河边洗衣，听到哭声，她走过去一看，是桂芬在哭。原来，她因为脚冷，就用沙来堆在脚上，没想到这方法不仅避不了寒，反而更加冰冷。栗师娘心生同情，回家对丈夫表示了想救助桂芬。她说，以前她家也曾经帮过我们，现在他们的女儿落到这个地步，也应当帮帮她。栗师傅同意了，于是老两口赶到桥下，把桂芬背回了家。这样，桂芬终于有了住处。

三，满娘下毒，死里逃生

这样过了一年。

桂芬父亲有个哥哥叫杨举伯，解放前他去常德做生意时，赎了一个姓尹的妓女为妻，土改时杨举伯被枪毙，他妻子，桂芬的伯娘（我们这儿叫满娘），改嫁到岑溪乡烂溪口一个杨姓人家。她走时来把桂芬接走，认作养女。当时，人们都认为她有良心，做了一件善事。

桂芬到养父家后，每天干的事就是上山捡柴。慢慢地，满娘开始嫌弃她了，她经常找岔子打骂桂芬，最后竟发展到想除掉她。

一天早上，桂芬起床时，满娘已经将隔夜的剩饭炒好，叫她赶快吃了上山捡点柴来煮猪食。饭破例用油炒过，她觉得满娘今天对她特别好。吃了几口，她觉得饭里有异味，本不想吃了，但觉得可惜，还辜负了满娘的好意。

吃完饭她背着背筐就上山了。

刚到山上，还没来得及捡柴，她就觉得心里不舒服，接着翻江倒海呕吐起来。之后，她感到头昏眼花，口干舌燥。她爬到溪边喝水，然后倒在地上昏昏睡去，直到太阳偏西才醒来。

桂芬根本没想到满娘会害她，她以为是自己突然得病了。她能死里逃生一是她很快把饭全部呕吐了，二是当年的老鼠药或六六粉毒性还不是很强。



石耶镇，当年杨桂芳乞讨的地方

第二次又来了。那是一个冬天，她吃了满娘的早饭后，同样的一幕又上演了。但这一次比上次严重。她呕吐得翻肠倒胃，一直昏睡到天黑尽了才醒来。她背着空背筐回到家，不敢去见满娘，便悄悄摸到柴屋躺下。她又饥又冷，翻来覆去睡不着。她满娘听到外面有响动，以为是强盗，便叫丈夫出去看看。她丈夫好像是个船老板，他出来看见桂芬那付模样，问她怎么回事。听了桂芬的讲述后他心里明白了。他不便说破，只是叫桂芬赶紧走，离开这个家。

桂芬这时也明白了，她急忙起身，连夜往石耶走，到石耶有四公里路。

多年后，桂芬给我讲起这段经历时，心里仍然对她满娘有恨怨。

她又回到讨饭的日子。这时，暴风骤雨的土改已经结束了，社会平静了些，

人性也有了复苏，所以，这时她讨饭容易些了，但她晚上仍然睡在大桥下。

1954年，栗师傅老两口又一次收留了她。社会压力缓解后，其他人也敢帮助她了，有三家她们当年的邻居商量，桂芬轮流给他们送水，每天给哪家送就在哪家吃一天饭。

四，美梦破碎，乞讨回乡

1955年，石耶来了一个河南的马戏团，在田家坝子演出，桂芬也随街邻去观看。演出地被一道大布围子团团围住，只留一个出入口，一个姑娘在那儿卖票，一角钱一张。桂芬身上从来没有一分钱，只好往回走。这时，里面锣鼓喧天，然后有人在讲话，什么千辛万苦来到贵地，望众乡亲伸出友谊之手给口饭钱，感恩不尽……

桂芬见围布后面没人看守，便决定从地面爬进去看看。她钻进去后发现里面还有一道围布，在钻这道围布时被人一把抓住了。那人问她为什么不买票，她说自己是孤儿，没钱。那人听说她是孤儿，又见她身材不错，便动了心。他问她喜不喜欢马戏，她说太喜欢了。那人问她愿不愿加入马戏团，他说，马戏团吃得好，工作又好耍，而且每月还发零花钱。桂芬高兴极了，当即表示愿意。

这个人就是马戏团的团长。其实，马戏团要招到一个合适的人并不容易，有父母的谁愿意把小孩交给马戏团满世界跑？年龄大的身体已经定型，难以训练。像桂芬这样的孤儿是最理想的对象。

团长让她免费看了一场表演。

表演把桂芬深深吸引了。两个姑娘在马背上如腾云驾雾般上下翻滚，另外两个小姑娘表演“口含莲花”……桂芬从来没见过这般美丽和这般精彩，完全入迷了。演出后，她主动找到团长，表示了决心。团长约她三天后悄悄出发。

她犹豫要不要告诉栗师傅两位老人。如果不同意怎么办？不告诉悄悄走了，让他们担心怎么对得起人。最后她决定不告诉，因为她认定这次能改变命运，也会挣到钱，挣了钱再来孝敬两位老人。

那天凌晨，她悄悄出门，来到田坝子。道具已经装在几架马车上。团长见她到来，很高兴，但怕人发现，便把她藏在马车里，往湖南方向走了。

学艺的日子非常苦，稍有差错，团长不是打就是骂，甚至还把她捆绑起来示众。这样在外地的城乡辗转了一年多，他们回到了团长的家乡河南商丘。本想休整一段时间再外出，不料市文化局的人以他们没有演出手续为名强令马戏团立即解散。

桂芬的梦破碎了，离开时，她向团长讨点路费，团长不但不给，一年多的工

钱也分文不付，理由是，学徒期只供饭，不发工资。

桂芬只得徒步走回秀山，这一年她才12岁。从河南商丘到四川秀山，桂芬走了整整三个月。她给我讲起这一路上的经历时，泣不成声。她没有地图，分不清方向，又身无分文。一路问，一路乞讨。路上，有小孩子拿石头把她当疯子打，有狗追着她咬。没讨到饭时饿急了在土里用手刨还没有长大的红苕吃。她还悄悄在别人的猪圈里偷猪食吃。有一次，她昏倒在一个草堆里，第二天被下地一个农民发现，给了她两碗稀饭才救了她的命。

五，逃荒贵州，卖作人妇

回到石耶后她又到了栗家。一天，酉阳县一个拉木炭的货车司机听人说了她的遭遇，心生同情，便把她带到酉阳，介绍给一个姓陈的老师作养女。陈老师夫妇对她很好，她终于过上了好日子。

可惜，好景不长，一年多后反右运动来了，陈老师被打成右派，送到外地劳改去了。陈老师走前将她托付给一个蒋姓人家收养，又一年多后，1959年，大饥荒又到来了。蒋家无力再供养她，只好叫她出去自寻活路。

桂芬又一次回到石耶。

她这次回来我见到了她，当时我们正在栽秧，栽所谓的“双龙出洞”（即大跃进时为了田产万斤的一个“创举”：提前季节栽秧和密植）。这时她已经15岁，少女的身材出来了。

四川是饿死人的重灾区，秀山也是如此，我们石耶小街上，天天都在饿死人，全镇都笼罩在死亡的恐惧中。很多人家都往贵州逃，贵州那边山多人稀，生存要容易些。一天，桂芬的一个亲戚，她的嬢嬢找到她，对她说，不逃出去只有死路一条，她愿意带她到一个能吃饭的地方。桂芬走投无路，第二天便跟她走了。

她们往贵州松桃县的普觉方向走，一路上尽是逃难的人，在逃难人中，桂芬看到了好几个当年毒打她妈妈的土改积极分子。现在他们一个个也面黄肌瘦，枯瘦如柴，十分狼狈。

当天她们在松桃县孟溪的一个村子里住宿，女主人是熟人，刚从秀山嫁过来，男主人已经有50多岁，是个老单身汉。女的才20多岁，据说是前夫饿死了，她逃到这儿来嫁给了这个单身汉。



当年胡祖暖

第二天下午她们走到普觉岗家洞一个梁姓人家住下来，她孃孃同这家熟习。第二天早上，孃孃告诉她，这家主人叫梁寿冈，是个单身汉，心地很善良，家里存粮又多，年龄也不是很大，才46岁。孃孃的意思是让桂芬嫁给她。桂芬一听大惊，说她才15岁，那个男人比他死去的父亲还大。孃孃一个劲地劝她，说他年龄虽然大点但跟着他不会饿死。

桂芬坚决不干。当天晚上，桂芬饭也不吃，只是哭。

第二天早上，桂芬醒来，发现孃孃不见了。那单身汉告诉她，孃孃把她卖给他了，他给了她孃孃20斤红苕干。现在她已经是他的人了。

桂芬这时才明白孃孃带她来逃难的目的。她哭着要往外跑，单身汉一把抱住她，把她关在屋里。寨子里来了几个妇女，一边看管她一边劝说。她仍然不从。单身汉对她说：“你实在要走也可以，把我买你的20斤红苕干还来就让你走。桂芬说今后有了一定还给他，单身汉不干。

几天后的一个半夜，他悄悄溜进来，把桂芬强奸了。

他们怕桂芬逃跑或寻短，家族的人对她严加看管，一直到她有了孩子她都没能逃脱。

单身汉很高兴，寨子里的人很羡慕他，20斤苕干就得到一个年轻漂亮的四川姑娘。他也很得意，说：“要是没有饥荒年，四川这些姑娘哪会逃到我们这里来！”

桂芬同这个男人生活了14年，生了两个孩子。

1973年，一个熟人得知了她的情况，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又把她带回了秀山。她的两个孩子留在了贵州。

1973年还是文革期间，社会上一片混乱，她住在一个亲戚家。后来，亲戚把她嫁给了新龙桥（音）的一个农民，那个亲戚得了60元“介绍费”。

她同这个农民又生了两个小孩。现在，她就是同孩子住在一起。

对了，她的姐姐梅秋在大饥荒时没能活出来，所以，她全家现在只剩下她一个。



杨家唯一的幸存者，
终于活出来了杨桂芳

采访时间：2017年7月11日

地点：秀山县石耶镇

采访后记

我到了秀山石耶镇的当晚，杨桂芬已经在她表亲胡祖暖的家里等我，晚上一块吃饭。席间，大家都说她的经历很坎坷，她一提起就要哭。

我们约好第二天第一个就采访她，她也同意了。

但是，第二天她没有来，先找了个借口，说家里来了客人，走不开。接下来的几天她都没来，直到一周后我离开秀山，都没再见到她的踪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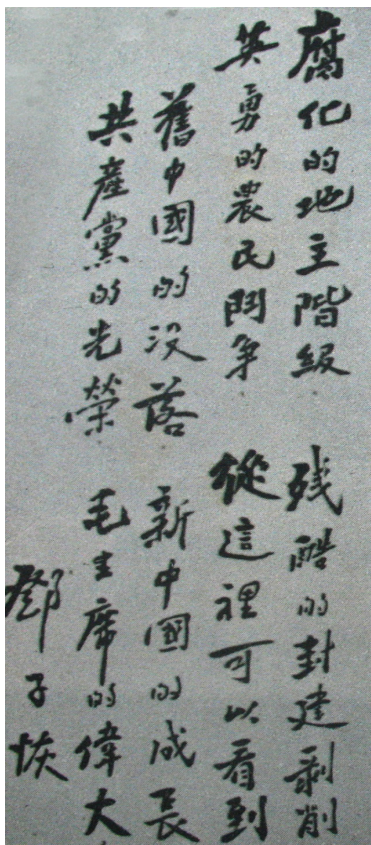
我清楚是什么原因，这些年来，我太熟习这个原因了。

她表亲胡祖暖感到很遗憾，也有些歉然。他说，是当晚有一个在场的女人对她说，接受我这种人的采访、讲土改的经历很危险。她回去后对她子女说起这事，他们坚决反对她讲土改的往事，她也害怕了，因此不再来见我。

好在胡祖暖一点不怕，他花了近两个小时，把桂芬讲给他的故事又原原本本讲给我了。

这些年，采访这么多人，还从没有过已经约好当事人，但却不得不由其他人代讲的“转手”采访。

所以，这篇采访录有些“另类”



“腐化的地主阶级，残酷的封建剥削，英勇的农民斗争。从这里可以看到旧中国的没落，新中国的成长，共产党的光荣，毛主席的伟大。”

选自“中南土地改革的伟大胜利”

无题

讲述人：任 XX

936 年生

.....

采访时间：2017 年 9 月 29 日

地 点：贵州省石阡县



2017 年 9 月 29 日石阡街头

采访后记

因为搞土改调查等原因，两个月前我被学校开除，“获得自由”的我干脆出游，同秀山的胡祖暖到贵州他当年的流亡、劳改地采访。到了石阡县时，遇到一位他的朋友，地主后代任 XX，我在石阡县一家街头饭馆里采访了他。

任 XX 老人虽然年逾八十，但头脑十分清晰，而且他有高中文化，口述力较强，采访时，他侃侃而谈，把他的家史和他本人的经历讲得清清楚楚。

可是，第二天，他打来电话，说当天夜里他通宵未眠，很后悔给我讲了土改的那一幕。他想到我又是录像，又是记地名人，非常担心，非常后怕。他要求删除所有的有关录像。

一向敢做敢为的胡祖暖很是不屑，把他顶了回去。

可是，任 XX 老人不断打来电话，一再要求，并说他不给两个在“体制内”的子女带来灾祸。

我十分理解老人的担忧和恐惧，老人自身在当年就因为一句话不仅失去了教师工作，还被关押了五年半。

于是，我答应了他的要求；于是，我只写下这篇没有采访内容的采访后记。

但是，为了不忘记那冤死的亡灵，我写下他们的名字：

1，任福成，任 XX 的祖父，在农会关押时被打死，遇难时 61 岁；

2，任达荣，任 XX 的父亲，土改时被枪毙，遇难时 36 岁；

3，XXX，任 XX 的二婶，在逼金银时上吊自杀。

遇难地：贵州省石阡县中坝区高塘乡。

另外，任 XX 的三叔任达安，投身革命的大学生，1957 年在贵州江口中学被打成右派，文革时在劳改地贵阳青镇（音）农场被枪杀。

他节俭持家，死于非命

讲述人：毛金禄

1947年生



我爸爸叫向单兵，当年开了个做铁锅的小厂，挣钱买了些田地，有多少我不清楚，因为我那时还很小。

我爸是个非常节俭的人，比如，如果中饭给他煮的洋芋（土豆）粥吃，他午睡就睡得呼呼的（睡得香），如果煮的白米饭吃，他就心痛，睡不着，吵骂家人：“像你们这样这过日子，不多久就要把家败了！”他一心要存钱买地，我二哥读书他都舍不得拿钱，是我叔伯他们拿的学费。

刘宝祥（当年上坝村村民）：但是，他爸爸对工人非常好，工人吃白米饭，他自己吃土豆、南瓜或包谷粥，穿的也是双烂鞋子，这事当地人都知道，他就是这样节俭挣点钱。

毛金禄：土改的时候，农协会想要杀人，但我爸爸条件还不够，用农村话说，就是猪还没喂肥，哪个（怎么）办？农会主任就编材料，说我爸爸是地主加保长，这还跑得脱？非杀不可！

我爸爸哪儿当过什么保长？！半天都没当过。



善广乡上坝村

我二哥向焯（音）当年考上了武汉大学，后来参加了地下党，土改时在公安局当了一个科长。局长对我二哥说，他同我哥没得矛盾，但是农协会报上来材料，说向单兵是地主加保长，他儿子虽然参加革命，但他在家里大肆造谣破坏（土改）。

我二哥看到那个材料很有

情绪，结果把他下放到万县乡下的一个派出所去了，不久又把他抓了，在永川茶场劳教四年，当时差有文化的人，他那个劳改农场还当了个犯人会计。

我爸爸因为“地主加保长”被枪毙了，他死时才47岁。

那个时候不讲实事求是，如果讲实事求是，我爸爸不会被杀。

我三叔向华斋（音）是乡长，也是地下党，但他同我哥哥各是一个（入党）介绍人，土改时也把他枪毙了，但现在已经给他平了反。

我爸爸被打死后我无依无靠，只得抱给人家喂养，第一家是我们本村的人，我在他家吃了饭后就往自己家跑，就像狗一样，只认自己家门，那家人只好放弃了。第二家在青龙那边，也姓向，他家没得儿子，就收养了我，但是，大半年后他家生了一个儿子，就不要我了，找了一个借口，说我偷东西吃，又叫我姐姐把我领回去。第三家人姓毛，就是现在这个村的人，我就跟他家姓，改姓毛，从此在这儿生活了一辈子。

采访时间：2017年11月4日

地 点： 忠县善广乡上坝村（原平坝村）

采访后记

善广乡是忠县最偏远的的一个乡，从海拔近千公尺的天池森林公园出发，汽车都还要开近半个小时才到达，而且山路非常狭窄陡斜弯曲。

就在这偏僻的上坝村，曾出生了一个后来加入了中共，曾在重庆中共南方局“周办”任机要员的美丽姑娘严炯涛（原名严琴贞），她的传奇故事和悲凉人生已经被她的儿子（也是原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的儿子）刘宝祥写在了《挣扎》一书中，这本书如果有一天问世，将会揭开一个被隐藏了大半个世纪的惊天秘密，撕下一个“伟大人物”道貌君子的面纱。

2017年11月4日，我同几个朋友，在刘宝祥的带领下，来到他母亲的出生地也是长眠之地上坝村。在刘宝祥母亲坟前，我遇到了当地村民毛金禄，闲聊中，得知他家也是土改受难者，于是，就在刘母的坟前，我采访了他。



采访虽然短暂，但给我留下几个很深的印象，其中之一就是：土改时才三岁的毛金禄，六十七年后，一提到他父亲之死，立马在陌生人面前热泪滚滚。

他死于“收买人心罪”

讲述人：朱繁荣（王皎容）

1986年生



1949年前，在川东奉节县，南北两岸各有几家显赫的大家族。北岸是公平茅田的邓家（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就出生于这个家族）；南岸是吐祥镇梅魁乡的大庄王家和柏杨坝镇的大水井李家（柏杨坝镇后来划归湖北利川）。

一，奶奶李家，人亡家破

我奶奶叫李宗芝（后来改为李宗宣）出生在大水井李氏家族中的梅子庄园。

川东土改时，大水井首当其冲，李氏家族的人，杀的杀，关的关。族人彭吉征遭受烧烤酷刑之后，李家祠堂托人带口信到李家各庄园报信：大难临头，族人各自想办法，早作打算。奶奶说，这个“早作打算”有两个意思，一是能逃的就逃，二是不能逃的人自行了断，免得遭受像彭吉征那样的酷刑。

我奶奶的爷爷和奶奶就“自行了断”了。

奶奶的爷爷叫李月秋，是李氏家族中梅子园的主人，他妻子李胡氏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每天自己提水沐浴后在自家佛堂拜佛念经。

李月秋听到大水井族人遭受的酷刑后，料想梅子园也难逃厄运，为免受辱，他在自家碾米的石磨盘上悬梁自尽，李胡氏也紧随其后，同日在自家床上上了吊。

奶奶的父亲叫李先蒸，母亲叫许静秋，她的兄弟许柏均是中共地下党，解放前后都担任吐祥区区长。解放后，在许柏均的动员下，李家将梅子园的所有财产全部交给了农协会，全家人被赶到几十里外的山洞栖身，奶奶两个年幼的弟弟妹妹都饿死在那儿。

当了区长的许柏均在1957年反右时跳长江自杀，尸骨无存。他的妹夫，也就是我奶奶的父亲李先蒸，在1959年大跃进时，作为地主分子，不堪受辱，拖



已作为旅游热点的大水井，也是彭吉征被烧烤处。

里面记录的都是真实的，她与被烧烤的彭吉征是亲戚。

着病体上吊自杀了。

李氏家族的各大庄园中，只有大水井庄园比较完整地保留下来，现在开发为旅游热点。奶奶家的梅子园则被毁得干干净净，现在什么都看不到了。奶奶说，那曾是一座中西合璧样式的庄园，非常美。

对了，我把你写的那篇关于大水井的文章给奶奶看了，奶奶哭，我也哭。奶奶说，那

二，爷爷王家，灰飞烟灭

1949年解放军快打来时，人心惶惶，传言地主的大姑娘们要被“共产”，因此大户人家赶紧把女儿嫁出去。我奶奶就是这样匆匆嫁到吐祥镇梅魁乡大庄王家的，那是1949年10月，当时她17岁。

我出生得晚，家里的情况都是奶奶告诉我的，她现在还在，而且头脑很清楚。

奶奶说，王家也是奉节县的一个名门旺族，家大业大甚至超过李家。王家祖上是山西三槐堂王家大院的一个支脉，明末清初从贵州入川隐居。在清代中期，王家与四川刘家、恩施康家一同进京面圣，王家被朝廷册封，堂号大庄王。

我爷爷叫王祝丰，他父亲王佛生（因与佛陀同一天生辰）是大庄王家最后一任族长，住在王家的阳和山庄。民国时期，王家和其他乡绅捐资修建了奉节中学，后来王家又独资创办了龙山中学，成绩优异的穷学生免费就读，龙山中学现更名为甲高级中学。王家还在当地做了不少好事，比如在梅魁修建力渡，免费供人渡河。



爷爷在奉节中学初中毕业后进入万州二中，高二时他考上军校，但王佛生不准他去，强行把他留了下来。

解放前夕，为躲避国民党抓捕，川东地下党的一个政委刘孟伉经常在李家，许家，王家之间躲避。王家为掩护刘孟伉，在国民党军队来搜捕时，和国民党军

官曾营长打麻将，故意输给他几百大洋为贿赂，使刘孟伉得以安全逃脱。刘孟伉是个书法家，他住在我家时，我爷爷就跟他学书法。刘孟伉离开时，王佛生和他弟弟王哲生送他到碗厂沟，他对王佛生说：佛生啊，该出山了。王佛生笑笑，不愿意。刘孟伉又对他说：佛生，再不出山，到时候莫说舅爷无情啊。

刘孟伉显然是知道共产党来后要
对地主下手的。



王家阳和山庄旧址，原为刘孟伉题写。

奶奶自从嫁到阳和山庄，就没看见公公王佛生的脸色舒展过，他整天拿着大土烟杆眉头紧锁。很快，解放了，土改来了，王家的所有财产统统被没收。

全家人分开关在阳和山庄，奶奶与大姑（王琼芳）关在一起，王佛生和儿子王祝丰关在一起，奶奶的婆婆彭学道与她小女儿关在一起。关押期间，奶奶经常听见外面叫喊：“把金银交出来！”还有“哎哟喂，哎哟喂”的呻吟声。她后来看见公公的手指溃烂，才知道他受了“猴儿搬桩”的刑法。

随后，全家人被赶出阳和山庄，住在上庙的一座破庙里（庙已被毁，只剩一点残迹）。

因为所有财产被没收，从解放初到1952年，王家都是靠以前的佃户偷偷接济和乞讨为生。1951年4月的一天，王佛生去以前的佃户家借粮回来，奶奶刚接过他背上的一背篓玉米，农协会的人就来把他押走了。

奶奶说，王氏家族的人共被杀了40多个，都是这个大家族的精英，她亲自看到的有七个，是同一天被枪杀的，地点就在梅魁乡王家宗祠前。这七个人中，有一个就是她的公公王佛生。



残存的大庄王家

奶奶说，王佛生在当地口碑非常好，是个大善人，农民们都说他的好话，可这一下反而害了他，工作队专门要杀当地有影响的、有群众支持的人。给他安了一个什么罪名呢？罪名叫“收买人心罪”。

谁来主持的宣判？就是前面提到的我奶奶的亲舅舅吐祥区长许柏均！

许柏均就是王佛生的亲戚，他一个个宣读罪状，其中，王佛生的罪状是：会拉拢人心，不枪毙的话会引来暴动。

奶奶说，七个人中，只有王佛生的头没有打烂，算是一个全尸。这全靠他儿子，也就是我爷爷王祝丰。爷爷在被关押期间，同看守他的一个姓蒲的看守搞好了关系。当他听说父亲被农协会押走，料想大事不好，他马上给蒲看守跪下，请求给父亲一个全尸。于是，那天当念到枪毙王佛生时，蒲看守第一个站出来执行任务。

子弹直射心脏，王佛生终年 49 岁。

除了王佛生，其余六人脑袋都被打烂，已经分不清谁是谁。其中一个学生最惨，他被打了七枪，原因是他拼命挣扎，一直大呼冤枉。土改时据说有规定，不杀学生，但不知为何杀了这个学生。（注：也是在奉节县，杀了一个学生陈光武，详见本书《一个当年地主放牛娃的讲述》）



爷爷王祝丰与奶奶李宗宣

人杀了之后，不准家属去收尸，要暴尸示众。奶奶当晚找到她大舅许柏均和农协主任周德武，请求将尸首还给王家。周德武说，可以晚上趁人不备时偷偷运走。

当天夜里，奶奶同王琼芳和王守常（王佛生的侄子）三人从大庄祠堂前拖着王佛生的尸首到上庙埋葬。王家以前的佃户有一个是木匠，他偷偷用楼板木为王佛生钉了一个简单的木棺以免软埋。

奶奶的婆婆彭学道得知丈夫被枪毙后，喝镪水（染布的染料）自尽，幸亏家人及时发现，用留种的土豆磨水灌下去，拣回一条命，但她后半生落下了严重的胃病。

采访时间：2017年8月20日

地点：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

采访后记

朱繁荣（原名王皎容）的丈夫因对土改问题感兴趣而找到我，交谈中，朱繁荣反而成了主角，她因近年来“回归”到她的王家而听到了关于土改的一些事情。她侃侃而谈，那神情，不仅是讲一段历史，还有深沉的思考。

于是我鼓励她再同她还健在的奶奶谈谈，了解更多的信息。她这样做了，十



残存的大庄王家

属一样，受到长达几十年的歧视和迫害。

采访时，朱繁荣说，以前她对王家的事不关心，原因是她8个月大的时候就被抱给朱家了（所以她一直姓朱）。她被抱出去是因为计划生育。当时在农村，农民头胎生了一个女儿后，满了五年还可以生二胎。她是二胎，出生时差十几天满五年，乡里抓住这点（没满五年）对她家开出巨额罚款，她家根本缴不起。其他人家没满五年的，甚至只有一两年的都不像对她家这样。为什么？因为她家是地主成分。她说，1986年地主已经摘帽了，但是对地主和其子女的歧视与迫害并没有因摘帽而中止。

朱繁荣是本书受访者中年龄最小的，但我感到她对土改问题有思考更有关注，我真心希望她在这个领域里探究下去，土改这段历史，应当有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来关注和探究。

本篇照片由朱繁荣夫妇提供



为了大水井旅游挣钱，大庄王家一些残存的雕梁画栋又被拆去装饰大水井。王家的这道圆门，无声地注视着身边的这场悲剧和闹剧。

那种生活 你一天都过不下来

讲述人：梅景

云南省龙陵县地主子女，88岁



我是云南龙陵县象达镇长安寨人，哟，当年我们在家乡受了多少罪！地主家庭大人、小娃都受罪。大人被抓去在太阳下跪着斗，共产党叫贫雇农来斗打地主，把棍子丢在被斗的地主身旁。我妈还在坐月期间就被抓去关在牢里。我刚出生的弟弟要吃奶，哭得死去活来。我母亲受了这种刑（指酷刑：“猴儿搬桩”，又叫“吃唾洒”）。



我母亲受了这种刑

我们地主子女在学校也被斗打。我因是地主子女，在学校被同班同学斗，每天去上课都要被斗半个钟头，是老师组织的，组织贫雇农子女斗我。说：“你穿的衣服怎么这么漂亮呀。”“你们地主的儿子姑娘怎么威风呀。”“我们怎么受你们的气呀。”打呀，谁想来打我们就打，吐口水、打耳光。我们地主子女必须到学校去，贫雇农子女可以不去。

我爸爸从保山被抓回龙陵，在路上他捡了一个子弹壳，关在牢里时他就用那个子弹壳挖地洞，挖好后他叫我二舅爹钻出去，我二舅爹不走，说：“好好睡，好好睡。”他没想到第二天他们就要被枪毙。

很奇怪，那晚上那些汽灯点着点着“砰”地一声一会炸一个，一会炸一个。

我们那儿有个山神庙，最灵了，我们去拜那个山神庙，求神灵保佑我父亲。结果第二天枪毙地主，头一晚上他就跑脱了。他如果没有逃脱我就不会在这儿了。

我们学校门前那个操场坝，土改时专门用来打、杀地主，枪毙地主时叫我们地主子女去观看。地主在上面，我们在下面站着观看。那天杀了好多个，鲜血流

下来。我二舅爹，他叫董志高，被打了几枪都没死，他还扭过头去看。除了我二舅爹，我的姑爹也被杀了，但是我父亲逃脱了。

我被杀人的场面吓病了，夜里害怕，又哭又叫。妈妈说：“你叫什么？”我说：“我看见他们杀人。”

父亲逃走后，他们就把我妈抓去斗打，并且把她也押到刑场，意思是要她顶替父亲被枪毙。但是，在刑场上他们放了空枪，子弹打在旁边，没把她打死。

那时，缅甸成立了（国军）游击队，我父亲同游击队返回中国把我们营救出来。那次营救了很多地主，但是，有些地主老婆跑不动就掉队了。

我们逃到了缅甸，可我妈出来后不到一年就去世了，原因是她被斗打时心脏受损，尤其是在杀场上受到极度惊吓，落下了心痛病，每天痛好几次，一痛起来她就用手压着心叫喊。

我们地主受罪呀，你没有经历过我们地主的那种日子，受不了呀。你要过那种生活，一天都过不下来。

采访时间：2022年11月19日

地 点：泰国清迈

采访后记

梅景老人是我在泰国采访国军残存老兵时的一个采访对象，关于她十六岁在缅甸参加国军孤军后的经历，我已经收集在十集纪录片《泰北，最后的老兵》中。

采访中，她谈到那些激烈的战争场面时还神态自如，但讲到土改的经历时，脸上马上出现悲苦和恐惧的神情。看来，土改的血腥在她心中留下的恐惧，远超战争的残酷。

爸爸妈妈牵手投江

讲述人：杨金玉



我71岁了，当年的那些事情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今天是我几十年来第一次说起土改。我怕提起那些事情，我妈妈爸爸双双在土改中死去，那时我才14岁。

我老家在忠县拔山乡，离城有100多里，生父姓杨，他在我很小时就病死了，我对他没有什么印象。我妈妈叫肖正静，她只生了我一个，生父死后她就带着我改嫁给了城里苟家院子的黎大雪，黎大雪的妻子病死了。黎大雪虽然不是我亲爸爸，但我是他从小养大的，他对我有恩，我一直叫他爸爸，在感情上，他就是我的亲爸爸。爸爸在忠县田赋粮食管理处当科长，1949年后，新政权留用爸爸继续当干部，安排在民政科工作，不久，因为是旧人员，县政府把他开除了，他被迫离开县城到新生乡去教书。

土改运动中，我家被评成地主，所有田地和财产都被强行没收，除了身上穿的衣服，我们什么都没留下。对共产党的土改运动，我爸爸妈妈都是非常拥护的，他们为了表明自己的积极态度，主动把所有财产，包括苟家院子的房子都交了，全家搬到城西临江岩下去另租了一间小房子住。小房子里连灶也没有，我们就用一个破背篓糊上泥巴做灶，生活很艰难。

很快，爸爸被押到新生乡下受管制，妈妈因为是地主，土改工作干部不准她外出一步，家里能外出的就我一个人。为了维持生计，我小小年龄就翻山越岭到乡下去赶场，买绿豆黄豆回城在家门外摆起卖，这样一次可以赚几分钱，勉强维持家里的生活。我经常去赶的是善广场和巴营场，两个地方都在高山上，远的六七十里，近的也有四十里，我最多的时候一次背了8升豆子回城。那时那些地方全是原始森林，山高路险，林子里还有野兽，我背着沉重的背篓又累又怕。从巴营场进城，途中要经过“岩口”，那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悬岩陡峭山路崎

岖，高高的峡谷夹着深渊，从山顶到岩下足足有几百步石梯，深渊里山溪水冲得轰轰直响，回头看天，只有一条缝。由于地势险要，“岩口”历来都是土匪出入的地方，到了傍晚就没人敢经过了。我赶场回家一般都比较晚，加上个子小肚子饿，背着背篓越走越沉重，走到岩口天就渐渐黑了，峡谷里的风呜呜地吹，听上去就像传说中的鬼叫，脚下深渊里的溪水在岩石上冲得哗哗作响，我孤零零的一个人，好怕，好想妈妈。我常常忍不住大声哭喊：“妈妈呀……”

我一路哭一路走，就这样走完最后的十多里路。快到家时，老远就看见妈妈站在门口张望——我一出门她就一直在担心我，但是她不敢出来接我。每次我走进门，妈妈接过我的背篓就抱着我哭，说：“金玉，我想到岩口来接你，可是……他们不准我出门……”

在临江岩的日子虽然艰难，但还算平安，没想到很快就大祸临头了。

一天，从拔山我生父老家来的四个带枪的民兵到新生乡将我爸爸押回家，大声吼着要金银财宝，不由分说就把我妈妈也一起押走。一个民兵恶狠狠地说，把这个地主崽也带走，说着就要来拉我，把我吓坏了。这时街道上的邻居说，她还是个小妹，就留下她吧，那些民兵才没带我走。

大约一周后，爸爸妈妈从拔山回来了。妈妈进屋后就抱着我大哭，她让我看她的手腕，上面是一条条被粗棕绳捆出的血痕，妈妈说，她和爸爸在那里天天被捆绑吊打。我看着妈妈的血痕，眼泪直往下掉。

晚上妈妈偷偷地给我讲她和爸爸在拔山的经过，他们被关在我奶奶村里，民兵们拿着枪天天要他们交金银财宝。父母说，我们什么都交完了，连房子都交了呀，现在确实什么都没有了。民兵追问：“往年肖正静回家戴的金手镯到哪去了？”妈妈说：“金手镯也交了的呀”，民兵说：“你往年回来戴的是根圆的金手镯，你现在交的是根扁的，那根圆的到哪去了？”妈妈解释说，扁手镯就是那根圆手镯改成的，民兵就大喊：“还不老实！不老实，吊起来！”就这样天天吊打我的爸爸妈妈。

不光是吊打，民兵们还不给我爸爸妈妈吃饭。我奶奶家里也早没了粮，她老人家也是地主，奶奶没法，只好煮些红苕叶胡豆叶给我爸爸妈妈送去充饥。爸爸妈妈又挨打又饿饭，实在撑不住，这时一个人悄悄救了他们的命。这个人就是在忠县田赋粮食管理处我爸爸手下当过学徒的潘才龙。

斗争爸爸妈妈时，潘才龙拿着一根又粗又长的竹筒瞪着眼睛走来走去，嘴里大叫着：“老实点！好好交代！”，像要抡起竹筒打下来，爸爸妈妈心里很紧张。斗争完了，民兵把爸爸妈妈押回关押的地方，潘才龙也一路叫着：“老实点！好好交代！”他跟到父母关押的地方，一边叫，一边就把竹筒悄悄丢在地上。等没有人的时候，爸爸妈妈捡起竹筒，发现很重，打开看，原来里面是米饭。以后几

天，潘才龙天天都用这种办法送饭，让我爸爸妈妈保住了生命。在那种年代，他还这样仗义，真是个好人啊，我永远都记得他的恩情。

民兵们天天吊打，爸爸妈妈实在受不了，只好说回家交金手镯，民兵们说，光金手镯还不够，还要交100个银圆的罚款才行。爸爸妈妈也同意了，这才又被押着进城。

爸爸妈妈回家后去哪里找金手镯和100个银圆呢？我小小年龄，不知道100个银圆是多少，看见妈妈整天伤心，就说：“把我身上的棉袄卖了交罚款吧，我不怕冷”。妈妈听了只是对我苦笑。

期限到了，四个民兵又拿着枪来了，一进门就吼得像打雷：“金手镯，圆的！还有100银圆！”

这次我爸爸妈妈显得十分平静，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这就到老屋苟家院子去取。”四个民兵立即就押着爸爸妈妈走。爸爸没回头，妈妈却一边走一边回头看我，忽然，她转过身来对我说：“杨金玉，你是丙子年生的哟，记住哦，六月初四丑时生。”民兵推着她们走，她走了两步又回过头说：“杨金玉，你要记住哦，丙子年……”妈妈说着眼泪哗哗直往下流。

我没跟爸爸妈妈一路去，后来的事情我是听别人讲的。

爸爸妈妈到了苟家院子大门口，民兵们迫不及待地要他们去取金银，爸爸对民兵们说：“我搬走后这里已经另外住了人，要先进去和主人商量一下，一起进去不大好，你们就在外面稍微等一下”，民兵们想想也有道理，就让他们进去了。

民兵们一心等着拿金银，谁知过了一阵不见我爸爸妈妈出来，又耐着性子等了一阵，还是没出来，端着枪进去找，院子里根本就没有我爸爸妈妈的踪影。民兵们急了，马上跑到临江岩来找人，他们问我看见爸爸妈妈没有，我说不是跟你们走了吗。金银没拿到手，人也不见了，这下民兵们慌了，他们怕拿不到金银，要我带着他们去城里到处找。我带着他们去找遍了所有爸爸妈妈可能去的地方，都没爸爸妈妈的踪影。几个年纪大的乡亲叹着气说：“可能是寻短见了，去河坝看看吧”。

天快黑的时候，在爬岩子下的河滩上找到了爸爸的一双鞋和妈妈的一件背心，背心里有他们的遗书，我现在还记得，上面写着：“我们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我们确实交不出金银了。女儿还小，与她无关。”

爸爸妈妈就这样走了，没有发现他们的尸体也不会有人去打捞他们的尸体。附近有人告诉我，他们远远地看见我爸爸妈妈从爬岩子河滩上投进了长江，他们是手牵着手，慢慢地一步步从河边走向江水深处，直到被激流卷走。

几十年来，我眼前经常浮现出爸爸妈妈慢慢走进江水深处的一幕，他们手牵

着手……

把前前后后的事情联系起来，我才明白，妈妈为什么在被民兵押走的最后一刻要回过头来反复对我说：“杨金玉，你是丙子年生的哟，记住哦……”那是她在向我作最后的告别。

我妈妈死时只有三十多岁，她是多么舍不得丢下我，她清楚他们死后我就没有一个亲人了。如果不是生不如死，他们怎么会走绝路。在最后的时候，她放心不下的还是我，怕民兵在他们死后又逼我要钱，所以留下遗书说“女儿还小，与她无关”。我也明白了，爸爸妈妈已经暗暗下了决心要去死，连死的办法和路线都早商量好了，所以他们才能巧妙地摆脱民兵，借口进苟家院子取金银，进了院子就从熟悉的后门出去直奔爬岩子河滩了。他们手牵手走进激流时，只要任中有一个人稍稍动摇一下，就可能活下来，但是他们一点都没有犹豫，保持着那种姿势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我对着江水号啕大哭，哭得瘫倒在地上。

我找出了他们生前的照片，其中有一张是爸爸的单人照片，我找到哥哥，他是爸爸的亲儿子，也就是爸爸和前妻生的儿子，我说：“这是爸爸的照片，他已经死了，照片给你做纪念吧”，谁知哥哥拿过去就把照片撕成粉碎丢在地上，说：“他这个地主，死了好些，不死我还去斗争他呢！”我吓坏了，哥哥是爸爸的亲生儿子啊，怎么这样呢？其实，那个时代就是这样，很多儿女都要和父母划清界线开展斗争。

父母走后就只剩下我一个人，那时我14岁，还是个孩子。

我无衣无食无亲无戚，完全无法生活，于是有人出来给我做媒，把我嫁给一个比我大十多岁的男人。我还小，什么都不懂，当时惟一的愿望就是要读书，因为爸爸妈妈以前说过，一定要读书才知书识礼。那家人见到我后，觉得我还不错，同意让我读书，我听说后就答应去他们家了。那家人出生好，是贫下中农，他们欺负我是地主崽，从来不讲道理，不论什么事情总是我错，他们什么都对。我眼泪只有往肚子里流。

我天天都想起爸爸妈妈，一想就伤心流泪，有一天，我实在伤心到极点，就哭着跑到爬岩子河滩上爸爸妈妈投江的地方去独自痛哭。我坐在冰冷的沙石上，不知哭了好久，嗓子哭哑了，眼泪流干了，我觉得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再活下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不如去找爸爸妈妈，和他们在一起还好些，想着想着我站了起来，一边轻轻喊着“爸爸妈妈”，一边向江水走去。

这时，一个声音突然在我身后吼起：“杨妹！你做啥子？”接着就有一支手拉住了我。我回头一看，是城里的厨师戴正福叔叔，原来戴叔叔看见我哭着往河坝跑，害怕我出事，就一路跟了过来。

“你还小，怎么这么没出息没志气，走，跟我回去！”戴叔叔一边说一边就拉着我上了坡，在路上他又给我讲了很多道理。我听了戴叔叔的话，后来就再没想过去死。戴叔叔去年才去世，我在他灵前痛哭，给他送了最大的花圈，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啊！

我为我那个贫下中农丈夫生了几个孩子，我们没有共同语言，完全合不来，我是在他“出身好”的大红伞下躲避阶级斗争的风雨。前几年他死了，我才改嫁给了园艺场的退休干部王光宪，王光宪家也是地主，他的故事你们刚才已经听说了。

我土改时的经历五十多年来没对任何人说过一句，我一直藏在心里，连丈夫王光宪都没说过，不信你马上问他。说起伤心啊，也不敢说呀。今天都告诉你们了，反正我也老了……

采访时间：2008年1月17日

地点：忠县东坡路县园艺场宿舍

采访后记

在采访地主子女王光宪时，他妻子杨金玉彬彬有礼地坐在一旁，并不多言。我专心地为王光宪录像，没多注意她。王光宪的讲述结束后，我们准备离去。这时，她忽然轻声说：“我家也是地主”。

这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她可能也有一段血泪史。

这时我才注意看她，老人虽然已经71岁，但依然眉清目秀，而且，颇有几分学者的气度和大家闺秀的风韵，年轻时她想必是个美女。

可提起那段往事，她仿佛有些犹豫。

她丈夫在讲述时，她静坐一旁，想必是在观察我们。我想，她内心可能一直在挣扎：是否该把这段她甚至没有告诉她丈夫的血泪史告诉我们。讲，有风险；不讲，也许再没有机会了。

终于，她开口讲起来，而且滔滔不绝！

语言流畅，条理清晰，细节生动，仿佛是读一篇非常成熟的演讲稿。可想，几十年来，这段埋藏在她心灵深处的家史，她在心底里默读了多少遍。

告辞时，她送我们到楼口，回头向她挥手作别，看见她眼镜后面有泪光闪烁。

从那一刻起，每当我想到她，心中也依稀泪光闪烁；同时，感到一种沉甸甸的责任——要对得起一个在生命暮年的女人的信任与嘱托。

她的家，就在她父母投江的爬岩子上方，几十年来，虽然她从来没向人提起

过往事，但是，她每次望见爬岩子或从爬岩子经过时，会是怎样的感受？

从杨金玉家中出来，我专门来到杨金玉父母投江的地方——爬岩子。

长江因三峡大坝的修建已不再奔流，江水漫上来，淹没了杨金玉父母投江的那片河坝。那腥红的记忆，沉没在死沉沉的水下。



采访完后，我来到杨金玉父母投江的地方——爬岩子

补记：此篇我最初因故未收入书中，在2023年4月补充几篇采访稿时，不知为何，老想起杨金玉。此时，距采访她已经过去15年了，不知她是否还健在。未能让她的讲述“公之于众”，我总有一种愧疚感，觉得既对不起她的信任与嘱托，更对不起她双双投江的父母。

朋友陈先生为本篇采访出力不少。

“我们当年为什么不跑？”

讲述人：李怀庆
1966年生



我没有经历土改，但我家族的情况非常清楚，一是我父亲（还有一些亲戚）对我谈了很多，二是我多次回老家作了广泛调查。

土改中我们李氏家族遭到灭顶之灾，可以说是家破人亡！

一，先辈艰苦创业

我老家在重庆潼南县太和镇，祖先是湖广填四川来的，是两兄弟，他们来到太和镇的望水埡。望水埡在涪江边上，景色很秀美，水土肥沃。我们李家字辈是十个字：“开元成时秀，廷怀正大光”。我家在“开”字辈时创业，用一条小木船搞航运，后来慢慢发展到几条船。

我听老人讲，当初创业时很艰苦，祖辈们在船上劳累了喝点酒，为省钱，下酒菜都舍不得买，几颗花生米，一个皮蛋大家用筷子蘸一下，这样来喝酒。

家业发展最快是在我高祖父李成林和曾祖父（我爷爷的父亲）李时璋手里。当时，高祖父是个小老板，在涪江上有几条木船，主要为盐商运盐，盐从四川洪县经水路运到潼南，有时也从宜宾运。曾祖父14岁就在船上帮高祖父，他很有商业头脑。他对盐商说，我家不收运费，以运费入股。这样他们就加入了盐商的行业。后来，有的盐商因种种原因衰败了，而我高祖父和曾祖父则逐渐发达起来。他们组建了自己的船队，还在涪江、嘉陵江上购置了一些码头。船队从涪江到嘉陵江一直到长江，成了当时涪江和嘉陵江上最大



从望水埡眺望涪江对岸

的船队。那时船队也没有个名号，只在船上挂一件衣服，人们就知道是李大爷的船队来了。

后来盐生意逐渐萧条，他们就专门做航运，运四川的土特产、中药材等到上海。我家当时在上海也有自己的商行。到上海后，货与木船一并卖了，因为木船要拖回四川成本太高。我们请的先生，现在叫职业经济人，就背着银子，有些背银票，走一个多月时间回到重庆。

受洋务运动的影响，他们也办了一些实业，比如在合川办了重庆地区最大的丝绸厂，裕华丝绸厂，不是那个从上海迁来的裕华纱厂，而是后来公私合营后的合川丝绸厂。二、三十年代丝绸厂的产品就出口欧美。

同时，家里还开了药店“福寿堂”，并在成都、重庆等地设有分店，既卖药，也做中药材的批发和初加工，还把药材运到上海，再转销到东南亚国家。



李怀庆在“福寿堂”药房旧址前

著名的民生公司和卢作孚同我们李家也有深厚的关系。父亲曾对我说，他每次从上海回来，卢作孚都要接他到七星岗他的卢园去吃饭。卢作孚早年贫寒，曾在李家打工。当时嘉陵江和长江有四、五家大的航运公司，常常相互杀价，后来引进了机器火轮，也引进了一些现代的管理经验。我曾祖父提出大家坐下来谈，提议合并为一个公司，他推荐了卢作孚来筹办这件事。但是，在1925年公司即将开业时，我曾祖父就去世了。

我们李家能够发达，同我们有严格的家规也有关系，比如，家族明确规定，不准纳妾；又如，不搞借贷，自己有多大的资金就办多大的事。还有，对所有男人有两项要求，一是习武，强身健体；二是能双手打算盘。

我们李家的“商业帝国”是在我曾祖父手中发展到极致的，我爷爷那一代只是守住了家业。

以前，只要有点积蓄的人都可以买地，人们也愿意买田地，因为田地有几种功能：储蓄功能、投资功能、还有担保功能等等。那时人们觉得购买田地是最安全最保险的一种投资，也是为子孙留一份财富。

我家在盐业、航运和贸易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后，就在家乡太和镇购买了大量的田地，还在重庆市区如现在的解放碑和成都的春熙路



原李家花园旧址外的木船

等地买了一些门面。

在抗战时期，李家为国民政府作出过巨大贡献。当时重庆市人口激增，好几次出现粮食恐慌，市场上买不到粮，都是我爷爷发挥袍哥的作用，积极组织运粮。另外，他还捐献过大量的药材、布皮、粮食，支援抗战。

这后来成了我家的一个罪名：支持国民政府。

二，土改遭遇灭顶

土改来了。

我们李氏家族是当地的名门旺族，我爷爷李裕昆（字辈是秀先）是个乡绅，大地主，划的成分是地主兼工商业，土改工作队自然不会放过他。

首先是发动农民佃户们来批斗。但工作队没料到，完全斗不起来！先是没人来斗，经他们三番五次动员，农民和佃户来了之后，不仅不批斗我爷爷，反而把批斗会开成了表彰会！有人说，我们生了病，东家亲自来关心；到药铺拿药，没得钱，他说，免了；交不起租，他也说，免了嘛；缺钱用，他说，拿点小钱去用，今后还得起就还，还不起就算了。还有，无论是修桥补路、赈灾扶贫等公益事业，他都是在第一线。

李家佃户刘朝荣的讲述

（太和镇青龙村人，1935年生）

他是个大好人，哪个去斗他？那时我家卖自产的绞丝，赶场如果卖不掉，他看到了，就说，把丝放在我这儿，你们把钱拿去，下一场卖了再说。哪儿去找（像他）那么好的人？到现在都找不到！



李怀庆：

爷爷是个有文化的乡绅，温良恭俭让做得非常好。他对家人、乡邻、朋友、佃户等都非常友善。我回乡，当年的老人提到我爷爷，没有一个人说他不好，还说当年人们叫他“李大善人”。我了解到这些之后，很感叹，说实在的，我们后人都不及他。

在批斗会一次次失败之后，工作队恼羞成怒，怎么办？他们亲自动手，打！

当时工作队由南下的解放军组成，他们下手狠，把我爷爷手打断了，睾丸也被踢破，而且把他赶到佃农家的猪圈去住。

刘清海（李家佃户的后代）：

我听我婆婆讲，他爷爷的手被打断后，吃饭都困难。我婆婆等管制他的人走后，悄悄去给他喂饭，婆婆1999年才去世，她对我说，那时东家和佃户的关系非常好。



李怀庆：

我的姐姐生于1948年，由于我父亲在外地，因此就把她留给我爷爷奶奶照看。那时我们的大院被工作队占了，只留下一间小房。家里大人被抓走后，姐姐没吃的，饿得在地上乱捡东西吃。晚上，她又饿又怕，不停地哭。一个工作队员不耐烦了，用刺刀对着她，恶狠狠地说：“你再哭我一刀杀死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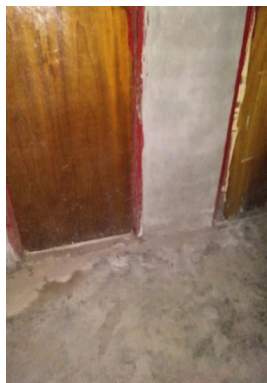
曾给李怀庆爷爷喂饭的佃户丁英珍

我姐姐没被杀死，她被吓死了！为这事我专门问了我父亲和其他亲戚，以及一些在我家干过活的人，她的确是被刺刀吓死的，那一年她才3岁。

土改中，还死了一个人，这个人是我们的管家，也是我们的亲戚。他性子刚烈，看到工作队一系列的杀人越货，他张口大骂：“土匪！共产党都是些强盗！”他当然知道这是杀身之祸，他事先配了毒药（我们家开得有药房），他痛骂之后饮毒自杀。

我姑姑叫李廷贞，她生于1934年，土改时她才17岁，是个大家闺秀，长得也非常漂亮。土改工作队的人把她抓去追逼金银，只一夜，就彻底毁了她一生！

在逼浮财时，我爷爷把商铺的钱等等全部交了，但一直没说一个大秘密——就是我家建有一个地下金库，位于一个非常隐秘的地方，在地下五米深。无论怎么追逼，怎么吊打，我爷爷都守口如瓶，因为那是我们李家好几代人打拼的积累，是我们好几代人的血汗钱。我二爸李廷华也被抓去吊打，他是习武之人，人也年轻，扛过来了。于是，工作队把突破点放在了我姑姑身上。她被抓去全身脱光，吊起打，整整折磨了一夜！她怎么经得住那种折磨？她被迫供出了那个金库。



曾被洪水淹过的金库遗址

金库被查抄一空，据我家的老年人说，里面的金银财宝整整运了两卡车！

姑姑第二天放回来时，已经神经错乱了，她从此疯疯癫癫。

那一夜，姑姑究竟受了什么折磨我不知道，我为这事问长辈，他们都不详说，只说“受尽凌辱”。

我再说说我的奶奶。我奶奶叫李曾氏，生于1901年，比我爷爷还大一岁。她当年是曾家的大美人。爷爷被打残、我姐姐被吓死已经给她巨大的打击，现在不仅金库被抄，女儿还被折磨疯了，她终于精神崩溃。

她是在1953年土改结束后投的江，就在我家前面的涪江。

她自杀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喃喃自语：我对不起李家，对不起李家列祖列宗……

奶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她有很强的负罪感。

这件事就要说到我爸爸身上。

1949年前，我爸爸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在上海他接触面广，了解了共产党的政策，因此他写信来叫家里把家产全部变卖了移民到东南亚国家。爷爷动心了，但奶奶故土难离，她娘家还有一大家子人。而且，她还很生气，说：“这个廷芳，不孝之子，这么个家业叫我们变卖了？”她还骂他“败家子”。所以，我爸爸写信这件事闹得人人皆知，我家的店员、佃户都知道。

李家打算要走的事，也传到了地下党的耳里，他们生怕这么一个大富人家跑



太和镇外的涪江，李曾氏投江处

了，专门来找到我爷爷奶奶，对他们庄严承诺：你们是民族资本家，是工商业者，未来的新中国需要你们。奶奶听到这些话，更拿定了主意。

在奶奶的劝说下，爷爷留下来了。

共产党来了，整得李家家破人亡。她非常懊悔，认为是自己害了李家，她无法摆脱这种懊悔和自责，只有一死了之。



李家大院残存的老屋

三，父亲遗恨终身

奶奶投河后的第二年，1954年，我爷爷、姑姑，二爸，还有我家另外一个姐姐，在一个夜晚，悄悄乘一条小船，沿涪江、嘉陵江，到重庆沙坪坝投奔我父亲。

再说说我父亲。

父亲在上海时，已经了解到了共产党的作法，也预料到了共产党来了之后会采取的手段。那么他为什么没走呢？因为他是个大孝子，爷爷奶奶不走，他也不便走。还有，他是长房长孙，觉得自己应当为这个大家族承担责任。本来，当时留学德国的手续都已经办好，他放弃了，回到了重庆，在重庆嘉陵机器厂作厂长秘书。

爷爷他们在走投无路时投奔了他。

可是，爷爷和姑姑都已经奄奄一息。

看到姑姑疯疯癫癫，爸爸很是伤心，他非常喜欢这个小他8岁的妹妹。三年之后，1957年，姑姑就去世了，终年23岁。她去世后，爸爸抱着她整整哭了一夜。

同一年，我爸爸被打成右派，罪名竟然是与当年同寝室同学的父亲（他到了台湾）合了影。

第二年，我爷爷去世，终年56岁。土改时爷爷因为口碑很好侥幸保了条命，但工作队的拳打脚踢，给他身体造成了严重损伤。

父亲这辈子给我深刻印象的，一是他每次提起他妹妹都非常痛苦；二是他一辈子念念不忘：“我们当年为什么不跑嘛？！”

采访时间：2017年7月27日；8月15日

地点：潼南县太和镇；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

采访后记

李怀庆生于文革爆发那一年，他说，他爷爷是地主，父亲是右派，母亲是反革命，这独特的家庭背景，加上文革的疯狂，给他童年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后来长大，他了解了大家族当年的辉煌和土改的“灭门”之后，更是心潮起伏。因此，一谈起他家族的命运，他便悲愤难抑。

在他的邀请下，我们在重庆40度高温里来到他的老家太和镇。他一一指给我看他家当年的遗址，包括已经被五马分尸的李家花园、面目全非的沿河



当年爸爸最喜欢在这树下读书

商街、衰败残破的老宅旧院等等。

他在一棵巨大的黄楠树前说，以前这棵树就在我们李家花园里，紧邻涪江，风光秀美，我爸爸最喜欢在树下读书，让江风吹拂。好多年他都不时回忆起那种滋润身心的环境。但是，你看看现在是什么样子了！

他还说，我每次回乡心情都很波动，想到祖先在这儿艰苦创业，打造了一个美好的家园；又在这儿家破人亡，不得不流亡他乡。还有，共产党你把李家这么美丽的家园抢去了，保存下来也好嘛，不！给你毁得干干净净，四周的环境也一同毁得一塌糊涂！

一切都已经无法恢复了，李怀庆唯一能做的，是将位于村镇外山坡上的李家祖坟精心维修，以寄托他作为长房长孙和新一代族长对先辈的追思和敬重。

另外，也许是遗传基因使然，李怀庆在商界也打拼成功，创下了一份赫然家业，每天，他都站在他那位于南滨路的豪华会馆



他站在位于南滨路的豪华会馆里……

里，透过巨大的落地玻璃窗，眺望两江汇合的朝天门——当年，他们李家从涪江开来的浩荡船队，就从这儿乘风破浪，驶向外面的世界。

补记：

2018年1月30日，李怀庆突然被以“嫌疑犯”的罪名抓捕，是犯了什么罪的“嫌疑犯”不知道。当时中共刚公布了要进行“打黑除恶”专项运动，朋友们认为，李怀庆在微信上传播了大量批评中共的文章，还有不少对中共当局表示不满的言论，而他又是一个企业老板，颇有资产，因此，当局便借运动对他下手。一方面消除异议分子，一方面收缴他的财产，一箭双雕！

“打土豪，分田地”已经是中共过去的历史了吗？

他几十年拼打下来的家产全部被冻结了。

李怀庆什么时候能被释放，释放后还能否保住他的财产，都是一个未知数。

此时，我已经流亡到了美国，每天，在加利福尼亚的海边遥望大洋的那边，心中一声声长叹：怀庆兄，你为什么不跑嘛？！

补记：2021年，李怀庆被判二十年徒刑。